

武大校友通讯

2021 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主	编	邓小梅
执	行	陈东华
主	编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新才 邓小梅 叶琳娜
		刘赛男 肖艾芹 吴根友
		张发林 陈东华 陈 纲
		胡庆方 涂上飙 涂险峰
		潘迎春



目 录

卷首语

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武汉大学 2022 年新年献词

.....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3)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 2021 年十大新闻 (9)

武汉大学 2021 年度新闻人物：张祖勋

——丈量四海 笃行不怠 (14)

珞珈风采

张祖勋：皓首丹心育英才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17)

冯天瑜：潜心学术 锐意著史 明海英(25)

武大，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地方

——于刚校友在电子信息学院教学科研大楼捐赠

奠基仪式上的致辞 于 刚(36)

周翔与他的三尺讲台 钟焯 赖润泽(38)

陈锐志：一位学者 40 年的“定位”故事 肖 珊(44)



用使命担当撑起厚重人生

- 校友张继先寄语毕业学子 张继先(50)
- 徐红星：“自立自强”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原始基因
..... 人民日报(54)
- 宋保亮：破译胆固醇与脂代谢疾病“密码”
..... 付晓歌 刘宇欣(60)

珞珈记忆

- 陈潭秋：从武大学子成长为革命者 涂上飙(69)
- 张一悟：甘肃党组织创始人 徐应荣整理(74)
- 陈雨苍：博士·战士·烈士
——百年名院创始人、早期共产党员的
赤诚忠心 杜巍巍整理(82)
- 曾经在武大学习工作过的革命烈士 秦 然(87)
- 桂质廷：不忘“磁”心“电”基学术 李承志(96)
- 怀念恩师石泉先生 徐少华(104)
- 坐我光风霁月中
——追怀萧蕙父先生二三事 郭齐勇(110)
- 怀念父亲马克昌 马重慧(119)
- 齐民友：中国近代数学史会记得他 温才妃(132)
- 我的导师刘纲纪 王海龙(139)
- 一位纯粹、可敬的学者：缅怀朱雷老师 刘进宝(144)
- 恩师已去 风范长存
——写在林天宝教授去世一周年之际 陈国庆(153)
- 我的恩师鄂栋臣 程 晓(156)
- 我所认识的张俐娜院士 珈 言(160)
- 忘不了倒在讲台旁的老师 文新国(164)
- 追忆校友徐宏大使 朱 丹(167)
- 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 张培刚(173)
- 老师教我做人和做学问 李德仁(185)



我的老师彭斐章	吴 平 (190)
我心中的好老师	
——冯天瑜先生指导我学习思考的点滴回忆 ...	张艳国 (193)
我的老师郭齐勇	秦 平 (199)
我的导师杨代常	何 洋 (204)
热衷于“探索”的大卫·佩里教授	陈 超 (208)
回忆关文发教授在武大工作的日子	李龙章 (213)
珞珈琐忆	罗长超 (221)
父亲的武大时光	朱晓霞 (227)
在武大学习生活的几点记忆	刘寒冰 (231)
炸出的第一班：记乐山时期的武大附中高一班	孙法理 (237)
乐山时期的武大社团	袁 瑜 (245)
20 世纪 60 年代大学生活拾遗：上北京“拜年”	张炳煊 (251)
在珞珈山读书的日子	周 玲 (255)

珞珈文苑

樱顶	陈 勇 (265)
樱花忆	方雪梅 (267)
鹧鸪天·樱园斋舍	丁海军 (269)
江城子·三十五周年聚会	丁延陵 (270)
樱花	胡 昕 (271)
爱的馈赠	傅跃龙 (272)
樱花之恋	李立屏 (273)
珞珈重聚记	李祖德 (274)
雨中的珞樱	梅 朵 (276)
七律·樱园	十一居士 (277)
战斗到明天	
——“六一惨案”亲历记	孙淑云 (278)
一树樱花，终于珞珈山	孙 雪 (281)



武昌东湖赋 陶佳珞 (282)

那一年

——写于武汉校友会 86 级分会成立时 季 成 (283)

樱花大道 邱华栋 (286)

今年的樱花啊，你是…… 吴根友 (287)

珞珈樱花 吴 云 (289)

浣溪沙 王新才 (290)

秋之珞珈 汪晓清 (291)

毕业六十年有感 余传隆 (293)

我的樱花季 余仲廉 (296)

那时的樱花 谢春枝 (297)

忆武大 严孝兵 (299)

珈缘

——武汉校友会 86 级分会在咸宁江南里举行

成立庆典仪式有感 张彩雯 (300)

樱花雨 郑行仁 (302)

念奴娇·同学缘 邹幼新 (304)

大话樱顶 赵运成 (305)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2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308)

征订征稿启事 (309)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311)

卷首语





共同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武汉大学 2022 年新年献词

校党委书记韩进 校长窦贤康

这是 2022 年的初日，第一缕曙光悄然照亮珞珈山下的绿瓦灰墙。

这是 2022 年的开端，迎着朝阳的武汉大学校园跃动着勃勃生机。

在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如约向全校师生员工、向离退休老同志、向海内外校友，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2021 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国进入“十四五”发展新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站在重大历史节点上，武汉大学师生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学校改革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结合中央巡视整改要求，武汉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标准谋划“十四五”发展和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深入推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年，全国人民坚决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战，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在疫后重振进入加速快跑阶段。武汉大学在樱花烂漫时节兑现承诺，热情邀约 2 万多名抗疫医护人员前来赏樱，此举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并受到广泛好评。

这一年，我们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深入推进人才强校战



略，不断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新进高层次人才 200 多名，2 位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 位教授遴选为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新聘 11 位人文社科“杰青”和“优青”，珞珈校园群英荟萃；我们全面落实学生为本，不断改善学生成才环境和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和研究生创新能力，我校学生在 2021 年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上综合排名第四，我校教师在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分析报告中名列第一。

这一年，我们牢记并认真履行高水平大学的使命担当，以科研创新积极参与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我们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武汉大学筹建或牵头组建的武汉光源、湖北珞珈实验室、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重离子医学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我校教师获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成果再创佳绩。我们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和新文科建设，武汉大学建言咨政能力不断提升，我校教师获批人文社科重要成果和重大项目继续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这一年，我们的校友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继续以极大的热忱资助学校的人才引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创下了捐赠的最高纪录。

同学们、老师们、校友们、朋友们，武汉大学每一项办学成绩都离不开你们的奋斗与奉献，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你们的身影和力量。在此，我们向所有武大人和关心支持武汉大学发展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一年之计在于春。展望未来，武汉大学将牢记初心、砥砺前行，迎着 2022 年的春风启航，以党建为引领，继续在高层次人才、高水平学科、高影响平台和高效能治理上重点发力，团结带领全校师生着力开创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时代为己任。我们将把握好“十四五”开端，继续以追求卓越为目标，大力推进“十四五”规划和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方案落地生效。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创新为引擎。我们将继续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大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系，不断提高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人才为脊梁。我们将坚持高端引领、引育并举、创新机制、激发活力，大力实施未来人才储备计划，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建立健全一流的人事人才制度体系，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人才队伍。

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改革促活力。我们将系统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努力使武汉大学成为教职员工职业发展更快、学生成长成才更好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同学们、老师们、校友们、朋友们，2022年，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起跑线上，武汉大学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定践行“两个维护”，全面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着力提升治校能力和办学水平。让我们接续奋斗、勠力前行，以高质量发展的新成绩向党的二十大献礼！

谢谢大家！

特别报道





武汉大学 2021 年十大新闻

一、武汉大学牵头组建的湖北珞珈实验室揭牌， 校地携手打造多个科研平台

2月18日，在2020年度湖北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武汉大学牵头组建的湖北珞珈实验室正式揭牌。实验室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10余家单位共同建设，围绕国家自主可控的空天科技发展战略，以世界前沿科学理论创新、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以空天战略性前沿技术体系构建与自主核心软硬件研制为目标，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系统性科技创新和集成性、融合性产业化实践。会上，李建成院士还获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此外，武汉光源项目、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武汉大学重离子医学中心、武汉大学长三角科技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揭牌或动工，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发展，服务武汉大学“双一流”建设，助推国家科技产业创新。

二、武汉大学以最高礼遇邀请抗疫医护来校赏樱

3月13—14日，共有21000名抗疫医护人员及家人来武汉大学赏樱。武汉大学设立抗疫医护赏樱专场，以最高礼遇盛情邀约医护人员和家人来校，共聚樱花树下，共享春日盛景，共叙同胞深情，



共唱美好祖国。学校组织志愿者为抗疫医护人员及家人提供服务，为医护人员举办了专场文艺演出。“浪漫樱花迎贵客，携手抗疫约你来。”2020年疫情期间，4万多名医护人员逆行出征武汉。2020年3月，武汉大学发布公开信，承诺2021—2023年连续3年为抗疫医护人员开设赏樱绿色通道。学校此举一方面是为了感恩和践诺，另一方面也是以伟大的抗疫精神感染和教育学子，激励他们心怀家国，勇于担当，砥砺前行。

三、我校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3月19日，武汉大学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开。学校精心组织、有力有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求务实、求扎实；用心、用情、用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十大惠民”“十大发展”实事惠及广大师生，高质量建设4栋学生公寓，将校外居住的3000余名学生迁回校内等举措深受好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武大师生通过开晚会、办展览、唱红歌、颂经典、学党史、过党日等多种形式，向党的百年华诞送上真挚祝福。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学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到武汉大学与师生座谈，肯定、鼓励并指导武汉大学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和党史学习教育。

四、武大学子在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 摘得桂冠，师生在多项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7月31日，武大学子在第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上摘得桂冠，成为“投壶行觞”和“机器马术”项目的双料冠军。此外，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全国大学生岩土工程竞赛、全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国研究生人



工智能创新大赛等各项赛事中，武大学子表现优异，取得了出色成绩。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 2016—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结果中，我校以 835 项获奖总数、96.29 分的成绩位列第四，在综合类高校中位列第二。3 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分析报告，在 2012—2020 年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本科)中，武汉大学以获奖数量 136 项、总分 100 的成绩排行第一，这也是武汉大学连续四年在该项评比中荣获第一。

五、泰康保险集团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 支持一流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建设

8 月 22 日，武汉大学迎来建校以来最大额度捐赠。泰康保险集团向武汉大学捐赠 10 亿元，设立“武汉大学泰康医学与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建设一流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提升我国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11 月，黄春华校友通过其私人慈善基金会向母校捐赠 4000 万美元，支持武汉大学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和改善办学条件，这是武汉大学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单笔捐赠。2021 年，雷军、周旭洲、曾文涛、阎志、罗爱平、刘金成、喻鹏、张波、陈作涛、干德义等校友企业家先后向学校进行大额捐赠。陈东升等 15 位校友企业家众筹 1500 万元，设立“武大西迁历史文化保护基金”，为传承武大西迁乐山历史文化、修缮武大西迁乐山旧址助力。

六、武汉大学连续三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1 月 3 日，在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武汉大学主持完成的 4 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李德仁院士主持完成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武汉大学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参与完成的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4 月，4 项科技成果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9 月，武汉大学主持完成的 4 项科技成果分别获测绘科学



技术奖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12 月，武汉大学主持完成的 2 项科技成果分别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我校科研工作者获得多项荣誉：李德仁院士获 2021 年十大“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袁玉峰教授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肖永平教授获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第二届湖北省“最美社科人”称号，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和李德仁院士获首届湖北省杰出人才奖，孙蒙祥教授入选首批湖北省特级专家等。

七、周翔教授、宋保亮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月 18 日，2021 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正式揭晓，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周翔教授、生命科学学院宋保亮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目前，武汉大学两院院士总数为 16 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10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6 人。

八、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获批立项

12 月，由武汉大学牵头申报的两项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由舒红兵院士牵头的“病原体与宿主基础科学中心”和窦贤康院士牵头的“近地空间天气多尺度过程和机理”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准立项，两个项目直接经费均为 6000 万元，资助期 5 年。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位于基金委项目的“金字塔尖”，致力于产出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性成果，形成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学术高地。

九、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 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12 月，教育部发布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名单，“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入选试点建设单位，全国共计 9 家。这是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协同创新中



心、国家高端智库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获批的又一新型重要平台，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继续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体现。此外，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 5 月入选国家首批“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国际法治研究院基金 12 月在荷兰海牙正式创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21 年保持好成绩：9 月，武汉大学共获批 49 项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获批数位居全国高校第四；12 月，武汉大学获批 10 项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位居全国高校第四。

十、付玉璋获“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赵东获“最美大学生”称号

12 月 13 日，由教育部、人民日报社共同指导的第十六届“大学生年度人物”推选展示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付玉璋获评第十六届“大学生年度人物”。1 月 11 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发布 2020 年“最美大学生”评选结果，第一临床学院博士研究生赵东获评 2020 年全国“最美大学生”。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图片有删减）



武汉大学 2021 年度新闻人物:张祖勋

——丈量四海 笃行不怠

张祖勋，中国工程院院士、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他坚持以德立身，攻坚克难，填补国产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设备空白，推动我国数字摄影测量从零开始直至引领国际发展；他坚持以德立学，将价值引领和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培育学生创新思维和家国情怀；他致力教学创新，坚守讲台 60 余载，参加“六院士同上一门课”，主持编写里程碑式教材；他恪守奉献精神，筹资设立多项奖助学金。2021 年，他荣获全国杰出教学奖、“荆楚好老师”特别奖。张祖勋还将此次获杰出教学奖的 100 万元奖金全部捐给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用于鼓励在教学一线辛勤耕耘的优秀教师。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珞珈风采





张祖勋：皓首丹心育英才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

他是院士，更是教师，他还是一名有着 60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怀着科研报国的满腔热血，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毕生耕耘在祖国的科教园地，皓首丹心，矢志不渝。

——题记



6月3日，一场大雨让燥热的江城顿觉凉爽，刚刚在北京参加完两院院士大会返汉的张祖勋院士冒雨来到办公室，为下学期的“测绘学概论”课准备新课件。今年是他讲授这门由六位院士联手、面向大一新生“最奢侈基础课”的第25个年头，而再过两天，就是



他 84 岁生日。

他是一位院士，以一流的数字摄影测量研究成果填补国家科技领域空白，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更是一名教师，61 年坚守教学一线，无论是当副校长期间还是当选院士后，都从未间断亲自上讲台授课，并凝聚起强大的团队，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

2020 级本科生丁怡彤对张祖勋的“测绘学概论”课记忆犹新：开始上课时，他给大家看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带着学生做实验，他的导师、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院士在一旁问：“好玩吧？”另一张是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正在写“数学好玩”四个字。听到这节课“好玩”，同学们都提起了精神……

课堂育人：引领学子走进科学的殿堂

“测绘学概论”是武汉大学一门影响深远的课程。20 世纪 90 年代，测绘学科及测绘行业长期不被社会所了解，测绘学枯燥难以入门，学生对专业缺乏兴趣。如何增强专业课的吸引力和育人功能？在宁津生院士的提议下，1997 年，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多位院士和知名教授联手开设“测绘学概论”课，每人主讲一个章节。张祖勋是这门课的核心成员之一，从课程推出伊始至今从未落下一堂。虽然授课内容早已熟悉，他仍会留出时间专门备课，每年更新讲稿内容，精心修改课件，增补最新资讯。他特别擅长用生动的例子将抽象转为具象，让学生在理解晦涩概念的同时逐渐窥知学科全貌。他认为：“好老师能用简单的方法让学生理解学科本质，而不是把复杂的公式推导满满一黑板。”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所有课堂都有育人功能。六院士的课堂是课堂育人的典型代表，成为武汉大学乃至全国本科教育课堂的一道亮丽风景。院士们用魅力教学培育学生，用家国情怀引领学生，用大师风范感召学生，在课堂上实现了价值引领和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成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标杆，2018 年“六院士同上一门课”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国家的兴旺在人，学术的希望也在人，大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张祖勋认为，作为大



学教师，即使已经成为顶尖科学家，首要任务还是教书育人。在打造世界一流摄影测量软件的历程中，他始终不忘师者的传道使命。一次次理论革新、一项项原创算法、一个个反复试错后的优化方案，都聚沙成塔凝结在《数字摄影测量》这本教材里。这本里程碑式的教材惠及数十万学生和技术人员，对培养专业人才、推动产业升级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如何培养出好学生？他认为传授知识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情怀担当、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多年前，我国野外测绘作业人员工作异常艰辛，并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张祖勋认为，我们推动技术进步，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就是要改善这种状况。他笃信，“发达国家能做的卫星摄影测量，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他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学生，他的课堂始终浸润着家国情怀，一批批学子满怀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这里走向生产一线，成长为国之栋梁。

2021年3月12日，在教育部举办的“读懂中国”活动中与张祖勋的交流，给2019级本科生张茂林、施昀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感受到师者对学生的关怀与期盼，感受到一名科学家对学科的热爱与坚持，更感受到一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初心与赤诚，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信念与决心。”

“要创新，首先必须提出问题。”张祖勋眼中“好学生”的标准是思想活跃，善于提问，与老师讨论甚至辩论。“认为老师和书本都没有问题，那就是最大的问题。”他回忆，自己最初发表的三篇论文，都是王之卓教授鼓励他把对书本的质疑整理成文，推荐发表的。这对他触动很大，从那时开始，他总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他以卓越教育家的眼光看待测绘遥感专业人才培养，注重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他强调：“专业知识是基础，科学思维是大学的灵魂，直接影响着国家未来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专业教学改革中，对大类培养和通识教育他不但进行顶层指导，还在课堂一线躬行实践，将数字摄影测量等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和科研故事引进课堂，极大拓展了学生的科学思维。“通过讲解大数据云控摄影测量等鲜活的实际应用，张老师激发起我们对专业的学习兴趣，引领我们走进摄影测量学科的大门，在我们这些大一



学子的心中播撒下学术探索的种子。”2020 级本科生王华毅听了张祖勋的课后，这样感慨。

科研育人：锻造国际一流的遥感菁英

年轻人是创新的主力军，张祖勋十分重视提拔、重用年轻人，在科研实践中培养新人。他不遗余力提携后学，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说：“每个人的能力不可能画等号，要善于发现年轻人的才能，创造平台让他们施展特长。作为教师，理应担起这个责任。”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张永军博士毕业时，正值团队缺人，张祖勋非常希望他留下来，但当了解到他想出国深造后，便爽快地为他写了推荐信。现任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的柯涛，博士期间就显示出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毕业两年还是讲师，张祖勋便让他负责一个国防型号项目，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很快成长起来。2010 年，张祖勋想把段延松从适普公司调回武大，由于没有工程师职称，调动难度很大，有人劝他算了。他说，人才难得，一定要试一试。段延松终于调回团队，成为得力干将，取得了不少开创性成果。高级工程师徐轩总也忘不了 30 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时他是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被大家称为“千手观音”，当引进的国外先进设备出毛病、大家都傻眼时，他准能修好。当学校选派各系的系主任赴欧洲考察学习时，张祖勋毫不犹豫地把机会给了并不是系主任的徐轩。他说，工科领域不仅要有好的教授，也要有优秀的技术人员。

指导科研，张祖勋喜欢说三句话：“科研是好玩的事”；“不怕慢，就怕站，更怕忘”；“你做的东西能用吗？”这三句话包含着他的实践育人理念：

——激发兴趣。只有快乐地学习和研究，才能把专业学好，把科研做好。“摄影加上测量多好玩啊，把照片处理成三维图像，就像艺术品一样。”经他这样一指点，学生兴趣大增。他还经常和高考“被选择”的学生交流：不要对专业失望，兴趣都是可以培养的。有感于现在年轻人对网络游戏的兴趣，以及成年人对麻将和扑克的



兴趣，他说：如果能够把他们的兴趣导引到对人类有利、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上来，那该多好啊。



张祖勋指导学生创新

——坚持不懈。看准了的事就要坚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78年，当王之卓提出全数字化摄影测量的观点时，国内外测绘界都认为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作为王之卓的得力助手，张祖勋从零开始，带领团队历经14年艰辛探索，推出了中国首个全数字化自动测图设备，于199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没有就此止步，几十年来，张祖勋带领团队在航空航天影像自动化处理方面取得了系列国际一流的成果，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VirtuoZo使我国跻身国际前三强，新一代航空航天遥感影像数字摄影测量网格处理系统DPGrid，又一次实现我国的摄影测量生产跨越式发展，并授权美国ESRI公司全球推广，是我国测绘遥感领域唯一实现核心技术出口的研发成果。他常回忆起导师王之卓对自己唯一的一次批评：“人不怕慢，就怕站。坚持很重要，认准一个目标就要坚持下来。”老师的这些话至今犹在耳旁，他也总是鼓励自己的学生，遇



到难题不要轻言放弃，不要忘了初心，许多事情只有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你要走，哪怕走弯路也不要紧，但你不能站着不动，你得不停往前走，执着地去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立足实际。必须做有用的研究，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福是出成果，而且成果被社会承认，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作贡献！”这就是张祖勋的幸福观。胡翔云喜欢鼓捣小程序，做出来后得意地拿去给导师看。张祖勋先肯定他有创意，接着便问：“你这个有用吗？”胡翔云顿觉醍醐灌顶：是啊，这纯粹是自娱自乐，有什么用呢？他从此换了思路，立志用所学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地震。5月18日凌晨1:00，张祖勋团队连续工作24小时后，利用他们的最新技术成果DPGrid，将完全非常规的航摄影像制作出震区首个数字地面模型与正射影像图，直观地显示灾害现场，对抗震救灾、生命救护的部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张祖勋教育学生做“有用”的科研，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正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典范，它广泛应用于国土资源、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三峡等重大工程以及文物三维重建与修护等领域，产生经济效益逾亿元；用于无人机测绘更是创利20多亿元。学生们也在研究、实践、再研究、再实践的过程中学到了真本领。

师道传承：赓续学科发展的精神力量

1976年，张祖勋被派往瑞士最先进的航测仪器厂学习。他至今记得瑞士技术人员对他说：“你们中国人连我们仪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也造不出！”张祖勋下定决心，要让中国的测绘遥感技术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凭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带领团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令国际同行刮目相看。这种精神深深感染和鼓舞了一批批学生，凝聚了一个强大的团队。2010年，胡翔云从美国ERDAS公司辞职回国，加入张祖勋团队。他说：“我是在老师的感召下回国的，要以老师为榜样，扎扎实实



为国家做一些有用的工作。”这是一种师承，这种师承从老师的老师开始，一直延续。张祖勋早年求学时，学校荟萃了全国测绘界的精英，大师的言传身教让许多学生深深爱上了测绘专业。前辈的指导和鼓励成为他一生进取的动力源泉，并决心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师生们至今难忘这温馨的一幕：2007年6月5日恰逢张祖勋院士70岁生日，当来宾和师生向他祝寿时，他先向自己的导师王之卓院士铜像敬献花篮，表达对恩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而他的学生、年过花甲的张剑清教授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恭敬地站在院士身边；在随后的学术报告会上，一双双年轻的眼睛求知若渴，学子们被院士题为《数字摄影测量30年》的报告深深吸引。这一幕情景，生动地表达了学术的一脉相承和精神的代代相传。

武汉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如今已稳居世界第一。张祖勋认为，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在于人才的接力、精神的传承。他说：“王之卓先生是当代中国测绘教育的先驱，为测绘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其中包括5位院士。这比他自己的学术成果更有价值。”张祖勋接过接力棒，传承好师风，坚守三尺讲台，潜心培育新人。他61年的从教生涯，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其中有杰出的学者，如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最高科学奖获得者吴晓良教授、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张力研究员等；有业界知名的企业家，如四维图新公司创始人孙玉国等；还有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他的身边，从年逾古稀的张剑清教授，到他担任指导老师的不满20岁的本科生，少长咸集，人才济济。如今，他把手中的接力棒传给年轻教师，扶上马，送一程。“荧荧红烛，巍巍师魂，身立杏坛，首修人品……”在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教书育人奖”颁奖典礼上，教师齐诵《师德铭》，场面十分动人。

2017年，张祖勋向学院捐赠100万元，倡议设立“教书育人奖”，鼓励教师热爱教学、钻研教学，奖励深受学生爱戴，在教书育人、教学改革与建设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将“让最好的教师培养学生”的风气传下去，将严谨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踏实肯干、追求真知的作风传下去。获奖的桂志鹏副教授感言，设立



该奖激励了我们对教书育人初心的回归。“我时时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大家渊博的知识、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谦逊和藹的处世态度，还有对后辈对学生满满的体恤和真挚的关爱。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像张院士一样得到师生们发自内心的敬意，这是一名教师回味人生时最值得自豪的。”为了“教书育人奖”的可持续性，张祖勋还发挥社会影响力，找企业和校友赞助，直到他的学生、知名企业家孙玉国主动请缨：“以后我把这个奖包下来！”他才放心。

每次交特殊党费，他都最积极，汶川地震 1 万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1 万元……他对贫困生更是关爱有加，多次向四维图新、东方道迩等校友企业募捐，分别设立了 50 万元、100 万元的奖助学金；团队用先进的数字摄影测量技术为中航四维公司解决了技术难题，他也将企业所付酬金全部用于设立奖助学金。在他心中，学生永远是最重要的。报奖他从不排第一，发文章从不挂他名，学生参加国际会议，费用不管多高他都爽快答应……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乐乎！培养人才是使事业后继有人的永恒课题。一代代学生跟随老师走上测绘遥感事业发展之路，谱写了师道传承的动人篇章，也是张祖勋院士毕生最大的幸福。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6 月 21 日，图片有删减）



冯天瑜：潜心学术 锐意著史

明海英

学人小传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明清文化史札记》《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他曾荣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荆楚社科名家”，也是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汤用彤学术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得主，多项研究成果被译为英、日、西班牙、韩文出版。





2015 年以前，记者在学术活动或文物展览上多次遇到冯天瑜。他非常谦逊、随和，曾在会场间隙、展览现场接受记者采访。

2015 年，冯天瑜经历了一次大手术，术后一度病危；2016 年，他被诊断为癌症，当时医生表示极不乐观。之后的 4 年多，他多次住院。病床上，他坚持阅读，笔耕不辍，整理出版多部专著。

2021 年 6 月 17 日，记者拜访冯天瑜时，他从书房缓步踱出。这个他每天伏案工作的书房里，10 个大书柜摆满了不靠窗的三面墙。在打开的电脑文档上，记者看到一部正在撰写的《周制与秦制》书稿，当时已有近 20 万字。为赶在 80 岁时完稿，冯天瑜每天都工作七八个小时。

交谈中，有出版社打来电话，沟通书稿翻译事宜。记者了解到，2021 年 1 月，“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启动本年度项目，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元典十讲》《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同时入选，将分别译为德文、英文在海外发行。

博览少年深受史学熏陶

冯天瑜出身书香之家，父亲冯永轩是史学教授，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让冯天瑜较早接触到历史文物，深受史学熏陶。

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期间，他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省图“住读八年”，博览中外名著，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冯天瑜说，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经典作品，但早年从文史名著获得的中西文化体悟，对后来深入理解历史问题，尤其是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大有助益。

少年时，冯天瑜喜欢阅览游记和地理书，甚至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如数家珍地说出各地面积、人口、简史及国民经济总产值。20 世纪 80 年代，冯天瑜与陪同的外国友人纵谈该国自然、经济，令对方大感惊讶。他表示，地理常识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



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知人论世”说，体察古事古人如历其境。

看到冯天瑜喜爱文史，父亲冯永轩甚感欣慰。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连续几个寒暑假给冯天瑜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每天晨起，父亲手中从来不持片纸，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朱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而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从早到晚，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冯天瑜说，小时候他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由泛览进而精读，默识深思，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其转折发生在1962—1965年父亲庭训这段时间。当时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才深知其重要。

走入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人生，用冯天瑜自己的话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调到湖北大学历史系。“我30多岁才初入学术门墙，即深感理论思维紧要。读了一些思想史名著，渐渐被《读通鉴论》《明夷待访录》《历史哲学》所吸引。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冯天瑜说，《明夷待访录》的“新民本”观，成为他追考中国思想史的指针；他曾反复精读《历史哲学》，深受其整体史观、辩证史观的启迪。这3本书成为冯天瑜的“看家书”，既“观其大略”，获得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架构，又采取“多遍读经典、每遍攻克一主题”之法，熟悉其精义。

深入探究中华文化生成机制

从1980年开始，冯天瑜致力于文化史研习。40多年来，他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中华文化史》到《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冯天瑜认为，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业绩记述，绝非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共



业”。由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共同合成的深层“文化结构”，是推动及制约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亦决定了民族国家的集体生存方式。在2021年3月出版的《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中，冯天瑜强调：“人类的生态战略须作路径抉择，应当扬弃直线进化的惯性思维，辩证地综合人类全部生态经验。”

研究中，冯天瑜尤其注意考察推进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他不仅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内化过程”，还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在重视结构分析，揭示隐蔽在深层的、决定集体生存的结构性力量的同时，冯天瑜丝毫不忽视人的历史主动性，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冯天瑜总是强调将历史信息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致力于说明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张岱年曾称之为对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始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并从一个长时段提供理论研究的独特价值，是冯氏学术研究的基调。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对记者说，社会大转型中的文化现代化问题，与历史学和文化史研究命题息息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冯天瑜体现出作为一个学者的理论自觉，既援引时代入学术，又以学术呼应时代急需。

在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多维结构”中，冯天瑜近年来尤重“制度文化”与“生态文化”两个方面的探讨。“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古代史上长期互渗互动的两种国家制度，儒家和法家的学说是这两种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他在编撰中的《周制与秦制》的“题记”中说：“‘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对基本范畴，它们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生成、演化，并非由某些个人‘顶层设计’左右其兴灭。生态环境于因革间持续维系，三千年周制与两千多年秦制未成明日黄花，若干变异着的要素仍与吾辈共生同行。”其著述目的是：“概述周制、秦制内涵，简析二者的历史功能，及其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效应。”此前，冯天瑜曾在《“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著作中略涉此题，然言未尽意，故运用二重证据法及古今中外比较法，续作抉发，以还原两制状貌。这也是冯天瑜目前正全力以赴努力工



作的重点。

持续推进区域文化研究

冯天瑜的区域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贺觉非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当时，贺觉非交给冯天瑜大量手稿和资料卡片。在认真考订、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冯天瑜着重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问题，逐一爬梳，重新考证。

“做历史研究，亲临历史现场，对当事人进行访谈，充分搜集口述史材料是非常必要的。他同时提醒我，人是感性的动物，研究一个人物久了，会对这个人物有偏好，研究一个地方久了，便会产生一种乡土情结。因此，在进行史料分析时，要学会排除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不能以今人之好恶来定古人之是非。而应当尽可能广泛占有史料，以中立的态度，公允地立论。”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周荣说，在《辛亥武昌首义史》中，冯天瑜以这种态度纠正了不少访谈资料的缺失。

对于史籍记述分歧、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史事，冯天瑜进一步缜密考订，提出了诸多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其中就包括与合作者贺觉非不同的研究成果：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大江报》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作者并非詹大悲，而为黄季刚；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月9日，并非10月8日；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并非熊秉坤，等等。这些研究结论颇受学界关注。

“学术研究是否步入前沿的两个关键题旨：新材料和新问题。掌握新材料，用以研讨新问题，方得以参与时代学术潮流。”冯天瑜说。他的著述习惯不同于他人，材料搜集、题旨锤炼、结构形成，大多历时较长，一般须数年以上，有的准备工作不下10年。对于所需史料，冯天瑜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并坚持赋予周密的考证。在史料来源方面，尽可能追寻原始史料；在形式上，不仅包括文字史料，更包括各种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的历史遗物，甚至



扩展到亲自采访得到的口述史料；在时间跨度上，力求从源头追溯，不留遗漏；在地域范围上，不仅包括境内的史料，更包括境外各种有价值的史料，只要力所能及，总是不遗余力地追寻。

1996年，冯天瑜赴日本爱知大学（东亚同文书院前身）任专任教授，开始接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史料。1998—2001年，他讲学爱知大学，广泛浏览了这批文献并做初步研究，后又在北京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学，得以浏览包括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在内的相关文献；又与爱知大学刘柏林教授采访多位东亚同文书院在世老校友，获得口述史学材料颇丰，逐步知晓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年间中国调查实态，渐次了解上述文献的学术价值。

自1996年始，冯天瑜著文《日本“中国学”的启示——访问爱知大学有感》，率先向中国学界介绍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又陆续编纂出版几种调查材料选译本，如《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等。此外，他还完成了与此有密切关联的其他几种著述，如《“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日本对外扩张的文化渊源》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周建波表示，冯天瑜在研究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时，特别关注日本人当年考察中国的动机，并借以反思国内调查研究的开展，重视与文化史相关联的研究。在冯天瑜的大力呼吁和积极努力下，有关东亚同文书院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在基础资料翻译引介方面补充完善，利用调查资料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研究两个方面不断拓展。2015年以来，线装书局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先后影印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编著的《中国省别全志》（50册），由冯天瑜主编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册）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250册）。这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提供了便利的资料条件，是冯天瑜对东亚同文书院研究作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2017年秋，冯天瑜在病床上构思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一书的详细纲要。经过两年的研究、讨论，几易其稿，该书第一稿于2019年夏完成。2020年，该书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



重大项目立项。冯天瑜强调，发掘、整理、研究东亚同文书院有关文献的意义在于：其一，具体认识近代日本探检中国的用心之深、用力之勤，以引为警示；其二，增进国人对社会调查的重视，期以改变中日间关于国情的信息不对称局面；其三，获取研究清末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量实证性材料，并借鉴其系统、精密的调查方法。

“东亚同文书院的资料尘封已久，但冯天瑜先生通过有限的几次学术交流便能够敏锐地发现其价值，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努力发掘，积极向国内引进，这绝非偶然。”在周建波看来，冯天瑜能够率先发现，并在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是因为冯天瑜学术视野宽广，善于将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相结合。他践行“二重证据”方法论，长期以来致力于开掘异域史料，故能借“他者”之眼重新审视已有之历史结论。

拓殖“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

冯天瑜治史，一贯奉行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力求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先父的治学精神及方法对我日后研究，多有浸润、启迪。先父潜移默化中教给了我考据功力。”冯天瑜回忆道，少时常听父亲提及清人考据繁密，言必求据，如法官审案，孤证不決，务求旁证、反证；从同一源头发展来的一连串证据的母子证，不及来源并列的若干证据的兄弟证有价值等。成年后，他接触过乾嘉学者的论著，从事研究工作后更时常翻检这些书籍。这让他明白，考据精神是全体学者的必修功课，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既以“实录”为治史目标，也就格外需要相当的考据功力。

考察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是冯天瑜长期以来的用心所在。“表达概念的词(字)，是语言中有独立意义的微观世界，是文献、文化的缩影。”通过掘发关键词在古今-中外坐标系间的意义演进，以迎接“文化史研究的读词时代”降临。冯天瑜认为，这一“知识考古”，可以帮助我们窥见“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汉字文化



坚韧的主体性、涵泳万方的包容性和行健不息的生命力，或许可于其间洞若观火。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冯天瑜通过对“革命”“共和”“科学”“文化”“几何”“上帝”等核心术语的辨析，揭示明末以降，特别是清朝民国之际中西日文化交会间的思想因革状态。讲学日本期间，冯天瑜接触到东亚的语言传播问题，开始研究近代新语，并出版《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等著作，以揭示近代以来文化术语在中西日之间的传播路径，展现近代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会状貌。由此，他致力于探讨“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模式。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是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更为准确地解释历史；以关键词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通过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蕴藏的丰富历史文化意蕴。傅才武表示，这种语义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融合无间的研究范式，显示了其“有容乃大”的学术气象，在考论关键性术语的古今转换和中西对接中，显示了“一词一世界”的学术张力。

在具体研究中，历史文化语义学分为两种路径，同是这一范式经典之作的《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与《“封建”考论》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路径。前者注重一群术语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面”的展开，通过对近代社会与文化各领域新生术语群的考察，来建构对于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后者则强调一个概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点”的深入，通过对“封建”这个概念作历时性考析，从总体结构上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深刻地阐释了陈寅恪所言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精义。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旧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通用，未生异议。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中日两国用“封建”一词翻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此新名的基本内涵仍然与“封建”原义相通。20世纪20年代开始，来自苏俄的“泛化封建”观强势降临，把“以农业



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自1949年以降，正式颁行的历史学教科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及整个文化宣传系统皆沿袭此说。

冯天瑜初入学术研究时，也不假思索地运用这种论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系统阅读经典史学著作后，我对‘泛化封建观’渐生疑窦。思路的整理、明晰化和渐趋深入，得益于和中日师友的切磋。”

《“封建”考论》2006年初版，一年之内连印3次，皆售罄，一时间洛阳纸贵。在吸纳各方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进一步的史料考析和义理思辨，冯天瑜又对初版进行修订补充，并于2007年9月出版第2版。不久，该书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第一辑。在第2版基础上，冯天瑜作了结构上的归纳调整，内容上亦有所补正充实，于2009年12月完成《“封建”考论》修订版，2010年10月面世。此后又出版了线装书版，至2020年共发行了5版。

《“封建”考论》甫一问世，即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10月，武汉大学召开“‘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讨论会”；2007年10月，北京史学界召开“‘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联合举办“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曾说：“一本著作连续3年分别在中国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区的文化中心地带引起连锁讨论，在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这本身就说明其影响力非同一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表示：《“封建”考论》的学术贡献在于“流行与沿用已久的‘封建论’应当受到质疑，由此而生成的这则‘现代寓言’必须破解，还其本义，这就是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

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

冯天瑜治学勤奋，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耳闻目睹。近年来，冯天



瑜承受重疾之苦，依然勤耕而不辍，甚至多次刚下手术台不久，就埋头于书间笔头。

“冯先生特别勤奋，不论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中，他都能静思与撰著。”原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说，他晚年的大著都是在病房里、病榻上写成的。医生多次宣判他生命的期限，但他似乎无暇消沉悲戚，反而抓紧分分秒秒，专心专意思考理论、历史的问题，一门心思写书。随着一部部深具“问题意识”的高品质专著问世，他的精神与肉体生命得以升华，得以延展，此后病魔竟奇迹般退却。他的老友、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感喟：“这种精义入神之后能产生正能量，化淤克滞，带动元气生发。可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冯天瑜追求学术心无旁骛，在各种荣誉、头衔面前，他总是谦让。20世纪70年代后期，冯天瑜一再拒绝“进京任职”；1984年、1986年两次拒绝担任校长的任命。在湖北大学任教的10余年间，领导曾几次协商让其履校长之职，他却坚辞不受。为此，他给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信，详细申述了想法，一再声明这种安排是避其所长，用其所短，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选。

“远权贵、拒妄财”是冯家“未成文的家训”。“父母一生清贫自守，淡看金钱，‘有饭吃即可，何必追求多财’是冯家口头禅。”冯天瑜说，家中的衣食非常简朴，工资半数用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几十年下来，数量可观，且多佳品。“自20世纪50至60年代即有人求购，父亲总以‘非卖品’相应。”冯天瑜告诉记者，2015—2018年，他整理的冯家藏文物图册《冯氏藏墨》《冯氏藏札》《冯氏藏币》经长春出版社出版后，“冯氏三藏”逐渐为人知，内地及香港欲以高价收购者不时与他直接或间接联络，皆被谢绝。

1979年年初，冯家将所藏古币全部捐赠武汉师院刚复建的历史系。受父母影响，冯天瑜兄弟坚守“收藏而不贩卖”“取自社会，回馈社会”的冯家原则。2018年，冯氏两代学人将长达半个世纪间收藏的珍品悉数捐出。冯家“以守护文化为职志，视家藏珍品为天下公器”的精神，堪称今世美谈。

由于捐赠的文物和艺术品数量庞大，仅书画就有400多幅，武



汉大学特设“冯氏捐藏馆”，并于2018年12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开馆仪式上，有地方媒体采访时问：藏品价值多少？记者曾参与报道，至今依然记得，冯天瑜说，他对文物市场知识几近空白，也于此难生兴趣。幼年时，他父亲每有收获，都是为文物的史料价值和艺术魅力欣喜、沉醉。

“今日追忆、揣摩，参照藏品及相关文献提供的线索，每能打开新的认知门径。”冯天瑜说，40多年来，他不时于清夜翻检图籍、把玩藏品，沉醉于历史现场感，在与先贤对话、相与辩难之际，思逸神超，偶尔迸发出意象奇瑰的火花，这无疑成为冯天瑜研习中华文化史的一种知识补充与灵感源泉。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9月22日）



武大，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地方

——于刚校友在电子信息学院教学科研大楼
捐赠奠基仪式上的致辞

于 刚

尊敬的窦校长和校领导，尊敬的李书记、龚院长和院领导，尊敬的老师们，师兄师妹师弟们：

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与我和宋晓一起齐聚母校校园，为新的电子信息大楼奠基，希望我们铲的这一锹土能为母院翻开一页新篇章，助力母院攀登科学和教育高峰，进入国内乃至国际一流学院之列。43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从一名农业机械厂的工人，来到位于珞珈山下、东湖水畔的中国最美（没有之一）校园，启航了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旅程。母校既开放又严谨的学风赋予了我创新和创造的能力，也培养了我缜密的逻辑思维，让我在职业生涯中既寻求视野和远见，也不失去对细节和过程的关注；既追逐远大的梦想，也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母校秀丽多姿、精美之至、依山傍水的景观孕育了我涵容的气度和浪漫的情怀，让我破茧成蝶，成为一个敢作为、敢担当的男人，也有幸寻觅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入校三年后，以珞珈为缘我结识了当时的学妹、后来的爱妻宋晓，冥冥之中人生的剧本早已谱好，仿佛我专门在此等候她来，也宛如她特地寻我而至。由此，我们的孩子也承接了母校的基因。在母校，有幸和跟我一样阳光、青春、进取，对知识如饥似渴的师兄姐妹们一起寒窗四载，度过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让我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友情的温暖。我珍惜这1460个日日夜夜，珍惜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塑造了我的芳华。从母校毕业后，我们留学、



就业、创业、再创业，满怀激情，不惧坎坷，砥砺前行，母校的校训渗透于我们的理念和行为之中。正如我在《珞珈缘》的诗中所述：母校给我们最大的馈赠，是胸怀、智慧、坚韧、信念。我和宋晓一直希望能回馈母校，回馈母校，回馈这形成和滋养我们世界观的殿堂。有了根，才有大树、才有枝繁叶茂。我俩非常荣幸能为母校和母院的建设尽微薄之力，用我们有限的财富帮助母院建一栋可以长期发展的大楼；也希望未来看到我们的小学弟小学妹们能在这栋楼里开心学习、健康成长，成为国家和社会之栋梁；在亮堂的阶梯教室里听教授传道授业，在现代化设备的实验室里专心科研，在丰富齐全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在宽大的报告厅里倾听大师演讲。让我们当学生时的渴盼成为现实！期待母院由此筑巢引凤，能吸引更多科研人才、一流教师和优质学生，能在学术研究和人才教育上更上层楼，成为学术界的标杆，母校的骄傲，院友的光荣。

这将是我和宋晓一生最诚挚的礼物！

谢谢大家！





周翔与他的三尺讲台

钟焯 赖润泽

“生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的区别是什么？”问题抛出后，来自各专业的 200 多名学生开始各抒己见，气氛顿时热闹起来。

这是 11 月 22 日晚武汉大学通识课“魅力化学”的课堂场景，在台上授课的教师正是 202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周翔。自担任武大教授的 20 年来，周翔没离开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实验室，另一个便是本科生课堂。

通识教育，让学生看到化学魅力

22 日 18:30，周翔走上讲台，从“今日化学何去何从”“化学中存在什么二级学科”等问题出发，引入本节课堂主题——核酸化学生物学。核酸化学生物学也是周翔长期致力于研究的领域。近年来，他带领学术团队通过小分子对核酸的识别和功能调控，开发核酸靶向药物分子和重大疾病诊断技术，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如何把晦涩的学科概念讲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听，听得懂又爱听，最终建立一定的认知？周翔想出一招儿——故事切入。

从 DNA 双螺旋结构、肌红蛋白三级结构的发现到冷冻电镜的发明，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他瞬间就把学生们吸引到神秘的分子世界，又穿梭在科学历史的长河中。

“生物化学是研究生命体内所具有的化学组成、结构和化学过程的学科，化学生物学则致力于利用外源化学物质、方法或途径在



分子层面上对生命体系进行精准修饰、调控和阐释，外延相对更广。”“层层剥洋葱”之后，周翔解开了课堂伊始提出的问题，学生们豁然开朗。而后，他又通过“以 mRNA 为基础的新冠疫苗”“基于核酸的肿瘤早筛早诊、液体活检技术”等前沿热点，向学生们展现出核酸化学生物学研究的价值意义。

“周老师很喜欢提问，课堂互动很多，我们的参与感很强。”下课后，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2021 级本科生严雨洋说道。整堂课下来，周翔循循善诱，提了不下十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好似一个指路牌，让学生驻足思考，又一道“柳暗花明又一村”。

计算机学院 2019 级本科生黎谢之则深深感叹周翔老师的严谨作风。“在讲授一些细节概念的地方一点都不含糊，比如在讲解到细胞内催化反应时，周老师与我们交流，虽然有同学答到‘发生了一些反应’，但周老师却积极引导同学讲出‘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黎谢之觉得，这种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是各学科都必不可少的。

周翔课上提到，“相比于院士称号，我更加在意老师的称号，我要上好每一节课”，这句话也令学生们印象深刻。他说道，作为老师，有义务和责任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传授给新一代，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化学，了解化学的重要性，以及化学的未来发展，为所有学生提供“接地气的化学知识与思维方式”，这也是他理解的这门通识课的意义所在。

交叉融合，激发学生科研动力

除了讲授通识课，周翔还长期主讲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的本科生专业课“化学生物学导论”。这是一门面向大三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周翔指出，化学学科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后正积极地向下游延伸，参与解决更多国计民生问题，逐渐与材料科学和生物医学交叉，形成多种交叉学科，其中化学生物学成为化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向。



之所以把课程设置在大三，也与他秉持的“固本强基，厚积薄发”理念息息相关。“我们新生进来，一定要把数学和物理基础打好。学习的内容很多，但对我们化学学习非常有帮助，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无机化学都跟它们密切相关。只有打牢了基础，才能进一步对学科的新知识、新方向做深入探索。”周翔进一步解释，到大三的时候，学生已经把化学的基本内容学习了一遍，了解化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开设“化学生物学导论”，他的初心就是希望带领学生通过化学的手段、化学的方法来研究生物学和医学的基础问题，看到化学在其他领域有其施展拳脚的地方，进而激发学生深入学习化学的驱动力。他常常跟学生们提到，从分子水平上去观察研究生物和医学方面的某些过程、变化，化学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更能够发现深层次的发病机制，不管是诊断还是治疗，它都会有很大的作为。

以核酸表观遗传修饰这一研究方向为例，周翔在 2010 年时开始投入精力开发化学探针对核酸修饰进行识别和检测。到目前，核酸表观修饰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的热点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于 2017 年启动重大研究计划开展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的研究，这一领域对重大疾病如肿瘤的早筛早诊和新药发现方面均有非常好的



应用前景。

的确，化学生物学勾起了不少学生的研究兴趣。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袁可欣，在大三时就抱着多了解一些化学生物学专业知识的想法联系到周老师，希望进入实验室进行业余科研。

她还特别提到，自己在推免研究生面试前非常紧张、自信心不足，甚至一度逃避准备，“这时候，周老师的一通电话鼓励了我——‘基础都很扎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袁可欣随后顺利获得推免资格，如愿以偿地正式加入周老师团队。

健全人格，培育真正的栋梁之材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自己的学术团队中，周翔始终把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摆在育人的首要位置。他认为，武汉大学作为一所高层次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对国家和社会都有重大的影响，甚至是方向性的，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要为社会培育真正的栋梁之才。

“所谓栋梁之才，就是要担当很大的责任与义务，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周翔说道，这个贡献可能并不一定源自从事化学研究，毕业后可以有很多选择出路，包括继续研究、前往成果转化的企业、做行政管理等，但在武大学习期间树立起的价值观念、汲取的综合性营养是起到奠基作用的。

“这 20 年来，实验室的研究生们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依依不舍地离开。”2002 年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加入周翔团队，如今已是团队重要一员的翁小成教授这样形容实验室的气氛。他提到，周翔会针对不同性格、背景和能力的学生，有不同的培养方式。无论是从事何种行业的毕业生，谈起读研阶段，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老师张弛有度的管理、倍感温暖的鼓励以及语重心长的指导，还包括在团队学习期间养成的格局、眼界和团队协作能力。



“我希望通过我，学生不仅仅知道什么是化学，而是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学习，知道如何去适应这个社会，怎样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周翔将这种从科学素养到人格健全的差异化、全方位培养理念贯穿在课堂和研究生培养始终。

在“化学生物学导论”课堂上，每位学生拥有一次做一场 10 分钟演讲的机会，周翔希望以此培养学生在短时间内把某个研究内容展示出来的能力。“不能就埋头在实验室，还需要传授，还需要输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希望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的自信心以及表达技巧，不管是否从事科研，这两个因素的提升都会让学生终身受益。

在团队中，他尽可能让每位研究生在承担科研任务的同时担任一项实验室管理任务。2020 级硕士研究生薛小宸负责管理 Qubit 定量仪器。他坦言：“实验室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交流，进行课题需要与老师、师兄师姐交流；管理仪器，需要为新手讲解仪器的原理、使用方式与注意事项，仪器有问题需要及时了解查看，同时有使用不规范的情况需要及时指正，这些无一不涉及说话的艺术。”在管理实验室过程中他感悟到，管理工作不仅仅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还要加强与他人的合作与沟通，在交流中找出求同存异的方案。

周翔的培养理念也深深影响了翁小成。如今，他在指导学生时最重视两点：一是以身作则投入工作，保证学生有合适的选题，并且有及时的指导，“这一点我做得还不够，周老师虽然事务繁多，但是几乎每天对学生的学业都会过问，目前团队一半的研究生都是周老师直接指导”；二是学会站在学生角度思考问题，“实现和周老师一样张弛有度的管理”。

翁小成认为，学生和老师之间虽然有共同的科学问题要解决，但是由于需求和追求不同，会存在很多不同的想法。因此，老师除了在学业上给予足够的指导之外，还需要了解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和需求，调整与他们相处的方式。这也是长期在周翔团队中潜移默化产生的影响，让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确实是在帮助他并且理解他的



一些想法。

20年来，周翔已经培养了70余名博士和20余名硕士研究生，无数学生从他的课堂学到化学知识，悟到人生哲理，走向祖国大地。20年初心不改，周翔将继续行进在教书育人、科研报国的征途上。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2021年12月10日，图片有删减）



陈锐志：一位学者 40 年的“定位”故事

肖 珊

芬兰当地时间 2021 年 4 月 23 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锐志收到喜讯，他当选了芬兰科学与人文院（Fin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院士，是目前该院唯一的华人院士。

凌云志，尽翱翔。从 1981 年考入武汉测绘学院（现武汉大学信息学部），而后的 40 年，尽管地理位置的“定位”不断发生改变，但学术主题和内心情感的“定位”始终未曾改变。近日，这位从事智能手机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和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的学者，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科研和育人“定位”故事。



陈锐志近照 科普中国供图



洄游：从北京到芬兰，从美国回武大

1985 年春天，一位学者全 A 通过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从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返武汉测绘学院讲台；同一年，该学院一位大四的毕业生，带着学者的博士毕业论文油印本去国家测绘局报到。

那一年，从德国学成归国的学者是李德仁院士，意气风发的毕业生是陈锐志。而今，他们都是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领军人物。

潜心积累，学成报国；循着初心，科技强国。两位学者的轨迹里，蕴含着同样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

陈锐志 40 年的求学和工作轨迹，是一个典型的“洄游”样本：武大一国家测绘局（北京）—芬兰—美国—武大。

在国家测绘局工作一年后，1987 年，陈锐志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行囊里，仍然装着李德仁院士的博士毕业论文油印本，冥冥之中像带着一份来自母校的信物。

博士毕业后，陈锐志在芬兰大地测量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员，去芬兰诺基亚公司当了四年工程经理，在此期间又拿到了计算机硕士学位。

随后，陈锐志回到芬兰大地测量研究所担任导航定位研究室主任，成为该研究室的终身教授（一个研究室只能有 1 位教授，因此审核程序很严格），他是芬兰聘任的第一位华人教授，还得到了芬兰总统的特许（这个职位需要芬兰语达到母语水平，若不满足这个条件，需要总统特许）。

在芬兰工作了 26 年以后，陈锐志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进行重新“定位”，于是，他前往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在美国工作期间，他觉得手机室内定位导航方面的研究不够多、发力不够，于是，他带着这些思考回到了母校武大，因为这里有国际上排名顶尖的测绘遥感学科。

“芬兰与武测、国家测绘局的学术合作关系良好，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国内求学和工作时受益于此。后来，我在芬兰攻读博士学位和工作期间，也全力促进中芬测绘科技合作，积极充当中芬在测绘领域合作的‘催化剂’。”2016年，陈锐志回到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着力开拓中芬学术合作新路径。

科研：从室外到室内，从地面到天上

陈锐志是导航定位领域国际著名学者，致力于智能手机室内外无缝导航定位和低轨卫星导航增强的理论研究与核心技术开发，推动我国北斗导航系统的服务从室外拓展到室内，从地面提升到低轨空间。

陈锐志与这一研究领域的结缘，至少要回溯到20多年前。

2001年，芬兰大地测量研究所成立导航定位研究室，陈锐志通过严格的考核，获聘研究室主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规划研究室发展方向。结合曾经在诺基亚手机部的工作经历，以及对LBS(基于位置的服务)技术的关注，陈锐志选择了“室内定位技术”这一冷门方向。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只要进到芬兰馆，就会看到提醒游客打开手机蓝牙的提示。随后，当你走进展馆内的展点驻足观看时，手机就会收到相应的资讯网页链接。

现在听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放在十多年前的背景下，引来了不少人的好奇，这是当时芬兰馆的一大特色。该项目更是成为上海世博会的示范项目，登上了美国导航领域期刊GPS World的封面。

上海世博会芬兰馆是陈锐志的第一个室内定位项目，“第一次在手机上做了三维导航”。事实上，由于当时的手机计算能力较差，要在手机上做导航和定位面临着如今难以想象的困难。

2016年，陈锐志担任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同年7月，由他主持的“高可用高精度室内智能混合定位与室内GIS技术”获得“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正式立项。



谈到目前的研究工作，陈锐志用一句话概况：从室外到室内，从地面到天上。

2020年，北斗完成全面组网，北斗系统成为中国实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35年前，（北斗）还将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为科研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目前，北斗无法做到室内定位，也无法离开地面 CORS 网络提供高精度服务。陈锐志解释：“从室外到室内”是指，把北斗的服务能力从室外拓展到室内，形成“室内外无缝”的闭环；“从地面到天上”是指，通过“珞珈一号”试验卫星，探索将地面上的 CORS 基站搬到天上的可能性。

由于北斗信号无法穿透室内空间、室内定位精度低，陈锐志团队突破了基于音频的智能手机室内定位技术。与目前广泛采用的蓝牙定位技术相比，其信号作用距离从5~10米扩大到50米，测距精度从2~5米提升到0.12米（实验室测试环境），是目前世界上可支持所有大众手机精度最高的定位技术。

据介绍，该技术有望解决智能手机室内定位精度低、信号覆盖范围小、成本高且室内定位没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芯片的痛点。目前，陈锐志团队正在致力于室内定位核心技术的突破与产业化，争取实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音频加北斗的室内外无缝定位芯片，并将其产业化。

“我希望，我们团队的研究面向经济服务主战场，能够切实提高民生福祉，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陈锐志透露，目前“音频定位技术”产业化正有序推进中。

此外，陈锐志的另一项研究工作，即“珞珈一号”星基增强技术。目前室外有许多 CORS 基站，通过接收北斗信号，提供精准定位服务；在没有 CORS 基站覆盖的地方（如境外和远海），则无法提供高精度实时定位。陈锐志团队提出设想：如果把地上的 CORS 基站搬到天上，用天上动态的卫星基站取代地面静态的 CORS 基站，也许可以实现更泛在的定位服务。

不过，陈锐志也表示，目前该研究还处在理论探索的阶段，



“如果把 CORS 基站搬到天上，在算法、信号传播途径等方面，都和地面不太一样”。

陈锐志在采访中表示，虽然难度较大，团队仍然全力以赴，希望在未来空间信息领域多做些从 0 到 1 的突破。

育人：力推人才强校，科研反哺教学

一直以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十分注重学术传承和梯队建设，形成了“五代传承、四世同堂”，交叉综合、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建设格局，在学界和业界传为佳话。

陈锐志担任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后，延续这一优秀传承，在人才梯队建设上不遗余力，以实际行动响应学校人才强校战略。

他在芬兰和美国工作期间，培养了一批华人优秀青年科学家，2016—2020 年，他们“组团”回到武汉大学，陈锐志因此被誉为“青年人才孵化器”。

与此同时，陈锐志高度重视实验室外籍师资队伍建设，“我们作为全球领先的学科，要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外籍教师队伍，构建顶尖的国际学术交流生态，增强原始创新能力，站在更高视野推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教育高质量发展，立德树人是根本。陈锐志在采访中谈到，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研单位，没有本科生，怎样助推学校立德树人和三全育人？为此，他们进行了探索：创新本科人才模式，以科研优势反哺本科人才培养。

该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在研国家级科研项目为依托，在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框架下设立“双一流”创新训练专项，资助对科研有浓厚兴趣、学有余力的本科生开展科研活动，鼓励学生进行跨学科、跨层次的合作研究。

截至目前，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了“双一流”创新训练专项 98 项，其中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 35 项、省级创新训练项目 43 项、校级创新训练项目 20 项。



在研究生培养中，陈锐志强调培养学生的原始创新能力，其中的抓手包括鼓励学生参与国际比赛和设立原始创新奖。从 2017 年至今，这一模式不断完善。

2017 年，陈锐志将室内定位领域难度最高、测试最严、影响最大的世界级赛事——PerfLoc，设计成一门面向研究生的研究学分课，在教学理念上进行创新，导师团队带领学生边学边参赛；在学习方法上进行创新，引导学生借助跨学科思维解决通用型问题。经过近一年的鏖战，陈锐志带领的学生团队获得全球冠军。

今年，谷歌也在全球公开了“Smart Phone Decimeter Challenge”（智能手机分米级定位挑战赛），该赛事是室外 GNSS 定位比赛，不是陈锐志团队的主战场，他认为得奖概率不太高，但仍鼓励学生们参赛。

“这个比赛的难度很大，是提升学生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好机会。能力的提升比得奖更重要。”陈锐志说。

“延续这一培养模式，我们以国际顶尖比赛为抓手，组织不同的学生团队参赛，在备赛过程中进行创新思维培养。”陈锐志介绍。

与此同时，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还设立了原始创新奖，评审标准是科研成果的原始创新程度，不唯论文。5 个不同的研究方向各有一个名额，各奖励 5 万元，以鼓励学生的原始创新。

“这个奖学金的评定不是看论文，而是重点考察学生的研究思路，是否符合从 0 到 1 的原始创新的要求。”陈锐志说。

陈锐志表示，参加国际赛事、设立原始创新奖、邀请企业 CEO 主讲“工程案例”课等举措，核心都在于营造原始创新的氛围。

“希望通过一流的环境培养一流的学生，最终推动一流学科的发展，打造完整的原始创新生态链。”在采访的最后，陈锐志强调。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4 月 30 日）



用使命担当撑起厚重人生

——校友张继先寄语毕业学子

张继先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一个特别值得庆贺的日子，你们圆满结束了在珞珈山的求学生涯，即将告别母校，开启人生新的征程。作为武大校友，在此，我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向养育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的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打响了一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生动诠释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在这场抗疫大战中，全国人民共克时艰，凝聚起战“疫”必胜的信心与力量，驱散了疫情的阴霾，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出色答卷。

回首过去的2020年年初，在全国人民辞旧迎新的欢乐气氛中，一场史无前例的抗击疫情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初期战斗困难很多，尤其是抗疫物资不足，我们充分发挥集体力量，将物资的利用发挥到极致。在全国各行各业人们以及大批志愿者的帮助，全体武汉、湖北人的努力下，特别是在我们武汉大学的杰出校友及校友会的大力捐赠下，包括武汉大学两所附属医院在内的全体医护人员、全国4.26万援鄂医护人员共同奋战，我们战胜了疫情。当一位医师推着病床上的患者在室外看太阳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太阳，而是胜利的象征，是中国走出阴霾的希望。2021年的樱花季，武汉大学感恩全国抗疫医护人员的真心付出，诚挚邀请抗疫人员来汉赏樱，并且将持续3年，再次彰显武汉大学的精神和武汉大学的感恩意识。

同学们，你们即将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满怀期望，充满憧憬。当你们走出学校大门，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着的世界，它充满了不确定性，无论你所学什么专业，未来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都要用自己的定力和能力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能性，承担社会的责任，实现人生的价值。临别之际，我有三点体会与大家共勉：

一、坚守初心，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坚守初心、实践初心，不是一时一事、一朝一夕，必须时刻不忘、处处践行。我国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是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



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我们人生难得的际遇，每位同学都应该珍惜这个伟大时代，做一名新时代的奋斗者，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青春智慧和力量。

二、志存高远，做新征程的实践者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另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明大势、谋全局，才能成大事。你们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希望你们将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学习中成长进步，在创新上勇攀高峰，在前进的道路上磨炼自我，去开创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砥砺前行，做新使命的担当者

新时代昭示新使命，新使命引领新担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段青春有一段青春的担当。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在我看来，责任就是牢记使命，责任就是勇于担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担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担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担当；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也是担当。希望同学们在人生的大风大浪中，奋力走在前列、干在实处，以更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讲，“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同学们：今天你们意气风发、激扬青春的日子，你们即将开启新的旅程，我们会永远牵挂你们、支持你们！正如一首诗所云：“无论黄昏把树的影子拉得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无论你走得多么远，我的心总是和你连在一起。”希望你们瞄准目标，挑战自我，在奉献社会的进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壮丽篇章。



最后，衷心祝福同学们一帆风顺、鹏程万里、前程似锦、事业辉煌！

谢谢大家！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6 月 23 日）

作者系医学部（原湖北医科大学）1984 级校友



徐红星：“自立自强”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原始基因

人民日报

[编者按]远到“天问一号”登陆红色火星，深至“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海底，快似“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芯算”，炫如“人造太阳”首次放电……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成就的背后，凝结的是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推出《院士说》系列报道，对话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讲述科研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为广大青年传递勇气和信心。

“掌握关键科学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科学家的本能，也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原始基因。”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徐红星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初见徐红星院士，他可掬的笑容、风趣的表达，以及谈到科研工作时坚定的目光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徐红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等离激元光子学、分子光谱和纳米光学的研究，在单分子表面增强光谱和纳米全光网络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和系统性的贡献。在实验上首次发现金属纳米结构间隙的巨大电磁场增强效应，是在纳米尺度上对微弱光信号进行放大和操控以及超灵



敏传感的基础。发表论文 240 余篇，被引用 18000 余次 (web of science)，单篇引用超过 1000 次的 2 篇，单篇引用超过 100 次的 46 篇，h 因子 66。

没有别人的作业可抄，只能自己摸索着找答案

1969 年，徐红星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个医生家庭，学医的父亲曾希望徐红星能够延续自己的事业，但青年时期的他，却已经表现出对“物理”极大的兴趣。“母亲很支持我的选择，她认为我喜欢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如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了物理。”

徐红星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于 1988 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并在 1996 年前往瑞典攻读硕博学位。留学海外的几年中，由于研究课题极具前瞻性，徐红星形容那是“没有别人的‘作业’可抄，只能自己摸索着找‘答案’”的时期。那时，为了测量一个数据整夜不睡是家常便饭，他解释那既是最原始的“好奇心”驱动，也是内心深处“家国情怀”的鞭策。

尽管留学海外多年，但在徐红星心中，回国效力的心却从未变过。徐红星回忆，“我们同一批留学海外的学子，大家都有相同的信念，要通过科技自强解决中国现阶段一些领域的核心技术问题，要让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许多行业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学习先进、发展现有，直至超越提升的过程。光学领域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从跟跑、并跑，到努力超跑。徐红星说：“我很幸运，在我学习工作的 30 年间，正好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国际交流卓有成效的时期。我看到了差距，就有奋起直追的压力和动力。”

既要解决“燃眉之急”也要消除“心腹之患”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现阶段还存在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徐红星对此深有体会，“大家都知道芯片卡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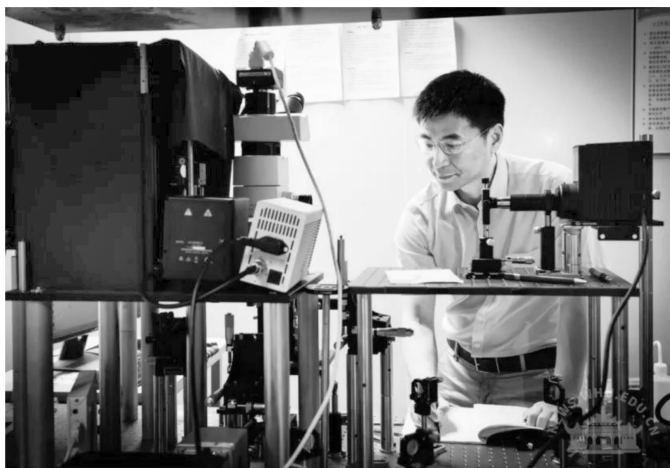


子，芯片里有一个关键元器件——滤波器，有无线通讯的地方就必须要有滤波器，此前国内只有组装技术，高端滤波器的研发制备还是依赖进口”。

没有滤波器，通讯信息产业就很难运转起来，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做科研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的生存困境，徐红星带领团队展开科技攻关，用三年钻研换来中国滤波器事业的突破。自此，中国拥有了第一颗国产高端滤波器。从0到1的开拓，背后凝结着无数个艰难险阻的日夜。

回忆起刚拿到搭载国产滤波器芯片时的心情，徐红星说：“那时心情是异常忐忑的，在实验室测量数据结果合格后，悬在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徐红星正在实验室进行数据测验

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既要着力解决“燃眉之急”，也要努力消除“心腹之患”。

在他看来，光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技术发展，极大地带动了3D制造、建筑节能、精密加工、环境管理、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变



革。但是在我国光学技术及器件的产业化道路上，仍存在两大痛点：一个是航空发动机，其中的一些关键部件需要激光加工制造，需要研究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光的精密控制；另一个是芯片领域的光刻机，光刻机的核心是光源。尽管滤波器国产化已实现重大突破，但在高端光刻机等其他关键领域和产业，核心产品和技术依然依赖进口，一旦受到管制断供，就会面临生存困境。

“‘燃眉之急’只是加速了我国实现科技自强的脚步，但对于从事科研的我们来说，打通关键领域技术的堵点、断点，努力实现技术体系自主可控，用自身所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早就是一种本能。”徐红星说，“自从事科研那天开始，‘自立’就印在我们的基因里。”

针对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徐红星说：“下好‘先手棋’是关键，应加快部署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科技任务，重视前沿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航空业面临国外全方面的技术封锁。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国外设备和技术封锁的背景，面向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涡轮叶片、火焰筒气膜孔的高精度、高效率加工需求，徐红星团队潜心研究，开展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高精度、高速度、低损伤的微小孔精密加工。

这一研发成果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生动写照。

近几年来，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徐红星始终放在心上。无论是在校园课堂中，抑或是行业论坛上，他多次表示：“想让产业走得更远，必须重视光学基础科学研究。”

例如纳米光学腔，它是精密测量技术的基础。徐红星提到，“基础科学研究关乎我国实现自立自强的根基，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需要长期不懈地深入开展”。

科技创新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在近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十大上，科技工作者聚



焦我国科技发展长期存在的难点和需要继续下大气力加以解决的问题，“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是其中之一。

如何进一步调动各创新要素，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与市场衔接的能力，全面提高转化成效？如何让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真正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是科技工作者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在徐红星看来，科技创新既要“顶天”，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又要“立地”，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试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就目前而言，大学研究和企业生产需求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企业研发力量不够，产业升级时短板尽显；高校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但不了解企业需求，解决生产问题时难免捉襟见肘。徐红星认为：“这是因为两者思维方式不一样，需要加入一个居于两者中间、能够进行产学研对接、具有极强黏合性的媒介。”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多年来，他奔走于高校、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致力于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徐红星院士与孙成亮教授接受专访



多年苦心经营已然收获硕果。今年，武汉大学工业科学研究所孙成亮教授联合 14 名国际知名业内专家创立的武汉敏声新技术有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射频滤波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解决了高端滤波器“卡脖子”难题。小小滤波器展示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也凝结着徐红星一辈的不懈追求。对于徐红星来说，让“中国芯片”生长在“中国土壤”的梦想，已然实现大半。

采访的最后，徐红星兴奋地跟记者讲起他正在进行的技术研究——利用特殊结构的纳米材料制冷实现沙漠治理，“未来这个技术成熟后，可使大片沙漠变成绿洲，那对国家乃至世界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徐红星所说，他的愿景不仅仅是解决我国的“卡脖子”难题，更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来源：《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5 日，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7 月 5 日，图片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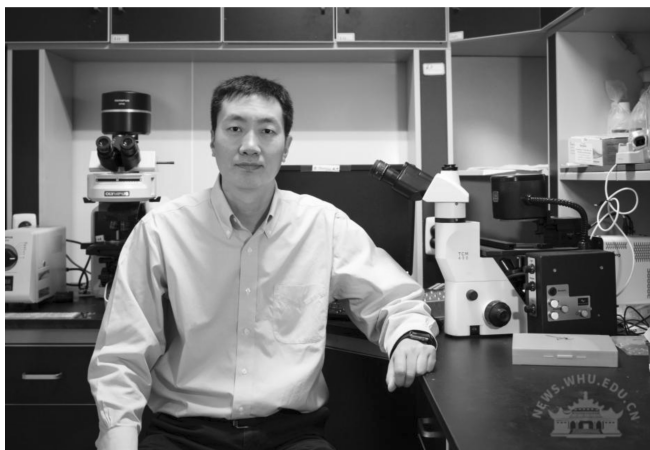


宋保亮：破译胆固醇与脂代谢疾病“密码”

付晓歌 刘宇欣

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血液中胆固醇浓度过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过高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从生物化学和人类遗传学的角度探究胆固醇代谢机制，开展和人类疾病健康密切相关的研究，这正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宋保亮教授 20 多年来研究的课题。

2021 年 11 月 18 日，对 46 岁的宋保亮来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收获。这一天，他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誉背后，是披荆斩棘的科研攀登、是夙兴夜寐的执着追求、是兢兢业业的育人坚守……





科研“无人区”的探路者

谈及缘何走上研究胆固醇代谢的道路，宋保亮表示，早在自己研究生毕业前，听了美国西南医学中心诺贝尔奖得主 Mike Brown 和 Joe Goldstein 的讲座之后，就对胆固醇代谢很感兴趣，一颗科研的种子悄悄种下。一次机缘巧合，他看了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良医妙药》，电影讲述的是一位父亲为了挽救自己患有庞贝氏症的孩子，决定自己投资兴建药厂、研发药物的故事。心系国民健康的宋保亮深受触动，加之由于胆固醇代谢与很多遗传因素导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有关，他决心在这个研究领域继续走下去。

“胆固醇水平主要受两方面调控：日常饮食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长期摄入过量的胆固醇，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但是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组内都有一些微小差异，使得不同个体之间胆固醇代谢与疾病易感性会有不同，甚至有巨大影响。”宋保亮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同样是每日食用十几个鸡蛋，有的人多年后心血管功能依旧正常，而有些人仅仅一年后就发展成动脉粥样硬化。解释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结局并揭开其背后的科学规律，是胆固醇与脂代谢研究课题组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

但是，解密的过程并不轻松。宋保亮说：“对我们课题组来说，由于承担的任务基本都在科研‘无人区’，鲜有现成的理论或者工具，这就要求课题组成员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学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开荒之难并没有打倒意志坚定的科研人员，他们誓必到那未开垦的处女地踏下最深的足印，在那空白之处去打造一片胜景。

“大家每时每刻都在付出加倍的努力，都在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宋保亮感慨，多年来，课题组成员始终把“两个执着”牢于心、内化于行，即无论是实验数据指标，还是课题完成指标，都执着于把数据做得更准确，都执着于把课题挖得更深入。

在研究方向选择上，宋保亮总结自己有两个“刻意追求”——



“我们刻意追求解决领域里最基本最关键的科学问题，刻意追求和人类健康与疾病密切相关的科学问题，符合这些研究方向的，我们都会努力做。”

因为“刻意追求”，他们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不断创新，充分展现了先锋的力量：如果没有，那么就去创造；如果陈旧，那么就去更新；如果微小，那么就去壮大。因为“刻意追求”，这群在胆固醇代谢领域孜孜不倦的耕耘者始终不忘社会大众，秉持学有所用，目的就是让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民众。

这些年，即使沿路荆棘，但课题组用一项项成果告诉大众，他们“始终在路上”：2018年，*Science*（《科学》）发表了宋保亮课题组研究成果，题为 *A LIMA1 variant promotes low plasma LDL-cholesterol and decreases intestinal cholesterol absorption*（《LIMA1 基因变异减少小肠胆固醇吸收并降低血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在这项工作中，他们从新疆低血脂家系中发现了新的胆固醇吸收基因，这项工作被收录入内分泌学经典教材 *Williams Textbook of Endocrinology*。2020年在 *Nature*（《自然》）发表的论文 *Feeding induces cholesterol biosynthesis via the mTORC1-USP20-HMGCR axis*（《进食通过 mTORC1-USP20-HMGCR 通路诱导胆固醇合成》），进一步揭示了进食碳水化合物诱导胆固醇合成增加的调控机制，为精准控制胆固醇水平奠定了基础。作为胆固醇领域的主要引领者之一，宋保亮受邀为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撰写长文综述，题为 *Mechanisms and regulation of cholesterol homeostasis*（《胆固醇代谢平衡的机制与调控》）。宋保亮先后获得陈嘉庚青年科学奖、中国青年科技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科学探索奖、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杰出成就奖，他的成果两度入选“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并被评为“国内十大医学研究”及“中国心血管领域十大影响力事件”之一，这些荣誉是对他们研究工作的肯定。

谈及2020年在《自然》发文，芦小艺副研究员说：“2014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硕博连读，如愿进入宋老师的实验室。几年前，一位师兄在试验中筛出一个基因，可能对脂代谢有作用，但是当时可



以查阅的相关研究非常少。”作为课题组的“领头羊”，宋保亮凭借其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多年学术经验敏锐地感知到，这或许可以成为课题组研究获得进展的突破口。“我一进入实验室就参与这项研究，大家此前已经在不同的细胞上做了许多试验，却毫无进展。我们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痛苦中。”

宋保亮不断鼓励他们，寻找新的实验方向。2015年下半年，课题组将研究对象换成肝细胞系之后，终于出现了转机。芦小艺回忆：“当看到细胞被调控的现象出现，我们太激动了，这证明基因对肝细胞调控有效果！”

宋保亮鼓励大家一鼓作气，让实验数据更精准、更完备。接下来的几年时间，课题组一直利用细胞实验和小鼠实验结合来监测数据，不断地进行试错和优化实验条件。“这个过程非常辛苦，宋老师常常鼓励我们，他说做科研就是‘技术上的重复，思想上的创新’。老师对待科研饱满的精神状态也让大家有了坚持的动力。”芦小艺说。

但是，成功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大家措手不及。时间不等人，《自然》的截稿日期越来越近。3月，在收到允许部分人员提前返校的通知后，宋保亮、芦小艺等即刻申请第一批返校，做好防护工作，早早地回到实验室开展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课题组最终完成了实验，研究成果如期发表。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者，应当真心热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建立稳定、高标准的研究体系，积极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不断突破自我。”宋保亮如是说。

学子前行的“领航人”

“任何一个学科方向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把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就不能只是看着好玩，要能够坚持下去，贵在持之以恒”，“作为生科人，应勇于担当、立志高远，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多做有意义的事情，努力发展自



己”……在生命科学学院举办的本科生“学业领航”专业发展规划指导会上，宋保亮的一番话如春风化雨般渗入学生心头。

研究生王金凯还记得，导师宋保亮曾交给他一个新课题：能否找到一个特殊的基因，可以作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新靶点。“我通过多次数据对比，终于发现了一个基因，同宋老师研究分析后，我们一致认为该基因具备降低血脂的潜力，并且参与凝血系统，很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靶点。”然而，正准备大展身手的王金凯很快就被现实打败——他对于凝血系统的研究完全是门外汉，对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动物模型更是没有任何经验。

宋保亮对他说：“我们做研究，应该追求突破，追求完美，年轻的时候努力奋斗，干出一番事业来，老了才不会感叹这一辈子碌碌无为！”王金凯暗下决心，趁着现在年轻，有干劲，不如放手拼搏一把。

他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建立系统理论知识，请教各领域专家以拓宽视野，积极参加各类会议及培训，不断完善实验技巧。在导师宋保亮的全力支持下，他不断克服困难，与大家团结合作，取得一系列突破，对研究的课题也越来越有信心。“我越发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靶点，希望我的研究能够给广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带来福音。”王金凯如是说。

宋保亮异常勤奋，这是师生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只要他在武汉，一定是实验室去得最早和走得最晚的一个。出差期间，他也会每周固定给实验室开视频组会，讨论实验进展。在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琰的记忆中，宋保亮是一个专注且精力充沛的人。“他非常忙，却总是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我们出差时，常常看见他在候机大厅抱着笔记本给学生修改论文，或者是与学生通话，指导实验。”

宋保亮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对学生总是倾囊相授。“宋老师说，他的办公室门一直敞开，任何想要与他进行学术交流的学生都能随时来找他。”博士生谭婧说：“宋老师有时会带着我们做实验，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记得当年我刚接触IP实验时，老师细心提醒我清洗 beads 时要注意液体不能吸取太



多，以免损失所需的样品。老师不时的指导真的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芦小艺眼中的宋保亮，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几乎没有看到宋老师发过脾气，个别同学遇到瓶颈，产生倦怠心理时，他会找他们谈谈心，帮助寻找新的实验方向，给他们布置更为具体的任务，不断督促他们完成。”实验之余，宋保亮也经常组织冷餐会等团建活动，和大家聊聊生活，畅谈理想，谈笑之间，师生的距离越来越近。

教学管理的“多面手”

宋保亮的身份很多，不仅是三尺讲台上循循善诱的教师，也是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还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基金委“糖脂代谢的时空网络调控”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这些身份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宋保亮鲜活的形象。

作为教师的宋保亮，在科研前沿攻坚克难的同时，还非常注重科研反哺教学，每年秋季面向生命科学学院大一新生作“胆固醇代谢研究进展”主题报告，为大二本科生讲解专业核心课程“生物化学”中的脂代谢内容，介绍相关前沿研究进展。

“比起填充式地输出知识，老师更多的是循循善诱，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大家。”宋保亮的博士生胡傲回忆当年的课堂，老师平易近人的形象还历历在目。宋保亮会在课堂上谈及一些疾病模型，让学生产生兴趣，在有疑之处起疑，进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探索未知，并注重将最新的科研进展和研究方法融入课堂中，为学生的科研之路“保驾护航”。

“我不要求大家写太长的论文，哪怕是画出一个条分缕析的通路图都行。重要的是抓住关键点，变成自己的知识。”这是宋保亮在指导学生小班研讨课上给同学们的建议。

自2016年以来，作为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进展”课程的核心授课教师，宋保亮参与了该课程的定位、内容设计、专题报告及小班研讨等多个环节。该课程采用集中专题讲授与小班分班讨论形式



进行教学，课程内容涉及生命科学与技术各个领域进展，注重反映学科前沿动态，帮助学生较全面了解生命科学与技术有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发展动态，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增强学生专业认知，引导学生形成专业热爱并做好专业规划。

此外，他积极参与推进拔尖学生培养工作，长期担任学院烛光导航师，指导本科生开展科研训练。同时，他还担任 2020 级生物科学“强基计划”班班级导师，从指导学生学习、科研、思想等多个方面参与指导班级建设。

作为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自 2014 年上任以来，宋保亮一方面注重不断引进人才，升级科研硬件条件；另一方面打造规范化的评审制度，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对教授定期考核，注重营造开放、自由、浓厚的学术氛围，让生命科学学院成为前沿科学研究的一片沃土。宋保亮也十分重视思政工作的建设，牵头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课程思政建设领导工作小组，积极推进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此外，他还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基金委创新群体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基金委“糖脂代谢的时空网络调控”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宋保亮始终关注学科发展，乐于合作、重视人才培养，为我国脂代谢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位年轻的新晋院士，从未囿限于象牙塔内的自我沉浸。他饱含探索科研“无人区”的勇气，以科研的探索之路为经线，以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为纬线，经纬交错、互为契合，继续在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人口健康方面贡献“力”与“热”……

（部分素材来自《光明日报》、武汉大学新闻网）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12 月 10 日，图片有删减）

珞珈记忆





陈潭秋：从武大学子成长为革命者

涂上飙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推进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建立六大师范学校，以培养教育救国所需要的师资。1913年，经过准备，在原湖北方言学堂旧址上，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建立。该校学习日本的教育模式，设立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博物部共四部。

学校开办两年后的秋天，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预科，一年以后转为本科，入英语部学习，1919年6月毕业。在校学习时，他是一位勤奋刻苦的学生，学习了包括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英文学、国文、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语言学、体操等课程，成绩十分优异。

作为一所新办的学校，高师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学生学术团体纷纷涌现。英语部的学生们为提高英语训练机会，成立了“英语谈话会”。陈潭秋不仅是英语谈话会的一员，而且是其中一名十分积极的成员。在活动中，他经常演讲，曾以《教育为中国之急务》为题进行过专门演讲。

陈潭秋在读书时十分活跃，与很多同学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当时他与同校的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



陈潭秋



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朱光潜(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钱亦石(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杜佐周(著名教育学家,曾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沈刚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昭安(现代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教授)、何定杰(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遗传学家,武汉大学教授)等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在他的影响下,钱亦石、何定杰后来都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



1916年武昌高师英语部一年级学生合影,后排右三为
陈潭秋(时名陈澄),右一为章伯钧

1919年6月,陈潭秋从学校毕业。毕业以后,他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以学校为基地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母校是他革命活动的阵地之一。

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陈潭秋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兼任了武昌高师附属小学的教师。



1915年9月，武昌高师开办的附属小学

1921年7月，陈潭秋参加了党的“一大”，之后在社会上的活动更多了，但仍然十分重视附小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武昌高师附小有一批教员如钱亦石、张朗轩、江子麟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武汉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1922年秋，陈潭秋兼任附小五年级班主任，教授国文和历史。在他的努力下，一批进步师生逐渐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通过阅读进步书刊、革新教学内容，从事革命宣传。当时，陈潭秋和董必武一道还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经过努力，把武昌高师等校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青年20多人吸收到团组织中来。这些团员有的不久加入了党组织，有的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骨干。

通过陈潭秋的努力，附小的毕业生有的考入附中并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年龄较大的)被送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有的由党组织送往苏联学习。著名军事家、外交家伍修权就是这一时期由陈潭秋、张朗轩保送离开武昌高师附小前往苏联的。



可以说，在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武昌高师附小是当时武汉地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之一。当时党的许多重要会议在附小召开。直到1926年附小改为省立第一小学后，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在那里召开过。所以董必武回忆武昌高师附小时说：“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这些都与陈潭秋的革命活动及影响分不开。

1926年，北伐军攻下武昌城并建立了武汉国民政府。为整顿和改革教育事业，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湖北省立文科大学、私立文华大学等学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亦称第二中山大学）。陈潭秋与董必武、钱亦石成为学校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负责政治训练工作。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在当时被称为“红色学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进步力量的“机关总部”。这与陈潭秋等人的政治训练工作不无关系。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建立以后，以陈潭秋、董必武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纷纷进入，他们一边从事教学、一边进行革命活动。出席过中共一大的5位代表，除了董必武、陈潭秋外，还有李达、李汉俊、周佛海都在学校。当时，董必武、陈潭秋为学校政治训练委员会会员，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为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李达为教员。

为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他们积极投身到大革命的潮流之中。1927年3月20日，董必武、李汉俊和钱亦石在学校举行演讲。

这个时期，正是蒋介石右翼势力准备分裂统一战线的时期，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领导下，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翼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4月16日，在他们的支持下，学校的山东籍学生与武汉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一道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强烈要求改组由右派把持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撤换山东省党务特派员王乐平。23日，学校的学生还参加了武汉各界民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的30万人的讨蒋大会。

由于学校的革命基础较好，在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式在原武昌高师附小的小礼堂旧址召开。董



必武、陈潭秋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

在土地革命时期，陈潭秋曾担任过中共湖北地委书记，中共江西、江苏、满洲、福建等省委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等职。陈潭秋于1943年9月在新疆壮烈牺牲。

（选自《武汉大学故事》，长江出版社2017年版）

作者系历史系1984级校友



张一悟：甘肃党组织创始人

徐应荣整理

兴隆山位于兰州市榆中县东南方向 14 公里，距西北方向兰州市大约 40 公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在兴隆山下，有一幢崭新的建筑——张一悟纪念馆。该馆是甘肃省、兰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一悟 1919 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2 年夏毕业。他是甘肃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甘肃省党组织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省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首任书记。在 28 年的革命生涯里，他为甘肃党组织的诞生、建设、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陇原大地的播种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辗转千里，寻求真理

1895 年 3 月 3 日，张一悟出身于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原名张穀，常用名张一悟，又名张仲德，字玉圃，号龛谷云僧。7 岁入私塾，随后进县城小学读书。12 岁考入甘肃法政学堂，不久转入甘肃文高等学堂。1913 年考入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现兰州一中），1917 年毕业。在兰州市读书期间，校园里传播的民主共和思想、抨击清政府统治的书刊，影响着青年张一悟，让他萌生了走出去的愿望。

1917 年，22 岁的张一悟与兰州同学张亚衡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张一悟、张亚衡与北京大学的同乡丁益三参加了“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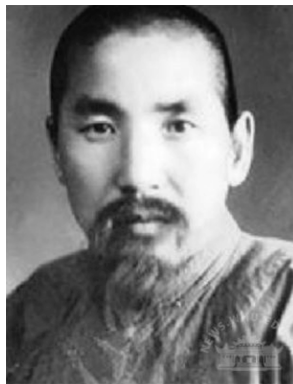


四”运动，他们以“甘肃代表”的身份到段祺瑞官邸请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张一悟认识了李大钊，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真理，并通过书信把五四运动的情况告诉给亲人、好友和兰州的同学，使新思想、新文化在榆中地区开始传播。因张一悟、张亚衡、丁益三同学经常活跃在斗争一线，被在京陇籍学子称为“榆中三杰”。

“五四”运动后，张一悟等人在北京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盯梢追捕。为了安全，经李大钊介绍，他与张亚衡南下武昌，秋季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专修科。在武昌高师读书期间，武汉党组织和董必武、陈潭秋（1919年高师英语部毕业）、李汉俊（1922年初高师任教）、包惠僧等武汉早期共产党员对他影响很大。同时，张一悟经常去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认识了武汉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恽代英，受到恽代英等革命同志的影响。此时，他更深入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张一悟



在甘肃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张一悟

1922年3月，张一悟满怀激情地在毕业合影照上挥毫写下一首《调寄离亭燕》词：“三载同窗情深，那堪一朝话别。想来年豪谈痛饮，转瞬都成陈迹。鸿印等闲记，听悲歌初歇，不甘作新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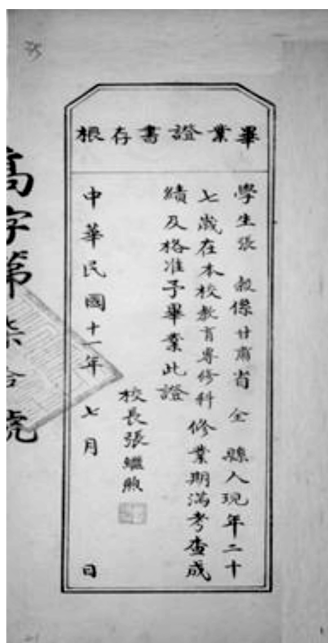


愿猛击中流楫，他日天涯重聚首，应问成何事业？挥手各西东，欲挽人天浩劫。”这首词，抒发了他的豪情壮志和远大理想。

1922年7月，张一悟从武昌高师毕业返回家乡兰州，先后在凉州镇守使马廷勳部队、省立第一中学和兰州女子师范学校（现兰州三中）任教。在课堂上，张一悟因积极传播进步思想，推广白话文，被指责为“不守规矩的人”和“异教的传播者”，被迫离开讲台。



张一悟（左靠石者）等在武昌高师背后的蛇山



张一悟的武昌高师毕业证存根

二、投身革命，实现理想

1923年1月，张一悟来到武昌。经李大钊、恽代英同意，参加武汉党组织的活动。之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张一悟从武昌再次返回兰州，立即投入新思想的传播。他先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子师范学校、凉州师范学校担任国文及历史教员，积极向青年学生传播进步思想，特别是教育学生要关心政治变革，消灭剥削人压迫人的反动统治阶级。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张一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甘肃省第一位中共党员。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张一悟在武威主持召开追悼大会，号召青年们“关心时政，振兴中华”。同年10月，国民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奉冯玉祥之命进驻兰州，并亲任甘肃省督办。



中共党员宣侠父、钱靖泉随军来到兰州。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指示，宣、钱二人即与张一悟接上了关系。

1925年12月，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正式成立，张一悟任书记，宣侠父、钱靖泉任委员。从此，甘肃的革命斗争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也为建立党在甘肃的统一战线打开了局面。

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壮大组织力量。利用宣侠父、钱靖泉担任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和政治宣传员的身份，改组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加强党部中的左派力量。除在国民军中开展宣传外，还重点在兰州各学校、工厂、郊区、农村等广泛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耐心细致地发动群众，创办《革命青年》《醒狮》等刊物，组织建立青年社、工会、农会等群众组织，凝聚思想，开展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于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开展的一系列有效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大不满，国民党右派分子随即电报冯玉祥，诬告他们在兰州造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冯玉祥电令甘肃，将钱靖泉等押解赴陕，严办其余人员。与此同时，甘肃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至此，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活动被迫停止。

三、五年铁牢，坚贞不屈

面对恶劣的形势和环境，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张一悟在兰州市五泉山的嘛尼寺召开了3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疏散，转入地下工作。会后，张一悟和秦仪贞、王陶、谈仲瑜、王有章等8人，于1927年11月23日“化装”离开兰州撤往西安，与陕西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西省委安排张一悟、王林、乔国祯、王之鼎等一批干部前往华县，以加强渭(南)华(县)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此后，张一悟化名章子文，以华县高等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担任华县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后又改任宣传部长，之后还代理中共华县城关区委书记职务，并参与了1928年著



名的渭华暴动。

1929年3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成立，张一悟当选省委常委。下半年，陕西省委派张一悟去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会议。由于肠胃病突发，大量吐血便血，耽误了行程，到上海后会议已经结束。张一悟便去北平协和医院治病。1930年年初，张一悟出院后，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化名李云僧，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1931年8月，张一悟奉党组织委派赴山东济南，以第一女子中学教务主任身份作掩护，参与山东省委的工作。1932年3月24日夜，因叛徒出卖，张一悟等74人不幸被捕，被关押在济南第一监狱。

在狱中，敌人使用皮鞭抽打、压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要他供出组织和同志，张一悟始终坚贞不屈，誓死保守秘密，还写下了“无话可说，速我一死”的豪言壮语，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虽未得到任何口供，但山东高等法院还是以所谓的“危害民国罪”判处张一悟死刑。宣判后，张一悟很平静。他知道，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他写信给妻子傅永芳安排后事，告诉妻子可以改嫁或回娘家，千万不要为自己连累了一生，3个孩子可以送给别人抚养。

父亲张继祖得到消息后寝食难安，虽说他不赞成儿子在外面“冒险”，但在儿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处托人找到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邓宝珊，请他出面向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求情。邓宝珊欣然应允，立即请求韩复榘“刀下留人”。韩复榘遂令山东高等法院改判张一悟为无期徒刑，以“政治要犯”监禁在山东第一监狱缝织科“劳动改造”。在之后5年的监狱生活中，张一悟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使命，组织难友开展各种抗争。他说：“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生命是有限的，而真理是永存的，为了捍卫真理，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在他的鼓励下，难友们团结一致绝食7天，迫使监狱减轻了对难友们的迫害。

1937年12月23日，日军迫近济南。12月24日，韩复榘实行“焦土抗战”的消极政策，撤出济南前命人放火焚烧政府机关、高



等法院、火车站等，济南城大乱。此时，张一悟寻得机会，终于逃出国民党的魔窟。

四、不忘初心，继续战斗

1937年12月底，张一悟拖着病躯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辗转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张一悟身体非常虚弱，宣侠父即派李屏堂夫妇将他护送回兰州。1938年1月底，张一悟先后见到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同乡陈成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伍修权等人。中共甘肃工委组织部长郑重远为张一悟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在苏联驻兰州领事馆任中文教师。甘肃省国民政府主席朱绍良企图拉拢张一悟，利用甘肃国民政府秘书长廖元佑与张一悟父亲为清末同朝举人的关系出面做工作，被张一悟坚决拒绝。

1939年，苏联驻兰领事馆撤销，为避开敌人的纠缠与迫害，张一悟很少在家里居住，工作也格外小心。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艰苦的10年里，他留着长胡子，经常化装成道士、郎中、算卦先生等，往返奔波于兰州、榆中等地。他关心、引导进步青年，筹措经费，帮助司国权等人奔赴延安。

1948年8月，张一悟奉西北局的指示，前往延安工作。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张一悟任兰州市军管会委员兼文教处副处长、甘肃行署教育处第二副处长。1950年3月，被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10月，当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及狱中酷刑留下的顽疾，使张一悟的身体非常差，组织安排他到大连疗养，医生诊断他的左肺叶全部溃烂、右肺叶上也有3个空洞。1950年12月26日，张一悟回到兰州。1951年1月3日晚10时40分在兰州病逝，终年56岁。

五、铁骨风范，永存世间

1951年1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为张一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省委书记张德生主持、省委副书记王作宾



致悼词。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兰州市等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敬送挽联和花圈，给予张一悟高度评价，“他是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播种人”“他对甘肃党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很大”等。追悼大会后，省委书记张德生、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亲自执绋，各界代表 1000 多人、沿途大批群众为张一悟送行。

张一悟被安葬在钟灵毓秀的榆中县兴隆山栖云峰脚下。为了表达对张一悟的怀念和敬仰，1951 年 3 月，经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榆中县将城关的北关小学改为“一悟小学”，将学校前的北街改为“一悟路”，并在兴隆山烈士陵园为其立碑建亭，以示纪念。

1983 年 10 月 1 日，民政部授予张一悟“革命烈士”称号。1988 年 10 月，中共榆中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兴隆山卧龙湾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其中专门修建了张一悟纪念亭。1993 年 8 月，榆中县人民政府将张一悟墓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 12 月，榆中县人民政府又将张一悟故居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9 年，张一悟纪念馆建成。2012 年，张一悟纪念馆被命名为甘肃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8 年 6 月 28 日，张一悟纪念馆新馆落成，建筑面积 3218m²。

青山有幸，英魂不朽。在张一悟纪念馆，一盏油灯、一本党史、一副眼镜……生动地记录着张一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足迹。他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像永恒的明灯，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校史馆、甘肃党史网、每日甘肃网、兰州市榆中县党史办等）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5 月 18 日）

作者系哲学系 1983 级校友



陈雨苍：博士·战士·烈士

——百年名院创始人、早期共产党员的
赤诚忠心

杜巍巍整理

陈雨苍，字少峰(1889—1947年)，湖北荆门人，早期中共党员。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为世界医学名人之一(见当时德文《世界医学名人传》)，是我国西医界的前驱，也是湖北省医科大学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创始人，湖北最早的医科大学校长(院长)。在党的领导下，陈雨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奋斗终身。



投身辛亥革命 创办湖北医大

陈雨苍 1911 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军医学堂，在辛亥革命期间接



受了孙文(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学说,产生了民主革命的理想。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柏林医科大学继续深造,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带着“医人欲医天下”的念头回到了祖国。

1921年,陈雨苍回到湖北,在武昌两湖书院的旧址上创办了湖北省立医科专门学校;嗣后经过调整扩充,改为湖北省立医科大学,以湖北第一所医科大学录入史册,为湖北省和华中地区培养了不少医护人才。



陈雨苍于1923年创建的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实习医院,即是如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最早发端。作为湖北省立医科大学校长和实习医院院长的陈雨苍,从筹创到办学到行医,呕心沥血,竭智尽能。受他延聘担任教学的多为医学界知名人士,如李博仁(日本医学博士)、黄协坤和德籍教授威廉劳克等。他的妻子陈一获任德文教授,陈雨苍自己还兼外科、病理学教授。



这时，在董必武同志指导下的启明工读学校附设江汉编印社成立(这里是党的地下活动据点)，陈雨苍经常来往联系印刷讲义，常与董老倾谈，受到启发之后，进一步倾向新的民主革命。在省一师追悼“三一八”殉难烈士李镜唐(共产党员)的大会上，他以医大校长的身份大声疾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踏着李镜唐烈士的血迹前进！

加入中国共产党 奋战于革命低潮

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第二年湖北省政府把湖北省立医科大学合并为湖北中山大学医科，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为校长。陈雨苍在汉口华商街太安里26号开业行医，实际上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大多是他的学生，如邬聘三(时任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培灵、汪道成、漆昌元等人。

1927年春，陈雨苍担任湖北省立医院院长，由邬聘三、马春泉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雨苍以湖北省立医院院长身份，倡议成立了武汉医师公会，经常组织会员学习革命理论和进行学术交流，还经常开会讨论革命工作，开展党的活动。

“七一五”事件后，国共分裂，宁汉合流。接着省一师的魏人镜被捕牺牲，邬聘三同志于1930年7月也被捕牺牲。武汉地区革命处于低潮，但陈雨苍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战斗。

1931年2月27日，陈雨苍去武昌省立医院上班途中，被武汉行营侦缉处以“共党嫌疑分子”逮捕。经过多方营救，于1931年8月底释放。六个多月的狱中生活，陈雨苍受尽了反动派的肉刑之苦。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内的任何人和事。出狱后，他拖着被压成重伤的两腿，拄着拐棍，在坎坷曲折的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

离汉去沪行医 掩护“红色电波”

1931年秋末，陈雨苍离汉去沪，任上海国立同济大学秘书长



兼医学院院长；1933年因党的工作需要离开同济大学，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年初，党决定由陈雨苍在上海筹办设立中央直属电台，六七月间，组织派张树馨同志（女）为报务员，并安排他们俩组成“家庭”。

为使掩护电台的工作顺利进行，陈雨苍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2号租了一栋四层楼的楼房，楼顶上一个堆放破木箱子杂物等的阁楼作为收发报室，白天收发报机置于壁炉内，深夜取出工作。解放初期武汉市吴德峰市长曾对博志尧院长说：“抗日时期，陈雨苍同志在上海为党中央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有时半夜突然闯入租界，四处封锁搜查。拉都路2号也被日寇搜查过几次，每次陈雨苍都勇敢机智地用日语和搜查者周旋，均未出事。后来，由于日寇在深夜用装有微型搜听器的汽车漫游马路、查听发报声音，1942年年初，电台被迫停止工作。

辗转渝沪之间 临终不忘革命

1942年夏天，党的领导人送来通知：要雨苍和树馨同志离沪去渝。抵达重庆后，周恩来同志指示陈雨苍设法打进国民党中央编辑局，目的是搞统战工作。陈雨苍在红岩村度过了难忘的1943年元旦。

离开红岩村后，陈雨苍经常冒着日机轮番轰炸的危险进行工作。由于日日奔波，过度劳累，1944年年底他突发高血压，半身瘫痪。虽在组织关怀下多次抢救治疗，勉强能行动，但身体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1946年春，陈雨苍接到组织命令回沪工作。

回上海后第二天，组织上派人联系他，决定要他去休养。他在休养期间，仍一再要求组织分配任务。由于病情日益恶化，1947年元旦不幸突发脑出血与世长辞，享年58岁。

由陈雨苍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至今已近百年，已发展进入中国一流医院行列。一代又一代医院职工，牢记陈雨苍先生爱国为民、一生为党的初心使命，始终践行着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办院宗旨。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倾注全部力量，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本文由杜巍巍根据宿通权提供的素材改写；图片由杜巍巍提供）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4 月 22 日）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03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曾经在武大学习工作过的革命烈士

秦 然

【笔者按】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从此开启。为挽救国家于危急存亡之秋，无数革命先烈奋发图强、前赴后继，投入革命的历史洪流，济万民之难、拯国家于困，用生命和鲜血铸就共产党人的信念与忠诚。

1925年，国立武昌大学党支部成立。自此，武大英贤奋发努力，救亡图存；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用生命彰显了武大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民族富强的坚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特整理武汉大学革命烈士材料，重温武大人的红色记忆，缅怀先辈英烈，光大民族英魂，牢记历史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县人。1919年6月毕业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0年与董必武等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1年7月，与董必武参加中共一大；1922—1923年在武昌高师附小兼课。在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武昌高师附小是当时武汉地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之一。1927年，陈潭秋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1935年8月，与陈云等人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在新疆



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牺牲于天山脚下。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02年赴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创办《劳动界》周刊，并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1922—1926年，先后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曾任系主任，主讲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科目。1926—1927年，先后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和大学委员。1927年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成立，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27年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与詹大悲等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营救和保护了大批共产党干部。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卫戍区司令胡宗铎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到杀害，壮烈牺牲。

钱亦石(1889—1938)，又名钱介磐。咸宁县(现咸安区)人。1916年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一年后转入博物部学习。1920年夏毕业，被湖北省教育厅录用为科员。曾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导主任。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人，是党早期著名教育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董必武称为“红色教育家”。受革命军总司令部委派，与李汉俊、章伯钧筹办革命文化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钱亦石任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少将队长，带着30多位作家、艺术家一起到抗日前线，动员沪杭地区人民与军队联合抗战，终因工作繁重积劳成疾，1938年1月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

耿丹(1892—1927)，湖北安陆人。1910年参加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1920年年底，担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教务长、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3年升格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教授，主讲公民课和经济学。1921年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同李汉俊等积极开展学生运动。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9 月 8 日被反动军阀杀害，时年 35 岁。

何羽道(1882—1928)，1926—1927 年先后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湖北省立法科大学和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以上学校均为武大前身)经济学和法学教授。他将在武昌青石桥 3 号的公馆作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处。董必武、陈潭秋、钱亦石等共产党人经常出入其中，商讨、布置革命行动。共产党地方组织负责人魏人镜，长期将秘密文件和重要材料托他保管。1927 年 3 月，受聘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经济学常识。1928 年 1 月 4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胡耀邦同志为他亲笔题写“何羽道烈士之墓”。

郑太朴(1901—1949)，上海人。1922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 年任教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27 年前往上海同济大学任教，1944 年赴重庆交通大学任教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先后在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领导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诞生赴汤蹈火。1949 年 1 月，从香港转赴北京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途中突发脑出血逝世。1950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林可彝(1893—1928)，福建省福州市人。1916 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到日本明治帝国大学研修。1920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与杜国庠等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小组。1925 年从苏联回国任北京的朝阳、平民、文化等五所大学教授，并开展配合工农群众的学生运动。1927 年 1 月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社会历史学系教授，讲授“唯物史观”课程，并为该校党组织负责人，从事学运和工运工作，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白色恐怖中，率领青年学生参加了击溃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的保卫战，同年 12 月不幸被捕；翌年元月在武汉从容就义，时年 35 岁。

邬聘三(1900—1930)，湖北黄陂人。1923 年考入湖北省立医学专门学校(1924 年升格为湖北省立医科大学，1926 年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6 年年底受党组织派遣，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发展党团员以壮大革命力量。1928 年，化名胡素民在汉口开诊所行医，以医生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其诊所



是党组织一个重要的秘密联络点。1930年9月22日，在汉口被捕，11月被杀害于武汉。

何子述(1901—1931)，1901年出生于湖北省应山县吴家店(今广水市吴店镇)。1919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次年升入本科英文部学习，1923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在国立武昌高师期间，加入董必武、陈潭秋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10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的“五卅”惨案，他组织全校师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成为当时武汉地区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不久，中国共产党武昌大学支部成立，他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8年6月，出席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在天津被捕，壮烈牺牲。

任开国(1898—1928)，1920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社会学系。1923年担任武昌地区团秘书，主要与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等人联系。192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1927年，任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28年3月在武汉后花楼被捕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刘季良(1896—1927)，湖北省黄冈县人。1920年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任教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3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投身声援上海的“五卅”运动。1926年10月，任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青年学生和教职工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同年秋，被委任为汉口特别市政府委员，兼任市财政局局长。1927年，中央机关撤离武汉时的大部分经费由他筹集。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秋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1919年，闻一多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8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筹备主任、首任院长。1930—1932年，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当天下午主持《民主周刊》



记者招待会，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会后，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壮烈牺牲。

吴宗鲁(1904—1928)，江苏盐城县人。1923年就读于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6年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商大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吴宗鲁进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三年级学习。1927年10月，当选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生组织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11月，组织学生联合武汉各校师生声援武昌震寰工人斗争；12月16日，反动派包围中大，逮捕有“共党嫌疑”师生15人，吴宗鲁组织师生转移，并前往卫戍司令部交涉营救被捕师生，最终被出卖逮捕，1928年1月14日壮烈牺牲，时年24岁。

彭明晶(1899—1927)，四川安岳县人。1921年就读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参加“四川学生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1923年，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商科，是青岛大学学生自治会和青岛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5年4月，与罗荣桓为负责人组织学生参与“青岛惨案后援会”组织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1926年夏报考广州中山大学，经恽代英介绍成为中共党员。1927年2月底，转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他写信邀请罗荣桓到武昌，介绍罗荣桓加入青年团，担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团支部组织干事；后又介绍罗荣桓成为中共党员。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接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同年9月，在武昌法租界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斗争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时年28岁。

梅玉珂(1904—1927)，女，湖北黄梅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大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小组长。1927年“七·一五”反动政变后，率领23人的宣传队到武汉街头、纱厂区域贴标语、发传单、宣传演讲，并组织工人罢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受组织委派，11月28日带领宣传队到裕华纱厂做宣传被逮捕。1927年12月18日，英勇就义于汉口济生马路。

许闻道(1903—1927)，女，湖南宁乡人。1926年3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女生队队员，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从事工人运动，曾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文学系党小组长。



1927年12月，因反对武昌震寰纱厂资本家镇压女工，被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严大朱，又名严达洙，江西万安人。1927年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外国文学系读书，1927年声援武汉震寰纱厂工人运动后，在阅马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

叶英群，安徽桐城人，1927年考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社会历史学系，担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1927年声援武汉震寰工人运动后，为掩护党内同志撤退和办理组织关系，坚持在敌人控制区内做好组织工作后再从容离校。1928年年初在旅栈中被捕，牺牲于武昌。

陈漱之（1908—1928），湖南浏阳人。1927年考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一边研究革命理论一边参加革命工作；10月调任湖北省济难会华中办事处秘书，负责调查及救济被难者事项。在1927年12月至1928年3月间，负责慰问武汉三镇内为革命被捕、被伤、被杀的革命同志家属。1928年3月被武昌卫戍司令办事处逮捕，3月20日被杀害于汉口。

伍云（1903—1949），原名伍昌坤，湖南省零陵县人。1927年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系肄业；1929年7月在国立武汉大学代办专门部政治经济学系补习一学期后毕业，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与中共党员陈一凡等创建“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6月，白崇禧部发动庙门口大扫荡战，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49年9月19日，被杀害于永州北门。

聂之俊（1916—1939），江西省清江县人。1935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及武汉“一二·九运动”。1937年11月到应城汤池参加共产党人陶铸主办的、人称“共产党的黄埔军校”的著名的“汤池训练班”，即第一期农村合作事业训练班学习。1938年4月带队深入鄂西北竹溪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0月建立了竹溪县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成立了竹溪县抗日工作促进会并任总干事，主编《抗战建国半月刊》。1939年1月，竹溪反动政府以“非法集会，危害民国”罪名将其逮



捕入狱后杀害，时年 23 岁。

曹介(1919—1943)，原名曹国圻，又名曹建，四川省宜宾县人。1935 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先后在延安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 年被分配到新四军第四师任营长。1939 年随新四军六支队张爱萍，由豫皖苏边东进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1940—1942 年，先后任中共宿东县股北区委书记、宿东县委书记、萧宿铜县委书记，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1943 年 3 月被日伪军抓捕，同年 7 月被日军残酷杀害，年仅 24 岁。

谢文耀(1913—1948)，湖北汉川人。1932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外语系。1936 年与武汉大学一批进步青年成立“武大青年救国团”，成为负责人之一，秘密创办油印刊物《武汉学联》。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武汉大学支部负责人。1938 年赴洪湖地区从事革命工作。1939—1947 年，先后任《七七报》总编辑、《七七日报》副社长、新华社中原野战分社副社长。刘邓大军开创大别山根据地后，参加了河南汝南县土改工作。1948 年 2 月被“还乡团”杀害，牺牲时年仅 34 岁。

许明清(1919—1946)，原名陈玉虹，浙江省平湖县人。1937 年 9 月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1938 年 7 月参加革命。1937 年 9 月入第一期应城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学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1946 年，先后任中共京山县向家冲区委书记、应城矿区区委书记、汉孝陂县委书记兼县长、竹南县委书记等。1946 年 9 月，竹南县委被袭，地委决定由他重返竹南收容失散人员，在返回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捕，10 月 10 日壮烈牺牲，时年 28 岁。

陆兰秀(1917—1970)，女，苏州人，1937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1939 年在内迁到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读书，获得理学院最高奖学金。1940 年 4 月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女生支部书记。1946 年在“下关惨案”中被捕，遭毒打致伤，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关怀。1949 年开国大典时应邀观礼。“文化大革命”期间挺身捍卫真理，于 1970 年 7 月 4



日惨遭杀害，时年 53 岁。1982 年中共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追认为“革命烈士”。

章培毅(1920—1949)，安徽省桐城县人。1939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读书期间关心时事政治，学习革命理论。1948 年奉命到重庆任民革西南总部政治部主任，被国民党当局跟踪，同年 11 月在重庆被捕；1949 年 11 月 27 日牺牲于渣滓洞。

陈彦儒(1923—1948)，陕西省富平县人。1942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一年后参加校内进步社团“海燕社”。1945 年 7 月赴中原解放区参军。1946 年 3 月国民党调集军队包围中原解放区，同年 6 月他为掩护连队指导员撤退，在部队突围中不幸被俘。1948 年春节前夕壮烈牺牲。

韩秉炆(1921—1949)，1942 年考入内迁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罗广文部作策反工作。1949 年因“《挺进报》事件”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监狱，同年 11 月 27 日在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

戴健(1920—1946)，原名戴之焕，参军后改名为戴尧章，安徽省天长县人。1943 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在学校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进步读书团体“风雨谈”社，被“风雨谈”社选为副总干事。1945 年 8 月奔赴鄂豫皖边区参军。1946 年 7 月在随军突围途中、在豫西淅川境内抢渡丹江时，被山洪卷走，光荣牺牲，时年 26 岁。

王志德(1928—1947)，江苏省武进县人，1945 年毕业于武进西郊中学。次年进入南京临大补习班，旋由教育部分发入国立武汉大学土木系一年级。早年失怙，家境清苦，为人爽直刚毅，喜好数理，爱好书法。1947 年“六·一”惨案时被国民党军警用达姆弹枪杀于老斋舍“志德门”前石阶上。

黄鸣岗(1923—1947)，原名锡麟，湖北枝江县人，1946 年秋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1947 年 6 月 1 日凌晨被国民党军警枪杀于老斋舍张字斋。

陈如丰(1925—1947)，台湾省台南县新营人，1946 年秋考入



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爱好音乐、体育，擅长垒球，是武大赛格玛球队健将。1947年“六·一”惨案时被国民党军警枪杀于老斋舍“如丰门”茶炉旁。

作者系信息管理学院 2002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桂质廷：不忘“磁”心“电”基学术

李承志

壹

指南针，是中国古人对磁性与地磁磁场发现与运用的产物，受到地球磁场影响，指南针的指针永远地指向 N 与 S 级，它帮助迷失之人找到光明，它指引迷茫的前路出现希望。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如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如磁针般的身影，引领一个时代不断向前。



1895 年 1 月 9 日，在湖北省江陵县沙市镇(今沙市市)一个基督教神职人员家庭中，一个小男孩出生了，他的名字叫桂质廷。1911 年，桂质廷父亲去世，由于家庭境遇困难，他原想停学就业，但其母认为家中只此一子，坚决要他继续上学。于是变卖家中部分衣物，并得到在上海做家庭教师的姐姐的一些接济，桂质廷才得以免于辍学。

1912 年，桂质廷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文科。这一年，晚清结束，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桂质廷的青年时代目睹了晚清政府之无能，亲眼看到了中华民族饱受欺凌，中国的国民经济与生产力备受科技水平的制约。国家与民族的种种困厄，在他的心中种下了一粒种子，只等萌芽的契机。1914 年由于在校表



现出色，桂质廷被保送留美，进入耶鲁大学，这座当时的国际高标准大学为年轻的桂质廷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心中的种子也开始破土生长，他先学文科，后转学理科，并在1917年获学士学位，随即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后，芝加哥大学许多物理教员转入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原有的研究项目多已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他只能再去到欧洲各国之间流转，教华工识字，代写家信，还做各种生活福利工作以维持生计。战争结束后，他于1919年6月再到美国继续学习，他这次进入了康奈尔大学，研究无线电，仅用了短短一年时间获硕士学位。同年，“五四”运动的热潮传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了座谈会。桂质廷在会上含泪慷慨陈词，提出挽救祖国责无旁贷。一次，有位白种人朋友称赞他的研究才能，说他“和白人一样白”，他立即声称自己是“像黄种人一样黄”。

贰

在康奈尔，他结识了美籍华人许海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任教于武汉大学）。1920年，桂质廷先期回国。次年，许海兰也毅然放弃美国国籍，来到上海与桂质廷结婚。1923年，桂质廷在长沙雅礼大学任教时，由洛克菲勒基金奖学金资助，再次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该校，他曾随著名物理学家K. T. 康普顿（Compton）研究气体放电和紫外光谱，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在氢、氮和氢、汞、氮混合气中的低压电弧的特性和光谱》发表于1925年美国《物理评价》上。磁石指针经波折而方向不改，游学赤子因故土初心不断，学成之后的桂质廷于同年归国，开始了献身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生涯。1925—1930年，桂质廷先后担任长沙雅礼大学副教授；沈阳东北大学教授；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武昌华中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系主任。

“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句话出自北宋时期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也是世界上最早对于

[illegible]

物理学报, 1933, 1(1): 91-94. doi: 10.7498/aps. 1. 91

• 98 •



叁

“身材魁梧，金丝眼镜后面的双目炯炯有神，面容和蔼，举止斯文，说话轻言细语，循循善诱。只要一见面，谁都立刻感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师长。”

“桂老喜欢抽烟，为了工作、吸烟两不误，他练就了一套独特的吸烟功夫：把烟粘在上唇边，这样，闭口可以吸烟，张口可以说笑，连烟灰都不掉下来！好吸烟的同学们都想学这一招，可谁都没有学到手。”

“很巧，也很有趣。”这些都是桂先生在武大的学生对桂质廷先生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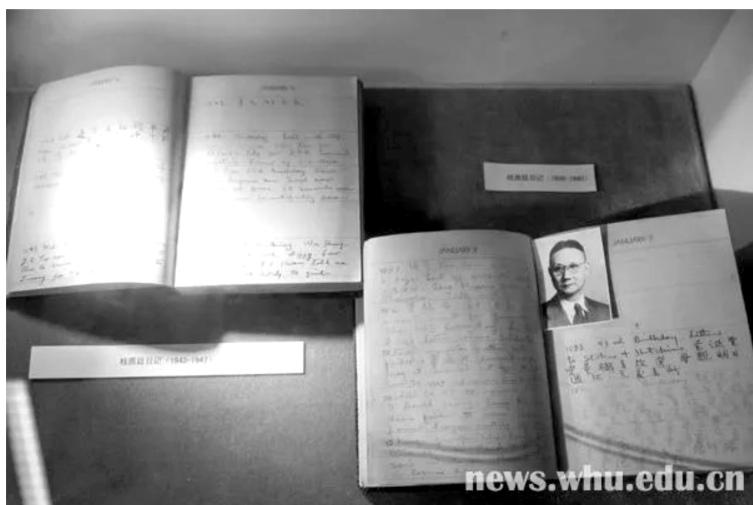
1939年3月起，桂质廷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直到1961年去世一直没有离开武大。他曾兼任物理系主任、理科研究所主任；1939年11月至1952年，兼任理学院院长；此外还兼任国立武汉大学仪器委员会委员长，第一外国语、教员升等审查、特种法规审议、建筑设备等委员会委员职务。他曾教过的课程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无线电、近代物理等。

在教育人才和学术研究方面，桂质廷先生拥有着独到的方法与长远的卓识。大家都知道，物理学方面的课，总跟实验操作和公式推导打交道，听起来难免感到枯燥。可是，桂质廷讲授的《近代物理》却不是这样。例如：讲到气体放电时，他就讲起了他当年跟康普顿先生一起做著名的“康普顿实验”的情况。讲到X射线时，他就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作为一名志愿者在欧洲用这项设备为伤员服务的情况。课堂内容非常生动亲切，以致一些学生说，上桂质廷的课，就像是“听电影”。

武大空间物理系原系主任王燊，1940—1944年就读于武大物理系，本科毕业后成为武大空间物理学开创者之一桂质廷的首位研究生。在选择专业之时，桂质廷先生并未死板地要求他一定要选择和自已相同的研究方向，而是遵循着因材施教、因乐施教的方式。先生为他指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研究方向：一是自己从事研究的电



离层物理，二是生物物理。当时，生物物理还处于萌芽阶段，他竟高瞻远瞩，预见到它将会迎来蓬勃发展。另外，如哨声传播问题，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给予了密切注意。



桂质廷先生英文日记（图源：《桂质廷诞辰 120 周年纪念展揭幕》武汉大学新闻网）

在学术与教育中，桂质廷先生总是时时刻刻地铭刻与坚守对祖国的绵绵深情，通过在地磁巡测和电离层的研究，他开拓了中国人自主时间测量的先河，并将测量完美地结合的地域特征。在测定介电常数时，他将对象选定为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特产——桐油，并在 1942 年 4 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物理学会第十届年会四川分会上，报告了两篇测定石油和润滑油的介电常数的论文。在教会学校、国外学习期间，由于对中国古代书籍接触不多，当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启测量工程之时，亲自翻阅资料，查找总结我国古代在地磁方面的成就。1943 年桂质廷作为中国知名学者被派出访美国。在美期间，他一手促成武汉大学与美国标准局合作研究电离层的计划，并于 1945 年回国时与许宗岳教授一道带回一台 DTM-CIW3 型的半自动电离层垂测仪。1946 年元旦零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战时校



址开始正式观测，武汉大学游离层实验室也由此创建，桂质廷先生多次带领学生进行观测记录，仅在 1937—1938 年，桂质廷和他的学生宋百康就作了几个月的常规观测，其成果在世界上一直处于优势地位，1949 年以后，“游离层实验室”已发展成面对空、地、海进行多项目研究的国家重点“电离层实验室”。当时乐山上空电离层的第一份正规的频高图，正是桂质廷亲自观测描绘的。

肆

除了在武汉大学招收培养中国第一个空间物理研究生王燊，桂质廷先生又以游离层实验室为基地，积极组建由英国留学回国的梁百先、武大青年教师龙咸灵等人参与的中国第一个空间物理研究团队，培养了一批中国空间物理学家和电离层与电波传播专家，他的学生王燊、张肃文、周炜、沙踪、黄锡文等在中国空间物理和电波传播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联合梁百先、龙咸灵等人培养了李钧院士、保宗梯、黄天锡、侯杰昌、焦培南等一大批中国第三代空间物理学专门人才，成为当时中国空间物理学和电离层与电波传播事业的中坚力量，为国家两弹一星等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包括桂先生再传弟子万卫星院士、易帆等多位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内的几百位第四代中青年学者分布在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国家海洋局、高等学校及国防、军事单位，已在中国空间物理和电波传播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挑起了大梁，成为本领域的骨干力量。

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爱国热情和教育方式不仅对其弟子影响深远，对子女亦如是。桂先生严格要求子女像自己一样，要做热爱祖国服务祖国的人，做一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儿子桂希恩在他的支持下志愿到缺医少药的青海边区工作 16 年，回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后，获得 2003 年防治艾滋病的贝利马丁奖、2004 年感动中国人物及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的全球医疗英雄。桂希恩的夫人高秉兰教授对丈夫给艾滋病病人慷慨捐助，将艾滋病患者领到自己家中吃



饭、住宿、治疗始终给予理解和支持。四女儿桂嘉年继承父业，和父亲一样是武汉大学物理系广受尊崇的教授，虽退休多年至今还时常到实验室帮助其学生指导研究生。其丈夫王仁卉教授曾任物理系主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湖北省物理学会理事长、湖北省电竞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子显微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一生不计名利，甘于奉献，在积劳成疾无法行走的情况下，还要桂嘉年教授用轮椅推他到实验室坚持工作。



桂质廷先生亲属桂希恩夫妇、桂庐音女士、桂嘉年女士

（图源：《桂质廷诞辰 120 周年纪念展揭幕》

武汉大学新闻网）

先生虽已远去，但其魂、其志由他的学生、他的子女后代肩负传承，他们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武汉大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巨大贡献。

伍

磁针终有方，所指曜辉光。桂质廷先生的一生便是将自己置身于磁场，置身于陷入茫然中的中国，他将自己化身为一根坚硬的磁



针牢牢地镶嵌在祖国山河之上，开拓中国空间物理学的盲区，打破地磁测量的外国垄断，培养新时代的科技人才，续前人之志，破前方雾霭。他的爱国热情和学术造诣，化为磁针亘久指引的方向，指引着学生向前，在他的引导下，武汉大学涌现了一位又一位如梁百先、王燊等的空间物理学中流砥柱。他的学术成就也绵延今日，在地球科学、航天航空、资源探测、交通运输、空间天气、测绘等诸多技术领域都拥有巨大的应用价值，福泽每一位华夏同胞。

本文参考资料：

[1]王曦. 百年梅香：家史钩沉. 下卷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892-905.

[2]骆郁廷. 乐山的回响：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91-194.

[3]赵基明. 德高望重的桂质廷先生.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2018. <https://alumni.whu.edu.cn/info/1041/12979.htm>.

[4]张在军. 坚守与薪传：抗战时期的武大教授[M]. 台北：新锐文创，2013：247-250.

[5]徐正榜，陈协强. 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508-510.

[6]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等. 品读武汉科教名人[M]. 2012：139-144.

[7]武汉大学北京老校友会，《北京珞珈》编辑部. 珞珈岁月[M]. 2003：266-269.

作者系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怀念恩师石泉先生

徐少华

2005年5月4日晚11时10分，我们敬爱的老师石泉先生在与疾病顽强抗争了半年多之后，未能像往常那样再次战胜病魔回到我们中间，驾鹤西去，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人，离开了他多年倾心培育的学生，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地理学这个神圣的事业。老师太累了，他为我们、为学术事业、为服务社会操碎了心。

跟随石师做学生，应是从1978年秋初入大学就开始了。我本科读的是考古，那时石师是考古专业的主任，在进校伊始专业师生见面会上，石师就勉励我们端正专业思想，学好专业知识，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由于当时刚进校门，除了几分新奇之外，在专业知识与学术研究方面一无所知，因而对石师的那番话语除了面上的理解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领会。

享受石师的教泽并直接感受先生的渊博学识与认真敬业的精神，还是在几年以后听他的课时。记得那是1981年春天，石师给我们历史系七七、七八两个年级的同学讲“历史地理专题”课，加之还有一些外系的同学前来旁听，使得“教二楼”二楼的大教室异常“爆满”，同学们还要轮流提前去“占位子”。因是“文革”之后第一次重开此课，十多年前的讲稿难以适应新的教学需要，必须全面调整、修改，甚至完全重写，于是石师一边整理材料一边编讲义，一边找人刻蜡纸一边油印，其中有几部分因来不及找人，都是老师自己“赶急”刻印的。每到上课之前，才把一章一节的讲义和参考



材料发给大家。所以直到一学期的课快结束时，全部讲义才分发完毕，最后大家各自想办法将它们装订成册。后来读研究生时听师母李涵老师讲，当时为了编写、刻印那本讲义，石师总是“开通宵”，天亮后简单洗漱、吃过早餐，在座椅上“靠”一会，即拎着“大包小捆”赶往教室上课。石师讲课条理清晰，材料娴熟，旁征博引，逻辑严密，不管是谈历史地理的理论问题，还是有关专题，都是史论结合、融会贯通、深入浅出，令人信服，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与敬佩。

石师在课堂讲授的同时，还经常布置一些作业，并对每一份作业认真批改，加以启发诱导。

有一次石师发给我们每人几张油印地图，要求大家标出中世纪我国西北地区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域，我觉得当时的分布地域并没有太明确的范围，就没按常理用闭合的线圈标出，而是用铅笔画的平行虚线示意，石师在批改时表示赞许，在旁边加了“设计较好，较科学”的批语，并在下次课前讲评时予以鼓励。石师这门课使我深受启发与教益，以至 24 年前那本刻印、后用回形针装订且不甚整齐、外面用牛皮纸作封面的讲义，连同当时的听课笔记与作业，至今一直保存在我书架最顺手的地方，也正是石师的学识与人格魅力，使我做出此后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的选择。

在学问上真正入门，还是在跟老师读研究生以后。我进师门时，已有国雄、甬坚两位师兄早我半年入了师门，除了公共课、基础课外，几门“专业课”都是石师在书房里给我们三人一起讲授讨论的。老师曾对我们说：指导研究生我没什么经验，就按当年陈寅恪先生指导我的方法来指导你们，边摸索边改进。同时教导我们：做学问先要有扎实的基础，同时要有开阔的眼界，否则成不了大器。所以他给我们最先开的两门课：一门是“历史地理理论”讨论，一门是“历史地理史料学”。在老师书房里上课虽然地方比较狭窄、做笔记不太方便，但也有几点好处，一是资料“现存”，可以边讲边讨论边实习，需要什么资料就取什么，当堂解决问题，印象特别深刻。再就是中间休息时，师母常给我们送些茶水、水果或点心之



类的“犒劳”；有时因某个问题“拖堂”下课晚了，老师担心我们回去后食堂没菜吃，就要师母加两个菜，留我们在他家“蹭”一顿饭，若逢节日，这顿饭必吃无疑。时间一久，老师家上课那天的晚餐，几成了当天课堂的必然内容。

我本科学考古，在实物资料和田野方面有点基础，对商周文明与楚文化有一些兴趣，而文献方面的底子薄弱，尤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缺乏系统的训练。针对这一具体情况，我刚入门，石师就对我说：你学考古出身，这是你的优势，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加强，力求做到准确认识、科学运用考古材料，而不是简单下结论；同时要在历史地理与文献方面下工夫，从原始材料入手，在鉴别、理解与运用文献资料上花气力，决不能随手拣来就用，这方面我能帮你。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不错，一定要抓紧时间。希望你今后能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在先秦历史地理与文化方面做出一点成绩。我不懂的，可以请其他老师来帮你。如果说四年前老师的那番话我只是礼貌地听听而已，四年后的这番话，我深深领会到了其中的分量与期望，同时也感到无形的压力与责任。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学习的动力与方向。

在石师的安排下，读硕的前两年，徐德宽老师给我补了一学期的自然地理，蔡述明老师教了一学期的历史自然地理专题，王克陵老师讲了一学期的地图学；同时，老师还安排我补修夏涿老师的古文字学，周大璞、宗福邦老师的音韵训诂学课，并特地给几位老师打招呼，要他们多给我指导。在考古方面，老师还安排萧亢达、王光镐等老师专门辅导，定期请益。三年的硕士生活虽然过得非常紧张，甚至近乎“严酷”，但也正是这三年，使我们在学术上受到了严格、系统的训练，为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回想起来，可见石师的用心良苦和因材施教。

先生做事极其认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先学做人。做人贵在诚信，做事务在认真，做学问定要求真，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对我们的课程作业和学位论文，他总是严格把关，一丝不苟。在几十年对古代荆楚地理的研究



与探索中，石师对今本《水经注》中有关长江中游的《江水》《沔水》诸篇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看法，在讲“历史地理史料学”时，他通过大量史例教育我们：现存诸版本的《水经注》已非本来面目，在先已散乱残佚后，虽经历代学者加工整理及订补，至今内容紊乱费解以至有明显错误之处仍屡见不鲜，不能笼统凭信；并告诫我们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对《水经注》的有关记载要作细致剖析，力求返本探源，尽可能恢复《水经注》的本来面目。后来做课程论文时，我拟根据《水经注》卷20《丹水篇》的记载对其中下游的山川、城邑作一番“梳理”，在收集、分析材料时，我意识到今本《丹水篇》确实有很多问题，如与卷29《均水篇》的分割，析水、黄水、均水诸水的位置，古析县、丹水县、南乡县诸城邑的关系与地望等，颇有疑点，因囿于汪士铎、杨守敬等前代大师们的成说，加之当时自己的学识浅薄，又不愿在这上面下“死”工夫，觉得没法理清这些疑难，便回避矛盾，在汪、杨等学者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仅对古析县、丹水县的地望作了简单的分析和推论，其实根本没有找到问题的缘由，更谈不上解决矛盾，只是“和”了一团稀泥而已。作业交给石师后，没过几天，老师把我叫去，拿出我的“论文”，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满是批语和补充材料。老师对我说，你没把问题弄清楚，只做了些面上的工作，关键是没有吃透材料，没有深入进去。然后老师打开《水经注》的《丹水篇》与《均水篇》，又翻出《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和有关《地图册》等，与我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教我认真对照、分析，寻找问题的根源，同时教导说：做学问就要舍得花“笨”工夫，脚踏实地，决不能投机取巧、避重就轻，否则出不了成果，更谈不上创见。老师的话语虽不重，却令我万分羞愧，无地自容。那天晚上老师在他书房里手把手地教、面对面地讲，条分缕析，返本探源，使我基本上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明确了下一步收集材料的范围、探索的目标与方法（该文后经全面改写，又得到辛德勇先生的指正，在《论丛》上发表）。从老师家出来已是夜深人静了，当时的心情是既有苦辣也有甘甜，既有悔恨也有收获。这是我初识石师严格、认真之“真格”，也是我学做



论文、步入学术之起步，令我永志难忘。

记得在做硕士学位论文时，涉及先秦古申国、楚宛县与汉晋南阳郡治宛城的地望。据《汉志》《水经注》及《寰宇记》，古申国、楚宛县与汉晋南阳郡治并在一地，考古材料也比较明确。然唐初的《括地志》却说“故申城在邓州南阳县北三十里”（《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清代地理名著《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皆依此而定古申国、楚宛县于汉晋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以北二三十里处，近世出版的各类历史地图集亦以此为据。我在整理材料时虽看到了此间的矛盾，然在一番“分析”之后没有弄清缘由，就对传统说法做了认定，并以考古材料加以“印证”。初稿交老师后，过了些时我去面谈，老师拿出这部分稿子，指着用铅笔加在上面的材料说：你注意到没有，《括地志》在讲“故申城”在当时南阳县北三十里的同时，还有一条相关记载“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宛城”（《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这里提到“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的西南部，说明在唐初《括地志》成书时，南阳县已有迁动，故城为古宛城，是申国故都所在，而当时的南阳县治则在古城南三十里。《括地志》与汉晋记载并不矛盾，问题出在清人对《括地志》的理解有误，以至影响至今。其实这几条材料我都“认真”比较过，但没有看出什么道道，老师这么一分析、点拨，使我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在深感愧疚的同时，由衷地敬佩老师敏锐的学术眼光与深邃的洞察力。问题基本明朗后，老师还提示我要结合《隋志》等弄清唐初前后南阳县的沿革变化，尽可能完满解决这一疑难。临离开时，老师开导我：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要充分理解原始材料，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陈寅恪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往往从常见史料中分析出使人意外而又理所当然的新解。

正是老师一次又一次的严格和认真，一次又一次的启发和引导，才使我慢慢开窍，逐渐领悟到学术探索与追求真理的价值，认识到老师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教书育人的良苦用心，这是老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老师走了，留给我们无限的悲痛与思念。20多年来恩师对我



们的谆谆教诲、授业解惑和极大关爱，20 多年来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与师德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教学领域努力奋斗，不断进取。

（原载《中国地理历史论丛》2005 年第 20 卷第 3 期）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历史系 1978 级校友



坐我光风霁月中

——追怀萧蕙父先生二三事

郭齐勇

重阳节这天，也是萧蕙父老师走后的三七祭日。面对老师、师母的遗像，我噙着泪水，敬上三炷香，鞠躬礼拜。萧老师真的走了吗？三周以来，我总是难以置信地反问自己。每有电话铃声，便迅速拿起听筒，总是企盼听到那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小郭……”

读本科时，萧老师给我们上过“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课。萧师人长得极为潇洒，个子高，黑发密且长，戴着眼镜，风度翩翩；他的课也讲得潇洒，略带一点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富有激情，讲到动情处，妙语连珠，语速极快。偶尔激动起来，便把讲坛一拍作狮子之吼，同学们的心弦被震得直响。他的板书展现了书法功底，同学们反映有的字用草书不易辨识，之后他便改写得正规一些。我们喜欢听他讲课，是因为他会不时扯到课程之外，很能启发新思。例如，本来在讲中国古代哲学，他因某一命题的触发灵感一来，忽然跳跃到马克思，问我们：“为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有时忽然迸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殷殷盼望大救星，而国际歌却说不靠神仙皇帝，到底孰是孰非？”我们毫无思想准备，说老实话，当时的思想还被禁锢着，十分教条，大家顿时无语，150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他停留片刻，微微一笑，然后讲开去……这正是他对我们的思想启蒙。

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收获最大。我们的研究生课多是讨论式的，读书则在课下。当然也听老师们讲，老师们讲的多是他们的研



究新成果或主持讨论的前沿。“哲学史方法论”是一学年的课，由萧老师与陈修斋先生共同主持，中外哲学史教研室的老师、研究生一起来上课。除萧、陈先生外，杨祖陶、王荫庭、李德永、唐明邦先生等也分别主持过专题讨论。大家争论起问题来面红耳赤、昏天黑地，老师们为我们疏导、解惑。萧、唐、李师又给我们上了一学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名著经典选读”课，他们带读导读，再让我们自己读、自己讲，又帮助教研室校核《中国古代辩证法史资料》，挑毛病。萧师单独给我们开了一学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的课，每上完一课，就让我们到图书馆特别是线装书库、善本室里去查书，了解这一讲的目录、版本情况；与所听讲不符的、或另有发现的，下一堂课来交流。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有好几届研究生分别、反复整理听课笔记，加以丰富完善。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给萧老师当过研究生课的助教，帮忙查资料、答疑、组织讨论，也参与整理《古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古史祛疑》等著述。

从1979年开始，我经常单独向萧师求教。当我拿着自己写的、浅薄的习作给他看时，常常忐忑不安。为消除我的紧张，他总是很随意地跟我聊天。有一次，我到 he 住的一区山上的老房子去，他刚好马上要出差到太原出席中哲史学界第一次会议，便顺手给了一份他提交会议的论文让我学习；还有一次，他送我一份《光明日报》，几乎一整版刊登了他写的《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评〈中国哲学〉创刊号》的文章，那是一篇有思想的美文。他总是认真审阅我粗浅的习作，审阅之后，找我谈修改意见；我再修改，他再审修后推荐发表。记得我写的一篇有关王夫之的习作，原只有两部分，他从我的原稿中剪裁，又提示再看哪些资料，帮我改成了三部分的结构，让我再补充修改，并谆谆告诫我说：“两元结构不稳，一座高塔，一般三层才稳，一篇文章，一般三部分才好，你要学会三段架构。”这篇习作，他推荐给包遵信先生，1983年在《中国哲学》第10辑上发表。他还指导我读王夫之的《尚书引义》，那本书很不好读，他告诉我如何下手、参读什么书、如何读才能有所得，然后如何爬梳、提炼，形成论文。这篇论文1982年提交全国王夫



之讨论会，后于1984年正式发表。

不论是给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授课，萧老师都特别开放，常常请过往武汉的专家来讲课，有时也专门请思想敏锐、有新见的学者来讲课，例如，汤一介、庞朴、陈俊民、刘蔚华、傅伟勋、陈鼓应等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他主张“学无常师”，也提倡师生平等切磋学问，曾激赏黄卫平同学写的与他商榷的文章，还把这篇文章推荐发表。

萧师才思敏捷，对哲学界各种讨论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新信息、新动态都非常关注，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即《巴黎手稿》）的讨论，朱光潜先生对《巴黎手稿》、特别是对《费尔巴哈论纲》的重新翻译，对维柯的《新科学》的翻译及其价值，哲学史上“两军对战式的对子结构”与“螺旋上升的圆圈结构”，中国哲学范畴与范畴史研究，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关于孔子、《中庸》和宋明理学的再评价，唐兰、张政烺、冯友兰、张岱年、岛田虔次、冯契、王元化、李泽厚、庞朴、汪澍白等先生的新观点，《未定稿》《读书》上有什么新文章，《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刊，《考古》《文物》上介绍的新发现与新研究动向（他长期订阅《考古》），马王堆与银雀山等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等，包括如何使用工具书如《经籍纂诂》等，都提示给我们，启发我们去关注、把握、理解、参与。因萧师的关系，岛田虔次先生放心地把著作交给他的学生蒋国保、徐水生、甘万萍等去翻译。

老师家学渊源，有童子功，多才多艺，善诗书雕刻，“文革”期间在襄阳分校劳动时曾刻过几枚闲章。我们与老师熟识之后，每逢开会聚餐，他让我们喝白酒。我与有的同学不胜酒力，又不善诗词歌赋，有一次他说：你们又不会喝酒，又不会吟诗，又不会书法，搞什么中国哲学？

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那几年，老师家住在九区东湖边上，那一带风特别大，秋冬寒气逼人，而老师长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渐渐转成肺气肿。为了避寒，老师和师母秋冬南行，春暖花开后才回武汉，他们戏称为“候鸟”。当时主要靠朋友、学生事先安排借房暂住，或在海南，



或在广西北海，或在广州郊外。承蒙萧老师的朋友、时在海南大学的校友邓悦生院长，中央党校金春明、李振霞教授伉俪等悉心安排，老师与师母 1989 年、1990 年岁末都是在海南度过的。他的朋友、原华中师大现海南大学周伟民、唐玲玲教授伉俪，萧老师的学生李汉武等人关心、探视、聊天，使他们在艰难之中略得到一些心灵慰藉。老师 1991 年春节前的拜年诗《谢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即记此：“泥涂曳尾说逍遥，独有诗魂不可招……辙鲋难忘秋水阔，绿洲情暖慰心涛。”跋语中特别说道：“华盖多忧，师友之高情可感。”他们每次南行都要带不少行李，但到目的地后仍觉得东西带少了不方便；尤其是一心挂两头，心里牵挂着师妹等亲人。师母曾几次说真不想这样做候鸟了。她老人家告诉我，有一年在广州郊外居住时特别冷清，无人说话，也不安全。有一次刮风，钥匙锁在了屋内，俩老穿得少，天也黑了，在屋外等了几个小时，幸而一位学生从城里赶过来才解了困。1996 年，萧师仍住幼儿园旁旧房，不想再南行了，靠电热汀过冬。1997 年，萧师搬到新居博导楼。1998 年，新居有了暖气，萧师再也不用做候鸟了。

1993 年夏，萧师手书他头一年游五台山的诗作，赠我条幅，以期劫尘尽扫：

隐几维摩原未病，文殊慰语忒多情。
对谈忽到无言处，花雨纷纷扫劫尘。

五台行吟诗之一书示齐勇目击一粲
癸酉夏蕙于珞珈

萧先生晚年诗中“三年华盖终无悔”“庄狂屈狷总违时”“垂老狷狂未失真”等都是其心志的表达。他在为冯契先生 80 寿诞所写文中引用《论语》中的“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和王船山的“出入于险阻而自靖”，来表达对冯契先生人格、节操的赞佩，这也是萧师“求仁得仁”的夫子自道。《贺冯契八十华诞》诗：“劫后沉吟一笑通，探珠蓄艾此心同。”“慧境含弘真善美”，“霁月襟怀长者风”。萧师



在这一阶段特别阐释道家风骨与王夫之的人格美，有深意焉。他让我懂得，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所为何事。

近日清理旧书刊，无意中发现了一册香港学人编的《毅圃》(1996年9月第七期)，其中第19至25页上刊载有萧师《徐复观学思成就的时代意义》(1995年8月在武汉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一文，其间夹有此文的原稿。如果没有看到这19页400字大稿纸上的蓝墨水钢笔原稿，我完全不记得老师这一文的初稿是我按老师的思路整理的，在原稿上有老师三种笔迹的修改，有的地方修改得密密麻麻。而原稿纸上有些老师笔迹的内容，正式刊出的文章中并没有见到，可见老师还有一次修订。在第一页老师的亲笔(红圆珠笔)所写中，有这些内容：“我刚从唐君毅先生故居来，从唐先生的哲学殿堂来到徐先生的人文世界，真如徐先生所论中国文化发展的性格从上往下落，从外往内收的味道。”这句话后来没有了。原稿第一页上圈掉我写的一段，框边有老师用蓝圆珠笔写的“屈：忽返顾以流涕，哀民生之多艰”；“杜：穷年忧黎民，太息肝肠热”。这些后来也没有用。第二页，我的原稿中称赞徐：“他是一个真人”；老师改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的真人！”第三页，老师圈掉一段，改写为：“反专制，反奴性，熊十力先生有痛切的陈述，显然影响到徐。”“熊：宏观立论，徐以微观论史证实之。”最后一页末尾，老师圈掉一段，重写：“严复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体在何处？总之，从政治文化、德性学说、艺术精神的反思、剥离中，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自由精神、不为物化的人道之尊，这是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这就是徐先生学术成就的时代意义。”这一段在正式发表时文字上又有改变，其中“是传统与现代化的接合处”(“接合”是他的特殊用法)是他在原稿末页特别加上的。

偶尔我等为萧师整理点讲义、文稿，正式发表后，他会把原稿、修改件、正式发表的刊物都给我们，让我们看前后的不同，对比并思考他最后为什么要这样想、写、改、定稿，从中获得教益。这一原稿修改件使我回忆起1995年暑假的经历。那年7月，萧师



与我等一行经北京、洛杉矶到达波士顿出席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这是老师继 1985 年、1992 年之后第三次赴美，我则是第一次。会后我们由朋友接待一道旅行。中途他又回到波士顿，杜维明先生请他再次到哈佛讲学，受到礼遇，情深意切，老师尤为感激。我们师生会合后，原道返回。在飞机上，我们讨论徐复观会议开幕词，老师定下基调。我谈了自己对徐氏《两汉思想史》中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自由意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对儒家道德自由的高扬、《中国艺术精神》中对道家艺术自由的高扬的理解，他说就抓住这几个“自由”来写，发掘传统与现代的接合点。回北京后，萧师又风尘仆仆赶往四川，出席在宜宾举行的第二届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然后才回武汉。



1995 年与萧蓬父先生在波士顿大学访问时留影（左一为萧先生）

老师晚年与我发生过一次齟齬，至今我仍责备自己的鲁莽，深觉愧疚与不安。大约是 2004 年年初，学校为提升文科的地位，促其发展，设置“资深教授”的岗位，请有一定年资与学术实力的学者申报（包括离退休的老师），评上者享受院士待遇。那时我在院里兼俗务，看到这个文件与表格后便请办公室分送有关先生，鼓励大家申报。我当时已猜到萧师肯定不会申报，但还是按所谓客观化



程序，生怕如有的前辈不知情反而造成工作失误与诸多误会，故请办公室照送。此外，我还存有侥幸心理：只要萧师肯报，我们帮他填表，以他的水平与声望，应无问题，起码可以大大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吧。没想到很快有了反馈信息，办公室的同志通报，萧老师发火了，打电话来说：“叫郭齐勇来把表拿回去！”我立即赶到老师府上请罪。那天老师很不高兴，指着文件与表格说：“我身体不好，不申报，你拿走吧。”我连忙解释，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老师在怪我。他早就说过，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何尝不知萧师早已超然于名利之外了呢？尔后，与萧老师的沟通与交谈中，我知道老师很理解并支持学校的这一举措，对已评上“资深教授”的学者十分尊重，实在是他个人觉得既不能再继续工作，何苦再添心累，而且不想自取其辱。



1995年夏在波士顿大学出席国际中国哲学会与萧蓬父先生(左二)、
杜维明先生(左三)、陈来教授(左一)合影

萧师有放达潇洒、超脱逍遥的一面，又有极其细腻的一面。他心细，尊重人；待人接物礼貌周全，来而有往；朋友后学(包括不认识的青年)有求必应。我至今还保留了不少他写给我的便条，有的写在大小信封的背后，有的写在顺手拈来的纸片上或信件的天头



地脚，一般都是：齐勇云云。晚年写上：齐勇教授云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下面则是一、二、三条应注意的事项，或帮查师弟论文中的疑点，或代他回复某人的信，寄什么书或办什么事，或不要忘了什么细节，尤其是答辩会请专家，来参会或讲学的长者接待事宜等。亦常有电话，也是反复叮咛。在老师身边，我们都习惯了。在老师的耳提面命下，我们都学会办会、做事，力求像他一样敬业，认真，细致，周到，为人着想。



1987年重阳节与庞朴(中)、萧蓬父先生(右一)

在香山饭店出席梁漱溟九五初度会

老师是很恋家爱家的人。师太一直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直到逝世。萧奶奶能诗能画，颇有才情。老师与师母很忙，但对老人照顾得很好。老师与师母以梅画与诗歌为媒，含蓄表达恋情的《峨眉纪游诗》十四首，原稿因尔后的政治运动而佚亡，他们也不再记得。不想五十多年前，这些诗作被两位外国教授译成英文出版，与李白、杜甫的咏峨眉诗选录在一起，直到1995年乐黛云教授在新西兰一座小城发现了这部中英文对照的诗集告诉他们，才重温旧事，



感触良多。师母卢文筠教授是病毒学专家，在高尚荫教授领衔的团队中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现在的科学家很少人有师母这样的人文修养了，她笔下的梅花也是她与老师高洁人品的象征。这对患难之交共同渡过了不少劫难。退休之后，师母全身心照料老师，屋里屋外忙碌，常见她骑着小轮自行车在校园匆匆穿行。

1999 年秋，师母陪老师去北京出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大会，那是老师最后一次去外地开会。在妇女大厦住下后，师母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告诉我萧师身体的真实情况，并讲了老师衰弱的一些细节与征兆，很是着急。一直以来，都是师母照顾老师，孰料师母于 2003 年突发肺炎，7 月住院 9 月出院，以后每况愈下，反由老师照顾师母，有时要帮师母穿衣。师母于 2005 年 4 月开始嗜睡，5 月进食困难，6 月 9 日因肺纤维化引起的心力衰竭而仙逝。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近 60 年，师母走了，老师的悲痛可想而知。百日后，老师对我说：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时常是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少了一人……萧公子陪他到北京小住、散心，庞朴先生去看他，萧师见到庞公的第一句话是：“我学不了庄子啊！”他做不到鼓盆而歌；其实，老师有真情实感，不矫揉造作、不着相，这才是庄子的真精神啊！

老师走后，吊唁者 200 余人，出席告别仪式者 300 余人，唁电唁函 300 多，花圈花篮 300 多，媒体网络发表的怀念诗文无数，哀荣备至，充分彰显了老师的人格魅力，真所谓“其仁如天”“有德此有人”。悼惜之如此，用子贡赞颂孔子的话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我是深知老师的门人，我相信，萧师更喜欢庄子的话：“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为了我们这些学生的成长，萧师太操心了、太累了，现在好好休息吧！假若真有所谓天堂，老师与师母会合，再奏琴瑟和鸣之音，重现筠画蕙诗之盛，那该多美啊！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哲学系 1978 级校友



怀念父亲马克昌

马重慧

在父亲得病以前，不论在我眼里还是心中，他都是我不老的爸爸。他敏捷的思维、洪亮的声音、充沛的精力、忙碌的身影和几十年不变的生活习惯，从来没有让我觉得父亲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没想到，心中不老的父亲会这么早地离我们而去。

2011年年底，父亲离去年以后，我才理性地接受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的事实。可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身边，无处不在。



身为教师的父亲

1979年，53岁的父亲结束了人生中20多年的冬天，即将重返阔别多年的三尺讲台，他用了“实在令人兴奋”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为了弥补黄金岁月流逝的遗憾，父亲重返讲坛后，竭尽全力投身到了在此后30多年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法学教育中。1983年9月，父亲受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同时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肩负着教学、管理、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等多重重任。同年年底，在刘道玉校长的关心支持下，我也由武汉第三印染厂设计室调到武汉大学出版社任美术编辑。从此，结束了父亲在珞珈山下30多年吃食堂的“单身”生活，在武大校园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来到父亲身边，终日见到的都是他上课、开会、出差、伏在桌子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的忙碌身影，家里时常响起此起彼落的电话



铃声，还有不断来访的客人，他们大多是为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事务以及法律咨询而来的。当时的法律系、后来的法学院的陈明义书记、兰远庆副书记、马俊驹副院长、毛峰主任等常常晚上来家里商量工作，有时谈到深夜至凌晨。父亲在家里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指导则更是常事。

家里电话成了父亲的专线，只要他在家，都是他接。当遇到对方要找马老师而声音不熟悉时，他都会客气地说：“我就是。请问你有什么事？”其实有时候是找我的。有几次不熟悉我的作者打电话来，听父亲说是马老师时，就和他不着边地聊起来，直到明白是误会了，父亲就会哈哈大笑地说：“你是要找出出版社的马老师吧？”后来，再有电话找马老师，他就会幽默地问：“是找老马老师还是小马老师？”

因为来家里找父亲的客人特别多，所以我们几次搬家都是把他的书房安排在方便客人出入的房间，家里的大门也随时向需要找父亲的人开着。

父亲的弟子说：“做马先生的学生既欣慰又紧张。”欣慰，源于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仰慕；紧张，源于父亲对他们近乎苛刻的要求。

父亲对指导的每一位学生负责、对上的每一节课负责。不管上什么课、做什么讲座，都充分准备。有时凌晨了他还在伏案工作，我就知道他明天一定有课或者讲座。即使是已经十分熟悉的讲课内容，即使是可以洋洋洒洒地讲上几个小时的报告，父亲都会把最新的知识、信息、案例、学术观点及时补充进去，直到晚年都如此。

父亲的好友说他爱才，学生说他是严师慈父、良师益友，这些评价一点都不夸张。

按照学校的指标，父亲每年可招收2名博士生，但通常报考的学生都比较多。有一年有4名考生过了线，在父亲看来4名学生都很优秀，谁落榜了都可惜。于是，他找到校研究生院，“借”用了第二年的招生指标，让4名考生全部如愿入学。

有一年，我在家里餐桌上看到了一份招考博士生的过线名单，整整10名，我知道这个取舍会让父亲很为难。他把手背在身后，在餐厅里来回踱着步，边走边说：“他们中间好几个都不错，有的



已经是大学副教授，有的考了不止一次，要想办法多上几个。”他再次找到校研究生院，采取增加名额、调剂导师等办法，最终让7名考生圆了博士梦。那10名过线名单中，有一个与我们家沾亲带故，终因考分排序偏后而名落孙山。

对待来求教的考生，不论是来访的，还是来电来信的，父亲都一一耐心指导：报考中应注意什么问题，作为刑法学的研究生需要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要看哪些参考书，甚至这些书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等。有些考生会做些自我介绍，他都加以赞赏；有些考生信心不足，他加以鼓励。但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考生，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找到父亲的，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丁点所谓小范围的“指点”，是绝对不可能的。整理父亲的信件时，不论是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那些曾经得到过指导、帮助的考生，都发自肺腑地感激父亲，这让我看到了父亲宽广博爱的胸怀。

父亲不仅爱才，而且爱才有方。他为面临毕业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引领发展之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质和研究方向搭桥牵线，推荐到高校或政法系统工作；父亲也为在校青年教师的脱颖而出一次次竭尽全力地创造条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父亲还为解决青年教师工作和生活上的棘手问题，亲自出面找学校领导沟通。好几次，他不顾自己年岁已高，晚上10点、11点多钟还摸黑去到校领导家里，为的是尽快见到领导、尽快解决问题。每当办妥一件事，回家时总是一脸的兴奋和喜悦。可谁又知，在这兴奋喜悦的背后，父亲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和付出！他的学生出国学习，他不仅事无巨细地予以关怀指点，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有的还施以经济上的援手。父亲对弟子及年轻教师尽心尽力尽责的扶持和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做教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不仅仅将学识传授给学生，更强调学生要学会做人，他以自己的人格修为默默地影响着弟子们。父亲希望弟子们能做“大官”，以完成他没有能力完成的使命。

父亲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资助科研项目、扶助贫困学子，寄望法学天地英才辈出。



父亲如此辛勤地耕耘与播种，只是希冀无限延长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生命。

家里客厅和书房里有8个书柜摆满了父亲的各类书籍，书房的空地上也整齐地堆放着一本本论文、一袋袋剪报、一封封信件、一摞摞会议文稿和案件资料。



身为学者的父亲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看到不少书上有他阅读后留下的批注、手记；一些大小不一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喜爱的中国古诗词、历史人物大事记及各种文摘杂记、日本刑法学家的论著、生僻字词的读音及解释等；牛皮文件袋里，分别存放着从各类报纸上剪下来的与法治建设息息相关的文章，并注明了文章的来源和时间。正因为父亲一辈子的细心收集、用心学习、潜心研究，才得以博学多闻、满腹经纶。

都说父亲治学严谨、魂系法学，法典法条、案例论述总是信手



拈来，几近无一差错。和父亲一起生活了 20 多年的我，直到他生病住院时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当父亲住进医院知道自己一时半会回不了家时，就把著述的任务带到了病房。我一周至少去医院两次，每次去之前会和他通话，他告诉我要带什么样的稿纸、哪几本书，并清楚地告知书的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还有放在哪个书柜的第几层。通常是我一边听电话一边找书，几乎是一找一个准。他对这些书籍的熟悉程度让我十分惊讶。在父亲住院 348 天的前前后后，我带到医院的书至少几十本，只有两本让我找时费了些周折：一本是时事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国家安全概述》，因出版时间较早，父亲记不清存放的准确地方了；另一本是日本原版图书《刑法判例百选 II》，父亲告诉我的信息无误，只是这本书的封面是幅彩色风景画，实在不像一本严肃的法学图书，固定的思维使我误判，几次翻到这本书时都没细看书名，直到从父亲弟子陈家林那里借来了同一本书，我才恍然大悟。

记得当时父亲在撰写《百罪通论》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时，他让我查一些词的解释，如“间谍”“公共”等。说实话，在父亲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专业了解少之又少，我不太理解，这么常见的词为什么还需要特别注释。我把家里的工具书——词典、辞海、辞源里的解释都一一记下来带到医院；特别是“公共”一词，百度词条的解释更详细，我打印下来给父亲看。他问我，用了百度的注释脚注应该怎么写。最后我翻了好多书才终于找到一个父亲认为很规范脚注范本。

父亲有剪报的习惯。家里订有八九份报纸，隔几天到医院，我就给他带去一大包。看完后他会把其他报纸上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照老习惯装在牛皮纸袋里，而把《南方周末》《报刊文摘》集中收好，下次由我再带回家，他知道家里人也喜欢这两份报纸。

2011 年上半年，《刑法修正案(八)》广泛征求意见，尤其是“醉驾入罪”在社会各界引发热议，父亲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我把网上的相关信息讲给父亲听，他饶有兴趣地让我打印给他看。5 月，他在日历记事簿上特别写着：“张军 5 月 10 日在全国法院刑事



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说：‘对于醉酒驾驶，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应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那本日历记事簿上，满是记载着父亲每天打针、输液、输血、抽血、化验及与疾病相关的情况，唯有这一段文字与他的疾病毫无关系。显然，他对醉驾入罪的关注像对生命一样重视。

1983—1992年，父亲在任第七、第八届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接待来访群众，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协调解决了一些有争议的案件。媒体报道以后，慕名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更多了。那段时间，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还常有各种各样的人找到家里来，有的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有的目光呆滞、神志不清，有的甚至还没进门就下跪磕头，直呼“马教授、马青天”。

父亲关注民情、体谅民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援助有求的百姓。面对那么多民众的来信，父亲能回信的就亲自回，没时间回信的就将意见告诉学生，委托学生回复。来信多了，他把已回复和未回复的信件做上标记，以免混淆。面对找上门的老百姓，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会耐心地听他们讲述及查看资料，为他们提供帮助。曾有好友劝说父亲，教好自己的书就行了，何必管那么多闲事。可在父亲心中，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一定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0年前父亲帮助过的马浙，在父亲离世后第三天特意从浙江赶来为父亲送行。他满含热泪地告诉我，他的生命是父亲给的，在他蒙受冤屈、身陷囹圄时，死的心都有了，是父亲写信给了他活下来的勇气和力量。父亲住院期间还答应出院后带他去北京。虽然父亲的离去没能帮他解决最后的遗留问题，但他直到现在逢年过节都会打电话到家里致以问候。

父亲待人谦和、宽厚，心地善良，特别是对年轻人。有一次，父亲在家里接受某媒体记者的采访，说到当年的“特别辩护”这一话题，年轻的记者居然不知道吴法宪为何人。在与客厅一窗之隔的



电脑上工作的我很吃惊，父亲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稍作停顿后，他耐心细致地向年轻记者介绍了吴法宪其人，并讲述了特别审判时为吴法宪辩护的前前后后。末了，他语重心长且十分恳切地对记者说：“你们年轻，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但不可以不知道，特别是你们做新闻工作的，没有丰富的阅历，可以通过多读书来了解历史、了解世界……”话语间没有鄙薄和指责，年轻记者听后满是愧疚、感激和敬意。

盛名之下，父亲在社会上兼任多职，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常常让他总是在外奔波，特别是每年多次往返北京。为了节约时间和出差费用，他多是乘坐夕发朝至的 T37/38 次火车，哪怕在北京只有一天的会议，父亲都是即去即回。目睹他早上下车、晚上又上车的列车乘务员都惊讶，这么大的年纪，怎么会有如此好的精力。80 岁以后，家人和父亲的弟子不允许他这样辛劳了，他才会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北京工作的弟子们都会抓住机会和他小聚。





记忆中的父亲

1949年，父亲让母亲回到解放不久的河南老家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老家西华县是黄泛灾区腹地，那个时候特别贫穷，母亲在那里不仅生活中吃了不少苦，精神上受了许多磨难，还遭遇了世上最难以愈合的哀伤——因医疗条件落后而失去了年近2岁的第一个孩子马幼慧。这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我童年时对父亲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很少和他在一起。那时，我们几个孩子都和母亲生活在汉口，父亲只是周末才从武昌坐公交车辗转20多里路回一趟家。这期间，他还先后到蕲春县八里湖农场、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和沙洋农场劳动改造，一两年都见不上一面。再往后，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近四年。等到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时，我已成家、已为人母。这个时候角色发生了转换，父亲的生活起居开始全由我来关心照顾了。

幼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只是星星点点，最深刻的记忆只有他给我们讲《西游记》了。大概在1961年前后，周末父亲回到我们在武汉市11中学的家，每次回来都会给大家讲故事。记得有一段时间正值盛夏，武汉人习惯晚上在露天乘凉，我和弟弟霄汉躺在学校操场中间的凉床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西游记》。从石猴出世、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到三打白骨精、收服红孩儿、真假美猴王……慢慢地，院子里的小伙伴都被生动的故事吸引来了。讲完一个故事后，大伙儿都嚷着“再讲一个，再讲一个”。因时间不早了，父亲就会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周分解。”于是，我们盼呀盼呀，盼着下一个周末快点到来。

少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虽然多了些片段，但最深刻的莫过于父亲每次回家，都斜挎着一个很大的、装满书的军绿书包。周末在家里一天，他除买米买煤干些体力活外，其余的时间就是看书。

再往后，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父亲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给我借了不少世界名著。《简·爱》《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红字》《鲁滨逊漂流记》等，我都是在那个时候阅



读的。另外，父亲还给我们买了《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斯》《茶花女》，以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书籍。

1983年12月，我调入武汉大学工作，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了。20多年的一朝一夕，留在我脑海中的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大忙人，终日有写不完的文章、做不完的事。

父亲的日历上从来没有休息日。这么多年，只要他在家，一天至少10多个小时是在书桌前度过的，即使逢年过节也如此。堆满桌子的书、稿纸和信件，一般都不让别人收拾，说是移动了地方不好找。

或许是因为父亲的前半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以至于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他仍旧保留着“单身”生活的习惯：饭做好了才上桌吃，吃完饭只洗自己的碗，休息片刻就开始读书写书；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来什么亲戚，他都只顾埋头自己的工作；生活朴素简单，家务事一般不闻不问，儿女的婚姻大事也不知道操心。妹妹出嫁前夕，我提醒父亲这一天不要安排其他事情，结果他还是忘了，居然买了妹妹婚嫁当日的火车票准备出差去上海。好在我及时发现，才改签了车票时间。

这么多年，父亲把如江河般的大爱都给了他钟爱的事业和学生，留给儿女的爱却似山间小溪，且如涓流般含蓄，但点点滴滴仍然滋润了我们的心田。

1986年，父亲以6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患病期间的父亲

2006年一次检查身体时，医生说父亲是“80岁的身体40岁的心脏”。他听后开心至极，于是把工作满满当当地安排到了90岁，并和好友西原春夫先生相约活到100岁。哪知，不久病魔就悄悄地纠缠上了身。

2007年下半年开始，父亲的口腔反复溃疡，少有好的时候。他忍着疼痛，照旧频繁出差、开会、讲学。以我对医学知识粗浅的了解，以为这是他年事已高、劳累过度、免疫力低下所致。我恳求



父亲减少社会活动，注意休息；同时私下提醒他的弟子、刚卸任法学院党委书记的莫洪宪教授，对需要父亲出席的会议及其他活动有选择性地让他参加。

2009年，虽然父亲在几个大城市前后接受了中西医治疗，口腔溃疡仍不见好，且日渐消瘦。

2010年元月，父亲患肛瘘住到同济医院。因临近春节，没有做手术，回家保守疗法一个多月不见效果。3月12日再次入院，19日手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由于自身免疫力低下，父亲连续高烧多日，吃不进东西，以至于后来不能下地走路，弟弟霄汉终日守护在父亲身边。6月下旬，因双脚浮肿，在校医院检查两次无果。7月7日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因全血低下，医生要求立即住院以确诊病情，父亲不同意，对医生说：“要住院，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住院证据。”在校领导的动员下，7月8日父亲住进了人民医院，从此永远离开了家。

经过两次骨穿，父亲被确诊患上“亚急性红白血病(M6)”。这是十分残酷的结果，家人和他的弟子都难以接受，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一向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父亲怎么会得如此要命的病！

虽然父亲80有余，已算高寿，可是他的学术生命还是那样充沛，他还在不断地创新创造……儿女和弟子们不忍心将病情实况告诉父母亲，只是说父亲年事已高，造血功能出了点问题，需要长期住院治疗。我们还对父亲封锁了一切有关白血病的信息，带给他看的报纸凡是有敏感内容的就扣留下来。2011年元月，媒体反复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教授获得2010国家最高科技奖，较详细地讲到了白血病。电视播到此时，陪护父亲的霄汉赶快转换了频道。

父亲初进医院时，医生毫不客气地指责了我一番：“你父亲这么消瘦，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你都没发现？你这个做女儿的太大意了。”医生嘱咐，父亲身边24小时都要有人。白细胞低会头晕、乏力；血小板少，万一昏厥摔倒，容易引起颅内或脏内出血。即使病重如此，父亲仍不愿麻烦他人。经反复强调身边不能离人的道理后，他才勉强答应由学生和家人轮班陪护。



既来之则安之，父亲将视为生命粮食的著书立言搬到了病房，看似安心地住下来接受治疗了。人民医院把父亲安排在高干病房，他积极配合治疗，每天量体温、吃药打针，每周抽血化验，观察血液的各项指标。2010年9月下旬，父亲颈部淋巴肿大，医生担心肿瘤细胞转移，安排父亲去同济医院做立体彩超，检查结果尚好；但到2011年5月，连续10多天注射提升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针剂却不见效果。输血也越来越频繁，且由输成分血到输全血。5月28日，父亲让医生停掉了所有针剂，他告诉我：这些针剂都很贵，打了也不见效，等于浪费。他寄希望于中药调理。6月1日晚，接近9点时我离开医院，父亲微微起身，笑着向我招招手，目送我关上病房门。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凌晨，手机响起，我预感到是不好的消息。果然，我离开医院不久，父亲就高烧不退。父亲学生宫步坦开车，我们及时赶到医院。见到我，父亲还说：“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我通宵守护在他身边，不停地为他擦汗、喂水、量体温。当时，父亲一定特别特别难受，住进医院近11个月，那晚他才第一次说：“这次我是真病啦！”

家人陪护照顾4天之后，父亲体温时高时低，肺部感染不见好转，不得不住进重症监护室。除简单的生活用品，父亲还带上了《唐诗宋词选》。我每天做好饭菜、果汁送到重症室窗口，通过视频告诉父亲，我全天待在他原来的病房里，有什么需要的或想和我说什么，随时让护士打电话。可是直到父亲离去，我期盼的电话一次也没有响起过。

自从了解父亲的病情后，知道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莫洪宪教授嘱咐陪护的学生，将与父亲聊天中有价值的谈话录音下来，以便整理出传记。父亲可能有所察觉，以各种理由反对。宫步坦还是将与父亲聊天的片段整理成了《马克昌先生的求学经历》准备发表，其中关于父亲本科期间外语学的是什么语种不清楚。那时候，父亲已经住进重症室。一次视频探望时我问起，父亲不仅不说，还一再强调不要宫步坦发那篇文章。直到父亲离去，我才从他的同学张泉林伯伯那里知道，他本科一外学的是英语，二外是日语。



在我独自守在病房的那些日子里，父亲的弟子们来探望他时，也会陪我说说话。曾聊起：不知道先生有什么遗愿。我想：我每天去探视父亲，他都有机会说却从来没说过什么。恐怕最放不下的还是他做不完的学问，还是武汉大学刑法学科的发展，还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最终，父亲还是走了，没有给家人留下只言片语，去了天国。

“父之美德儿之遗产”，我要特别感谢父亲，感谢他留给我们及子孙后代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7期）

作者系马克昌先生长女



齐民友：中国近代数学史会记得他

温才妃



齐民友(陈化供图)

把时间的指针拨向 2010 年，已经 80 岁高龄的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开始独自翻译共 1600 多页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三卷本)。他在电脑上认真仔细地翻译书稿，再反复核对，以确保公式准确无误，身边以一盏清茶相伴。

这本书几乎介绍了现代纯粹数学的所有领域，是齐民友在晚年时留给中国数学界一份重要的礼物。翻译数学名著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部分，而他的人生远不只有这些，在他身上闪耀的是一名数学家、教育家的光辉。

2021 年 8 月 8 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92 岁。惊闻他



的离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丘成桐，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大潜、陈恕行、洪家兴、田刚、方复全、文兰、张恭庆、张焕乔等纷纷发来吊唁，表达哀悼之忱。

敢念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的书

儿时的齐民友是父亲的“小跟班”，父亲是数学老师，父亲去哪个中学教书，他便去哪个中学上学。父亲在学界的好友，也便成了他的数学启蒙老师，其中与父亲熟识的四川大学教授余介石，特别关爱这个聪明的小孩，“有时候他写了一些东西会先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明白”。齐民友说。

有两件事，让齐民友印象深刻。有人用圆规直尺做三等分角，余介石据此攒了一本小书，写好后拿给齐民友看，书的内容不多，齐民友竟看懂了。也因此，齐民友知道了颇有名望的德国数学家克莱因。但是，克莱因所写初等几何三大不可能问题的书，由余介石翻译成中文推荐给齐民友，他却没能完全读懂。

余介石还推荐数学家龙利的《平面三角学》给齐民友读，这本英文书是父亲借来作为教学参考之用的，但内容难度大，因腿伤养病在家的齐民友只完成了前半本的题目。

这为齐民友播下了“不要怕负担过重”的种子。抱着不怕读难懂的经典著作的决心，他曾读过英国数学家哈代的《纯粹数学教程》。哈代是华罗庚的老师，也是罗素的挚交。给他印象深刻的是，哈代曾在书中引用罗素的名言“数学是这样一门学科，我们永远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也不知道它说的是否正确”。

“学数学关键在于兴趣，第一你热爱这门学科，第二你要敢念自己认为很了不起的书，不要怕困难。念不懂不是坏事，是好事。难读的书对于读者是一个刺激，让你有一种去克服它的愿望，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机遇。机遇是一颗种子，时机一到就会生根发芽。”回忆起从前经历，齐民友如是说。

在他的身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大二时，任课教师讲到有理数的



稠密性，齐民友脑子转得快，问到在有理区间 (a, b) 里有没有无理数？很快他自己就给出了一个例子 $a+(b-a)/\sqrt{2}$ 。但这个例子太特殊了，齐民友并不满意。

次年，他又读到英国数学家梯其玛希的《函数论》。“这本书更难，我也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从书中，他不但知道了无理数也是处处稠密的，还知道了德国数学家康托尔的对角线方法，知道了可数与不可数的差别，“心中非常欣喜！”

直到年逾八旬，齐民友读到了康托尔的原著，“我才认识到那颗种子现在生根发芽了，自己有了一种获得感。所以念不懂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武大校史上唯一的“数学家”校长

武大毕业后留校，齐民友不是没有机会去更好的平台发展。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丁夏畦曾问他是否愿意去北京发展。当时，丁夏畦跟着中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工作。

请示了武大后，校方回复，武大党员本来就不多，一个也不能走，齐民友听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下。

这一留，便驻扎在珞珈山一辈子。最初，他给华罗庚的助手孙本旺当助教，孙本旺调走后，他又“硬着头皮”接下了孙本旺的数学分析课，成为数学系教师。

1957年，丁夏畦写信告知他苏联专家比察捷要到北京来讲学，在这场可谓中国偏微分方程发源的会议上，齐民友接触了偏微分方程，从此便深耕于此。

20世纪50至60年代，齐民友在退化双曲型方程初值问题的适定性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研究了 Fuchs 型偏微分方程，提出 Fuchs 方程的指标和指标方程的概念，并给出其哥西问题的正确提法。20世纪80年代，他出版专著《线性偏微分算子引论》，成为偏微分方程研究方向的主要学术著作之一。

原以为此生与学术、教学为伍。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特殊年代，访学日本归国的齐民友被任命为武大副校长，没有任何行



政经验的他，秉承了学者治校的理念。1988—1992年，他担任武大校长，成为武大校史上唯一的“数学家”校长。

武大官方后来评价他“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多措并举，在加强基础理论人才培养的同时，通过试验班的形式培养人才，尝试通过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来培养研究生。在他任期内，武汉大学的各项指标不断攀升，各方面的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说来也奇怪，在我那个年代有不少数学家当校长，这可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数学不像工科需要做实验，写一些论文就能得到承认，因此学校比较重视。现在学科越来越多，很多学科发展得都很好，因此数学家担任校长也越来越少。”齐民友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幽默地解读。

而在学生的印象中，他的虚怀若谷之中还深藏远见。“齐校长强调数学离不开哲学，特别注重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与文、史、哲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融合互动，相辅相成。”武大哲学系毕业生、现为武汉科技大学教授的孙君恒深感佩服。齐民友之后，时任武大副校长的哲学家陶德麟接替他成为校长，似乎早有“伏笔”。

“不知道”比“知道”重要

2000年前后，齐民友应邀撰写《世纪之交话数学》。弟子刘伟安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有一天，他趁陪伴之际请教：“21世纪的数学会有些什么新的发展？推动这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可令刘伟安没有想到的是，齐民友回答说：“不知道。”

“我以为，推动21世纪数学发展的动力可能来源于化学和生物学，还可能来源于社会学。”刘伟安愣了一会儿，大胆地说。

“为什么？”齐民友问。

“这些学科中的量化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却没有得到普遍地精确解释。”刘伟安答。

“那物理学呢？”齐民友接着问。

“数学在物理学中已经得到充分的应用，难以有新的突破。”刘



伟安答。

齐民友听了后，说：“可能吧。”

过了一周，他再见到齐民友时，齐民友很认真地说：“我告诉你：推动 21 世纪数学发展的动力仍然是物理学！”并向他解释了原因。

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齐民友是有想法的，但是“我不说，因为说了无益”。

他曾说：“‘不知道’比‘知道’重要，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很多东西还不知道，你就会去探索、学习、研究。否则你就会故步自封，沉醉在自己‘知道’的井底里，不可能有进步。那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

在学生眼里，“不知道”还是对学生的信任和支持，是“放手”，是一种超脱。

可在为更多人解答“不知道”的问题上，齐民友从不含糊。1978 年起，齐民友和数学家王柔怀等人一起在我国组织了“拟微分算子和 Fourier 积分算子的研讨班”，被学术界称为“偏微分方程敢死队”，为填补我国当时在拟微分算子和傅里叶积分算子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谈论中国数学发展，不得不佩服齐校长的见解。他和王柔怀等教授组织的关于拟微分算子及傅立叶积分算子的讨论班，带领中国调和分析和线性微分算子的研究现代化，功不可没。中国近代数学史会记得他的。”丘成桐说。

晚年寄情数学著作翻译

“没有现代数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注定是要衰落的。”作为我国最早关注数学与人类文化关系的数学家之一，齐民友在 1991 年出版的专著《数学与文化》中如是说。

1989 年，忙于行政工作的他，决定给武大哲学系学生讲一讲数学，备课中他撰写了《数学与文化》，主要讲非欧几何是怎样产生的。该书后经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从他儿时起，就有很多数学家都在从事翻译工作。如交通大学教授朱公瑾翻译美籍德国数学家库朗的《微积分》，武汉大学教授萧君绛翻译了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的名著《近世代数学》。后者用古文翻译，“翻译得非常有文采，我一直记得其中有一句话，称一切集合的集合为‘在所宜警’。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素悖论”。

20 世纪 80 年代，齐民友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数学分析八讲》《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哲学》等优秀作品。让他印象颇深的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外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哲学》。该书的翻译难度大，齐民友一边翻译一边赞叹，“像这种有深邃哲学思想的大学者，康托尔算是一个，外尔也算是一个，中国就很难产生这种类型的数学家”。外尔是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学生，两人曾因为数学看法闹矛盾，争论数学到底是以逻辑还是以直觉为主。

及至 2010 年，已是“80 后”的齐民友仍然笔耕不辍，他翻译的《普林斯顿数学指南》（三卷本）是由菲尔兹奖得主 T. Gowers 主编，133 位著名数学家参与撰写的大型文集，全书由 288 篇长篇论文和短篇条目构成，介绍了数学的概貌，特别是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纯粹数学的发展。

齐民友的首位博士生、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原院长陈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套书多达 1600 多页，几乎介绍了现代纯粹数学的所有领域。齐先生花费 4 年多时间，独自一人承担翻译工作，如此之大的工作量让我们这些后辈们哪怕是想想都望而生畏。他希望，让国内数学家、特别是青年数学家多了解 20 世纪开始的时候数学家为之拼搏的思想是什么，并且吸引更多的有志者投身到现代数学研究和应用中去”。

深感时日不多的齐民友不愿意浪费一寸光阴，年过九旬，依然在重读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兴致盎然地学习量子纠缠、多宇宙模型等最新科学进展，思考其中的数学问题；还应邀翻译康托的名著，每天坐在电脑前工作好几个小时。



齐民友和夫人程少兰(陈化供图)

2021年8月8日晚间，噩耗传来之际，镌刻在弟子王桥内心深处的第一画面变成了一段回旋在耳畔的音乐。那是1992年，齐民友和弟子们谈古典音乐。他说，百年之后，希望他们在自己的灵堂前不要播放哀乐，而是播放一曲肖邦的E大调钢琴练习曲。

“只有深爱肖邦的人，才会深爱那首曲子，那是肖邦的‘离别’，是肖邦的‘我的祖国’。”王桥说，“齐先生毕生爱数学、爱教育、爱弟子。他内心饱含的是我们得用毕生才可能读懂的、最深沉的爱。”

(原载《中国科学报》2021年8月11日，题目有改动)



我的导师刘纲纪

王海龙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人以德，为学以诚。有师刘氏，概莫如是。

刘纲纪先生是武大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能够在他的门下求学，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压力。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我大一刚来武大的开学典礼上。先生作为教师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头发虽然灰白却浓密而有韧劲，大背头式的发型配以睿智的眼神、瘦削的面庞，看起来颇有几许仙风道骨的气象。认识先生的人，都为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与渊博的才识所折服；而在先生门下求学的人，更知道先生不但为学精湛，为人更是高而不冷，和而不群，风雅而又赤诚，遇事非但不严责于人，还经常会鼓励、夸奖学生。这一点，美学专业的同学都有很深的体会。作为先生的弟子，我每周会去他家里送书信，因此得以经常当面聆听先生教诲，实是荣幸之至。每次与先生交流之后，我都会对先生的为人、为学有更丰富及更深刻的体认。

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创造的作品”。因此，他经常嘱咐我们要用心对待自己的人生，要热爱生活。这种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谈人生的方式，既发人深省又不落俗套，让大家能够摆脱现实利欲的羁绊，以严肃的态度去创造自己的人生。然而人生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如书法这般一蹴而就的艺术，也有起承转合、点撇捺钩等停顿、曲折的存在。先生的教诲，正是引导我们以一种超功利的态度去全面审视自己的生活，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从而避免使人生堕入呆滞、空虚和无聊之中。

回顾先生过往的 83 载春秋，在时代浪潮的跌宕起伏中，先生有过高光的闪耀，也捱过难堪的灰暗，然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坦然豁达，却也成就了先生独特传奇的人生。尽管早年饱经风霜，先生却很少在我们面前谈及曾遭受的苦难，即使提起，也都是轻描淡写，寥寥数语就带过去了，反而津津乐道于那些苦中作乐的时光。记得先生经常提起他过去下放到农村放鸭子的故事。他不但无怨愤，反倒感恩于当地群众的善良，因为在先生看来，比起下放的其他人，放鸭子已经算是一种优待了。而且，于先生而言，放鸭子有着诸多好处，比如差事比较轻松，看鸭子戏水很是惬意，还可以在旁边写生，甚至还有很多闲暇时间可以读书等，不一而足。言辞中充满了戏谑和怀念，却听不出有丝毫的不快甚至愤懑。谈到画鸭子时，先生还会拿来他当年写生的画册让我们看，画得栩栩如生，很有味道。还记得当时大家争着看画册，先生就在旁边指点说：这个是什么时候画的，画的是鸭子的什么动作、形态，末了来一句：我对鸭子的了解那可是专家了，不比那些厨师差！听完这话大家都开怀大笑，感怀于先生的安贫乐道、达观进取。尤其是每当先生谈到兴处，就会手舞足蹈，语气也不自觉地逐渐加大，红光满面，眼角带笑，那神态模样可爱极了。

先生的乐天知命不仅是对己而言，对其他人也是如此。还记得 2015 年春节前，因为置办年货、招待宾客等过于操劳，身心疲惫之下，师母突然感染了带状疱疹病毒，整个腰围密布疱疹，疼得师母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晚上甚至要依靠安眠药和止痛药才能睡上一会儿。恰逢我在学校帮先生处理一些事务，就和一位师兄一起陪师母去国医堂找一位老中医看病。医生说这是慢性病，需要用中药慢慢调理才能康复。针灸完开完药回来，师母难耐痛楚、忧心忡忡地跟先生抱怨说她现在生不如死，也不知道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痊愈，等待的过程太过于煎熬。师母的焦虑我们都看在眼里，却只能在一旁干着急，很想安慰师母两句，却不知道如何说起。反倒是先生耐心听完师母的倾诉，跟师母摆摆手说，要相信医生，也要对自己有信心，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不都挺过来了吗，



还怕这点病痛？然后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做人一定要乐观，要相信前途是光明的，哪怕遭受了挫折，也不要怕，这些都是暂时的，只要有信心有勇气，坚持下去，就会收获好的结果。说完，他又记起我当时正面临情感问题的困扰，点上一支烟，继续跟我说，乐观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就在我们的为人处世中。你情感上不顺遂，这是青年时期很正常的现象，要勇于接受、及时调节，但不可太过沉溺于其中。毕竟，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事业有成了，还担心找不到对象甚至过不好日子？先生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茅塞顿开，明确了自己当下的目标和任务。庆幸之余，不觉为自己的脆弱和短见而羞愧。

先生好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每次会面，先生都会先点上一支烟，然后才开始进入正式的谈话。不过我观察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先生每次点烟都很讲究，甚至可以说先生的点烟动作相当优雅。每次点烟时，先生都会先用手指转动着香烟，又捻又捋，然后把火机打开，凑到烟头那里，在堪堪挨到烟头的地方，用顶部的火焰去灼烤，等烧着了，就会关掉火机，然后向外甩一下，就像用火柴点烟后的动作那样，整个动作非常潇洒、流畅，极有风范。每次看到先生这个动作，我心中就会默念一句流行语——“优雅是一种态度”。能够将艺术的态度完美地融入生活，我想先生大概是个中翘楚吧。

接触越久，我就越发觉得先生不仅是一位极具艺术气质的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关心时事、严谨务实的卫道士。“卫道士”这个词，在近现代的衍化中，已逐渐沦为了一个贬义词，这让我很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真正有信仰、坚守正道并传播正能量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卫道士，而先生堪称其中典范。先生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继承和发扬，都是发自内心的、最为真挚纯粹的追求，是我们后辈所要努力学习的榜样。而先生之所以入党，却是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在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后，为了理想而加入的。先生曾说过，他年少时曾亲眼目睹几个国民党士兵在一间茶馆胡吃海喝后不付钱就扬长而去。他问茶馆老板为什么不向他们要钱，茶馆老板不但不回答，反而反



问先生：你敢去要吗？末了还数落先生太年轻，不懂这个世道。先生一直对此颇为感慨。时至贵州解放初期，在对当地土豪劣绅的审判大会上，解放军历数这些人的罪状，且在老百姓的群情激奋和大力支持下，予以惩处并按照条例有理有序地分配田产等。这种鲜明的反差，让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积极申请入党的一大动力。

先生常说：“没有脱离政治的学术。”做学术一定要关心政治，为国家和社会的事业发展服务。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经有一次，有几家期刊、报纸同时向先生约稿，但先生只选择了其中一家，即《人民日报》。问及缘由，先生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日报》是我党的机关报，为党报写文章是我的义务，也是我能为党和国家做出的一点贡献。”听完先生的话我不禁为之动容，感佩于先生的忠诚与担当，让同样作为党员的我，羞愧之余，也心生对未来报效祖国的期待。

然而，学术毕竟不同于政治，要想做好学术，除了坚持正确的政治信仰外，还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这方面，先生是我们后辈的榜样。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传统经典、西方经典都相当熟悉，并且不止一次强调，当今学界治学，只有打通了中西马，才能做出真正的学问。因此，先生为我们列出的必读书目，基本上都是中西马的经典著作。做学问做到先生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高的境界了。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然而先生这本书却格外厚实，内里丰富而又深刻、隽永，耐人寻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还在孜孜不倦地拓展这本书的广度和深度。先生虽已 83 岁高龄，却仍满含着对美学的赤诚和对理想的执着，一直坚持伏案撰写七卷本的《中国美学史》。很难想象，一位耄耋老人，在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以异于常人的顽强意志力，每天工作到深夜，而且因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文字都是用笔一笔一画写下来的，甚至光为了写全书的绪论部分，笔记就已经做了 30 多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所付出的精神劳动，势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扬，对重建本土文化的自信，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部巨著，



是先生留给后世的一大精神财产，必将成为中国美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有师如此，何其幸哉。

先生人生这本书未完待续，万分期待接下来的精彩。

（此文完成于 2016 年，原载《武汉大学报》2020 年 10 月 30 日）

作者系哲学系 2007 级校友



一位纯粹、可敬的学者：缅怀朱雷老师

刘进宝

2021年8月10日凌晨1:40，朱雷老师在武汉去世，享年85岁。早上得到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敢相信，敬爱的朱老师真的走了。

—

近年来，虽然朱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也曾几次住院治疗，但朱老师非常坚强，又得到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每次都挺了过来。

2020年年初疫情暴发后，我一直很担心朱老师，也多次与朱老师和师母电话联系，感觉朱老师各方面还可以。

2020年下半年，朱老师再次因脑中风住院，朱老师生病住院后，我一直想去武汉看望，但因各种事情干扰久未成行。10月我做好了赴武汉的准备，给师母打电话，师母说，最近朱老师比较平稳，她要去新疆办理朱老师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手续，如果她不在武汉的话，我无法进到医院，只好放弃了。

2020年11月，由于一个机缘，我和夫人赴武汉看望朱老师。11月26日上午，我和夫人，还有师兄刘礼堂、师妹张宇到医院后，看到朱老师虽然说话比较困难，但精神还可以，床头柜上放着荣新江兄刚赠送的《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我就问，您现在还能看书吗？他说可以看一点。由于疫情期间医院的规定，我们不能在医院待过长时间，再加上朱老师的身体状况，也无法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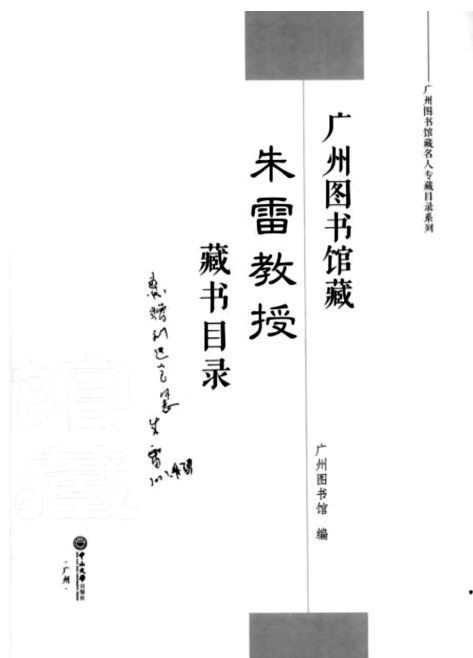


行更多交谈。当天晚上，将朱老师接出来，与刘礼堂、刘玉堂、徐少华、魏斌、吴成国、马志立、邢勇等一起陪朱老师吃饭、聊天。

今年春节后，朱老师入住汉口的一家疗养院，相对而言条件好多了。2021年4月有机会去武汉时，我与师母联系提前向疗养院备案。4月23日下午，我携夫人与师母、马志立一起到疗养院看望朱老师。去疗养院前，在朱老师家里拿到了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0余万字的《广州图书馆藏朱雷教授藏书目录》，到医院后，朱老师还在上面签名“惠赠刘进宝同志。朱雷，2021.4.23”。虽然朱老师由于脑中风写字很困难，尤其是第一个“惠”字几乎难以辨认，但后面的字还是比较流畅。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可以说是既心酸又欣慰。



2021年4月23日，本文作者到疗养院看望朱雷老师



朱雷教授晚年将自己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了广州图书馆。图为朱雷教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图书馆藏朱雷教授藏书目录》上为本文作者签名留念

在聊天中，朱老师念念不忘的还是唐长孺先生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说到参加文书整理的各位学者时，提到“邵怀民同志负责全书的清抄”。我没有听说过邵怀民先生，就专门向朱老师请教，朱老师说：“邵怀民是银行退休职工，毛笔字好，其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邵循正教授。”参加短期整理工作的还有陈建放，我也不知道，朱老师告诉我：陈建放是上海的工人。

7月18日，武汉大学举行“纪念唐长孺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我和孙继民学兄提前联系，计划去疗养院看望朱老师。17日到达武汉后，就和师母约好晚上到家里面商。晚饭后我们到朱老师家，师母说：朱老师听说许多学者要来，他也想与大家见面，已经约好明天早上去汉口接朱老师，八点半到学院。



18日上午，朱老师到了学院会议室，他一直坚持听会。会议结束后，还与大家一起聚餐，直到晚上八点半才离开。我送朱老师下楼时，还下着雨。当时就想，这样的天气，武昌到汉口大约要一小时，朱老师从早上七点多出门，回去就晚上九点多了，对于一个80多岁并一直生病住院的老人来说，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啊！

二

朱雷老师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一生最可称道的工作是对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1973年秋，为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朱老师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彭神保一起赴西北地区搜集考古资料，在看到新疆博物馆展厅里的吐鲁番文书时，立即将在新疆的见闻写信向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的唐长孺先生作了汇报。唐先生学术眼光极其敏锐，马上意识到吐鲁番文书蕴含的巨大学术价值，就向国家文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桥作了汇报，同时让朱老师等赶到北京，详细说明相关情况。1974年元月中旬，朱老师等到北京向唐先生作了汇报，并见到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王冶秋决定在国家文物局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唐先生任组长，由新疆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经费，开展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唐先生在1990年12月所写《吐鲁番出土文书》编后记中说：“《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全十册至今已全部出齐。它收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地二〇三座墓葬中出土的由前凉升平十一年（三六七年）到唐大历四年（七六九年）的一千八百余件文书。”“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冶秋同志的热心组织和大力支持，这项工作是根本不可能开展的。”

由于要全身心地投入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从1974年至1986年春，朱老师由武汉大学借调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组长为唐长孺教授）主要成员，并作为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在新疆、北京等地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其中的艰辛，外人很难想象。1975年4月底，朱老师



随唐先生赴新疆，陪唐先生在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发现文书的古墓。在南疆的库车考察时，由于“机耕道”的路况非常差，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唐先生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不得已，唐先生只得返回北京诊治，朱老师则留在新疆，在吐鲁番地区文保所进行文书的清理、拼合和抄录。有了这次意外，认识到在新疆整理文书的确有许多不便，王冶秋局长专门给国务院写了报告，经李先念和邓小平两位副总理批示和圈阅，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就转至北京继续进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整理组因避地震入驻故宫武英殿，随后又转至上海继续工作，直到年底才返京。在北京整理文书时，唐先生的“晚饭都是由朱老师亲自烧菜并加以安排的”。因为文书整理研究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朱老师8次胃出血。



朱雷老师与唐长孺先生合影，1983年摄于东京

朱老师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具



体来说，1981—1991 年出版的 10 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释文本中，朱老师独编了第 6、7、8 三册，参编了六册，即第 1—5 册和第 9 册。随后出版的图文本（1—4 册），是在已出释文本全 10 册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加上原件照相图版，整理编辑而成，朱老师承担了主要的修订工作。1974—1986 年，朱老师从 37 岁到 49 岁，可以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在这十多年里，朱老师抛家舍子，跟随唐先生赴新疆、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偶尔回家，两个孩子都不认识他了，还偷偷地问妈妈：这个人怎么还不走？还要住在我们家？

吐鲁番出土文书主要是 1959—1975 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吐鲁番发现的，由新疆博物馆保存。1975 年后，新疆博物馆又陆续搜集了部分吐鲁番文书，主要是 20 世纪新挖 4 个墓葬的出土文书。还有 20 世纪 70 年代未带到北京整理的断纸残片，非常零碎，整理拼接难度很大。由于朱老师从头到尾参加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又长期从事相关研究，与新疆同仁关系密切，所以新疆博物馆仍然希望由朱老师来负责整理这批文书。本来朱老师身体不好，退休后应安度晚年，但他却将学术视为生命，毅然答应下来，于 2010 年赴新疆开展工作。凭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朱老师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2010 年朱雷在交河故城留影



毕竟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朱老师每年去新疆都需要师母陪同和照顾。考虑到这批文书残缺较多，整理费时，新疆博物馆经费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所有费用，朱老师因退休了，也没有其他经费来源，没办法，2017年80岁时，他又以新疆博物馆的名义申请承担了《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不顾年老体弱和身体有病，每年都去新疆工作四五个月。2020年住院后，还让师母去新疆做最后的结项工作。今年还一直关心、安排《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的出版工作。7月初，出版社的领导到医院签订了出版合同，朱老师才放心了。遗憾的是，现在，书还没有出版，朱老师却已经离开了。

朱老师长期从事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又有亲炙唐先生教泽的优势，使他在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方面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我在帮朱老师编辑相关论文集时，觉得它们真正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有机结合的典范。他的论文都是以小见大，既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体现出极强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为同行所认同和折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言及唐门弟子对唐先生治学的承传问题，称唐先生治学主要涉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三大领域，“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是高敏，继承唐史的是张泽咸，继承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是朱雷”。王素先生在为朱老师《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写的书评中说：“朱教授的很多论文，尽管经过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学术价值还是难以超越……学界师友常言：唐长孺先生门下，论文风格与唐先生最为接近者，莫过于朱雷教授。读罢本书，深信此言非虚。”

三

朱老师是一位非常单纯的学者。

经历过历史的风风雨雨后，各单位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事纠



纷或矛盾，有的老师也曾在我面前埋怨过朱老师，但朱老师在我面前却从来没有说过别人的不是。当我们聊天说到某单位或某位学者的研究有不足时，朱老师马上说，不能这样看，人家也是做出了成绩的。

朱老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延伸开来，对自己亲近的人和学生要求很严。曾经有人问朱老师：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谈到做研究都会感叹没有钱，您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缺钱吗？朱老师回答说：“我还没有觉得缺钱，我这一屋子全是常用书，还有好多放在地下室，基本够用了。”“以前没有钱，家人开玩笑，说我们做研究，一张纸，一支笔，一支烟，一杯茶就可以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富了，关心知识分子，工资给的多些，还给一些科研经费。我们现在是投入多产出少，如今出的书谁看啊，一般都堆在图书馆，刚出版就可在旧书店买到减价新书。像我的老师唐长孺先生，像陈寅恪先生，抗日战争时期多困难啊，经费很少，还不是作出了成果。我觉得有钱好，生活安定一些。但过分强调缺钱，发牢骚，不好。”

朱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朱老师曾长期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又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还是武汉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带头人，当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手上掌握着“211”“985”科研经费，但他从未为自己谋过任何利益，也没有申请学校和唐研究基金会的经费出版个人的学术论著。他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基本上都是我经手的，他不仅没有申请任何出版经费，连给学界师友赠书，都是自己掏钱购买的。

2000年，朱老师到敦煌参加学术研讨会后，又赴天津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又到北京请启功先生为《唐长孺文集》题签。回到武汉后，才发现从兰州到天津的车票找不到了，我就问朱老师如何处理，朱老师说，那这次外出的开支就不报销了。



朱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治学、为人的精神永存！他永远是我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 年 8 月 20 日，图片有删减）

作者系历史系 1998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恩师已去 风范长存

——写在林天宝教授去世一周年之际

陈国庆

敬爱的林天宝恩师已逝世一周年了。

跟随记忆回到2020年的6月17日，得知恩师因病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金沙江白鹤滩电站出差途中，加上当时的疫情管控，无法及时赶回学校送恩师最后一程，留下终生遗憾。得知噩耗的那些天，恩师慈祥的面容和谆谆教诲常常浮现在眼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异常悲痛，久久不能平复——照耀我人生旅途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回忆中，恩师的形象在脑海中更加鲜明生动了，我难以忘怀恩师诲人不倦的精神。林老师将一腔热血奉献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本科学习期间，我印象最深的一门课程便是恩师讲授的“电力系统稳态分析”。他不仅课讲得生动有趣、逻辑严谨，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堪称艺术品。他教授的课，不只是在传播知识，更是培养我们对于学术严谨认真的态度。在他的影响下，我的学习笔记和作业也变得愈加认真和工整，还多次得到恩师的表扬，并作为范本激励其他同学。我个人也从中受到了更多的鼓舞和鞭策。坚持不懈和不断提升，成为了我的工作习惯，并受益终生。

难以忘怀恩师春晖寸草的慈爱。林老师是一位让每位学生都感到亲切的良师。他记忆力惊人，记得恩师任学校教务处长时，有一次临时代替其他老师给我们班上了一堂计算机上机实验课，第二次上课时他竟然差不多能叫出我们班所有同学的名字，同学们都惊呆了。



了，好生佩服，并由此对老师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学业上更是备受鼓舞。在这样的氛围下，学生们没有一个不认真学习的。大学毕业后，我踏入社会并逐步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始终以林老师为榜样，用心记住我接触过的每一位员工的名字和特点，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和鼓励，与同事们建立了非常和谐的关系，营造了很好的企业工作氛围和团队精神。

难以忘怀恩师学术造诣的广博与精深。林老师是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问的学者，曾公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具有宽广的国际学术视野。他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曾担任过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副校长兼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校长，长期担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电机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长江技术经济学会理事、湖北省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等职务。林老在电气工程学科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编著了《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分析》《电力系统概论》等多本经典权威教材，发表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培养的学生很多都成为了学术界和电力行业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我国电力事业发展和电气工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难以忘怀恩师高瞻远瞩的视野格局。作为学校领导的他对学术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极具战略眼光和国际化视野。一位武大老师曾给我讲过，林老师在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校区校长时，十分重视学校的学科发展和国际交流。他不仅要求老师们加强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专业交流，还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安排很多年轻老师去法国短期或长期学习；同时，充分发挥宜昌校区临近葛洲坝电站的优势，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学校交流学习和工程实习。能让一大批发达国家的电气、信息专业的学生到中国高校实验室进行交流学习，这种事在现在都不算普遍，更何况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大大促进了年轻教师的快速成长，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学科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升。

难以忘怀恩师为人师表的风范。林老师严谨治学的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以及谦逊儒雅的处世态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鞭策着我。记得在校学习期间，林老师曾严肃地告诫我们，工科学生，未来将从事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一定要做到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点小差错都可能酿成重大事故。离开学校 35 年了，我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始终保持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的作风，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工作哲学和行为习惯。回顾自己毕业后 35 年的工作经历，无论是在葛洲坝电厂从事技术工作，还是转入三峡电厂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到后来领导筹建溪洛渡、向家坝两座大型水电工程的电站运行，再后来走上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岗位，直至现在担任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始终做到了爱岗敬业、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勇于担当，为国家水电事业不断进步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恩师孜孜不倦的教诲和厚德载物的品质是我终生学习的宝贵财富，它指引着我笃定前行、行稳致远。

恩师的一生，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无限忠诚的一生。作为他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利用所学兢兢业业、努力奋斗，为国家 and 人民多做贡献，就是对他最好的铭记和怀念。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恩师求知若渴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风范，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

高山苍苍，河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82 级校友



我的恩师鄂栋臣

程 晓

我的恩师鄂栋臣教授，1939 年出生于江西省广丰县，是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曾 11 次到访南北极，是中国著名的极地测绘与遥感信息科学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

我于 1994 年考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入学时被鄂老师的一场精彩南极考察报告所深深吸引，自此下定决心从事极地研究。1998 年免试研究生辗转 3 次更换导师方偿所愿投奔鄂老师门下，其间于 1999 年年底被派出参加中国第 16 次南极科学考察，直至 2001 年年初硕士毕业离开学校。

跟随鄂老师时间虽不足三年，但所受教诲和帮助对我的影响则是终身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离开武汉大学后，我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从事极地研究，又多次赴南北极开展科学考察，成长为一名极地科研工作者。这里，我想用亲身经历和接触的几个简单事例刻画一下我的老师鄂栋臣的高尚人品及我的感受。

1984 年年底，鄂老师跟随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进入西南极乔治王岛地区，同很多前辈一起用很短的时间建立起了我国在南极的第一个科考站——长城站。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其中的艰辛以及对于测绘人的压力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测绘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测绘人是先行者，很多决策需要测绘给出准确的空间地理信息，



在建设过程中测绘同样不可或缺。鄂老师作为测绘班班长，除了能够爬冰卧雪吃尽苦头以外，更要有超强的测绘科技能力。那时候没有现在先进的 GPS 设备，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测绘设备，例如，需要靠天文观测设备确定方位，靠两条腿去跑水准，靠简陋的小平板做大比例尺测图等。

他是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长城湾的命名者，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长城站地形图的测定者，也是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和北极黄河站创建的亲历者。他在地球南北两极探索出的极地测绘之路和获得极地研究的丰硕成果，都属中国极地测绘事业的伟大首创。

如果说长城站首测存在机遇的因素，鄂老师在极地测绘中不断创新的精神却是任何人都无法侧目的。

南极条件艰苦异常，很多常规手段无法实施。这里举两个小的例子，可充分展现鄂老师的不断创新精神。

一是极地直升机小像幅航摄方法。我国无法花巨资在中山站地区实现常规航摄成图，然而中山站建设和各学科进行科学考察需要所在拉斯曼丘陵地区的大范围地图，且拉斯曼丘陵地区地形地貌非常复杂，不可能采用地面实测方式完成。为此，老师创造性地提出利用直升机作为升空平台，采用普通 120 相机小像幅航摄方法，克服南极地面环境布标的极端困难。经过三年的艰苦试验，老师带领课题组终于于 1993 年成功探索出南极露岩区小像幅航测成图技术，绘制了各学科考察急需的拉斯曼丘陵地形图，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经费。

而在此之后，直到 2014 年 12 月，我在北师大的团队才成功使用无人机航摄技术实现对拉斯曼丘陵地形图的精准测绘，而这个工作完全得益于老师 20 年前的开创性思维。

二是开创南极 INSAR 技术应用。1998 年，我刚读研究生时，就听鄂老师提及 INSAR（即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技术）在极地的应用，当时找的是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从荷兰 ITC 回来的周月琴副教授。那时 INSAR 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极地更是没有几年。老师就鼓励我们向周老师学习 INSAR 技术，



并且从课题费里花数万元从欧洲买回了覆盖南极格罗夫山地区一个 INSAR 对像进行实验。利用这幅图像，我和周春霞博士建立了格罗夫山地区冰川流向模型，成功提取了蓝冰和冰裂缝分布信息。现在，INSAR 已经成为极地和青藏高原冰川学研究最重要的技术之一，而 20 年前鄂老师独具慧眼地在中国极地测绘研究中引入这一新技术，凸显了他的高瞻远瞩。之后很多年，我都在钻研 INSAR 技术在极地的应用，这与他当年将我引进 INSAR 之门是密不可分的。

很多年以来，中国南极科学考察主要活动区域的地形图都是在鄂老师的领导设计下克服艰难险阻完成的。1999 年，鄂老师派出彭文均和丁士俊两名队员进入被称为“地狱之门”的南极格罗夫山，冒着掉进纵横冰裂缝的危险，实地测定了 14000 个 GPS 点，绘制出国际上第一份 1:25000 人工测定的南极格罗夫山地区精确地图。2004 年年底，老师又派出了张胜凯进入冰穹 A 地区，寻找南极冰盖最高点并测绘了大范围精密冰面地形图，这为昆仑站建站奠定了重要数据基础。

鄂老师早年开创了我国极地测绘，之后多年担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为党的建设和学校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鄂老师是个非常自律的人，在从政期间几乎没有招收过研究生，他的绝大多数研究生是在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招收培养的。1999 年他退休时已经 60 岁，当时仅有王清华、周春霞和我 3 名研究生，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也仅有很小的实验室和办公空间。老师本可以安度晚年，却没想到他继续坚守教师岗位，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极地测绘人才培养和科研中，直到 2013 年 74 岁才退休。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也在他呕心沥血的带领下迎来了大的发展，推动了我国极地测绘事业的重大进步。

2001 年，当时我已经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一次，老师去北京参加国家测绘局的会议，会议结束去机场前专程来遥感所看我。我带他参观了我学习所在的中国科学院遥感信息科学重点实验室。鄂老师看到实验室陈列的一些雷达遥感方面的书籍，表现出了极大兴趣，提出可否带一套回去给南极中



心的师生学习。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我看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勤勉好学的高尚精神。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鄂老师坚持每年几次出国参加极地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经常带着不同的研究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国际极地科学研究的最前沿，从而快速成长。鄂老师还坚持在国内主办极地测绘相关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国际著名专家学者参与，一方面可以了解国际最新前沿；另一方面则很好地推广了我国极地科学家所研究的成果，提升了我国极地测绘工作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鄂老师对待学生非常仁厚，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尊重学生的选择并给予最大的支持。

2000年我从南极回来后一开始的计划是硕博连读且留在学校在职攻读。老师为我的事情找了很多人的，就在我打算办留校手续时，又得到了去北京攻读遥感专业博士学位的机会，加上家属在北京工作，于是我跟鄂老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师二话没说就表示支持，并帮我写了攻读博士的推荐信，这也基本上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规划。

几十年来，鄂老师因走南闯北积劳成疾，2014年惊闻他患上癌症，心中无比难过。我去医院看望化疗之前的老师，当时他已十分瘦弱，脸色也不是太好，但老人家谈笑风生，完全不像位重疾在身的病人。鄂老师乐观向上、愈战愈勇的精气神让我钦佩不已，他永不言退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系信息学部(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1994级校友



我所认识的张俐娜院士

珈 言

2016年10月15日，因为要举办首届武汉大学校友集体婚礼，需要请一对德高望重的校友伉俪到现场为新人送祝福，大家首先想到了杜予民、张俐娜夫妇，他们既是日常生活中携手共进、互帮互助的平凡美满夫妻，又是战斗在科研第一线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科学家。单位把联系他们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心里很是忐忑，毕竟我与他们并不熟，尽管作为老武大人，他们夫妻俩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但之前并未与他们打过交道，也不知工作和教学任务繁忙的他们是否愿意抽时间参加？

没想到，还没有等我把准备了半天的游说词说出口，张院士就爽快地答应了，说一定支持我们的工作，一定来参加集体婚礼并应邀讲话。我问是否需要预先准备发言稿时，她很干脆地说：不用。

没想到一切这么顺利。

在举行集体婚礼的前一天，我们请他们夫妻俩到行政大楼前拍摄了一组宣传用的镜头，他们认真地听从拍摄者的指挥调度，按要求变换着不同角度，没有任何不耐。由于拍摄者的精益求精，花了大半天时间、重复了无数遍才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让这次集体婚礼更好地展现武大风采，他们夫妇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尽全力配合着我们。

10月15日早上7点多，我就等在了他们居住的楼下，因15日刚好是新建院士楼点房时间，于是我陪着他们先去点房现场。学校两院院士加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待遇与院士等同）共20多



位，他们在简单地讨论了房子的朝向、层次、是否相对安静等因素之后，只用了很少的时间就选定了房子。拿到钥匙后，我们立即去参观了那套 250 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学校想得周全，装修都到位了，只用自己添置家具和电器就可以入住。张老师很是开心：以后再也不用爬那艰难的六层楼了。尽管之前他们住的也是学校最好、最大的房子，却因没有电梯且他们还住在顶层，上下楼很是困难，毕竟他们都已是 70 多岁的年纪了。

院士楼的修建，是学校以实际行动向这些为学校、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教授们的致敬！

张老师仔细观看着每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如战场上的将军般指点着“江山”：这间房怎么用，哪间房当书房等，杜老师则在旁静静听着，不时点着头。我觉得他们的日常生活模式应该就是：一位是指挥者，一位是执行者，配合默契。

那天的张老师应该是特别准备了一番的，尽管她在任何场合展现给大家的都是知性、优雅、端庄、大气的形象，但那天的她为了与婚礼的喜庆氛围相配合，特意穿了一件红色上衣，还化了很适合的妆。我仔细看了之后给她提意见：遮瑕膏和腮红浓了些，看起来有点不自然。

“在台上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就自然了，否则会显得脸色很暗淡。”原来如此！没想到她对这些生活细节也如此精通，如她所做的科研般。难怪她在任何场合出现都是最得体的、容光焕发的，且永远是最亮眼的那一个。她是中国院士里最靓丽、最耀眼的存在！

不禁暗自感叹：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吧，有的人能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他人的几辈子，就像张老师，在科研领域她有自己独到的发现和创造，为人类更美好的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高山仰止；在日常生活中，她又是一位处处注重细节、能时时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的优雅女性，能将女性的魅力展现到极致。

张老师的美丽、优雅，颠覆了我对女科学家的传统认知。在我的印象中，做科研的女性，大多会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怎么还可能舍得将宝贵的时间用在穿着打扮上？注重了穿着打扮又怎么可能在科研上取得好成绩？



2016年10月15日，张院士与杜予民教授伉俪在
校友集体婚礼上作为特邀嘉宾发言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我们女生留个长发都会被老师批评，且一定会被逼着将头发剪得如男孩子般短，理由是：你要想成绩好就不要臭美、不要留长发。张老师却以她的知性优雅及注重生活中细节的美，让我对女科学家有了全新的认知。

点好房子并参观完毕后，我们立即赶往九一二广场。按事先安排，他们上台讲话的时间是10:30左右。

张老师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总有忙不完的各种事务。参加完集体婚礼已近12点，晚上7点张老师还要赶去北京开会。70多岁的她过着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却看不出任何疲倦感。她一直都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和她在一起，



你从不会想到她已是 70 多岁的老人。

婚礼过去一个多月后，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张老师的电话，都没允许我问候，连珠炮似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小陈，你怎么回事，婚礼的照片怎么还没发给我，当时我那么支持你们的工作……”我一下就懵了：不应该啊，记得婚礼结束之后我就将照片传给她的秘书了，难道秘书没有转给她？看了与秘书的聊天记录后赶紧打电话，秘书说收到传去的照片后立即转给了张老师。应该是张老师每天的事情太多当时没有及时看，现在一下又想起这件事了。

……

一直不相信张老师离开了我们，她总是精力充沛，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她那中气十足、铿锵有力、节奏快速的话语仍在耳边回响。

我相信，她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她的精气神会永远留在她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武大校园，与那些逝去的大师一样化成了珞珈山的一部分，与珞珈山同在，永远守护着后进学者，守护着滚滚向前的“武大后浪”。

“听说张俐娜院士去世了，他们夫妻俩以前经常到我这来做头发的。她是我见过的最有气质的人。”给我做头发的 Z 师傅说。

“她也是我见过的最有气质、最有风度的女院士，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你这个店就开在她家对面，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为了节省时间，她当然会来你这了。她平时工作那么多、那么忙，来你这是最佳选择。”我轻声回答着。张俐娜院士那永远不知疲倦、永远神采奕奕的身影又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作者系中文系 1983 级校友



忘不了倒在讲台旁的老师

文新国

这是发生在 28 年前的事。

1985 年，我就读于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

全班 24 人，除我以外，他们都是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如创作小说《小镇上的将军》的陈世旭、创作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的李延国、创作诗歌《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熊召政、创作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水运宪、创作电影《苗苗》的严婷婷……

正是这样一班人，使得来授课的老师都非常“慎重”。

11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是古典文学讲座。讲师是付生文，年近 40 岁。他为给我们授课，早就作了充分的准备。课题是《论韦庄》，这是付老师当年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来听课的除了作家班的人以外，还有许多不同年级的同学。人很多，授课点是一个阶梯形的大教室。我们班坐在前几排，人来得很准时，也很整齐。我们各自有选修课，像这样全班聚在一起听课的情况很少见。

上课铃声一响，付老师就出现在讲台上了。其实，他早就等候在讲台边。

付老师中等身材，体质很单薄，脸色略显苍白……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付老师，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付老师的最后一课。宁静的教室内，看不出一点异常迹象。付老师认真地讲着，同学们认真地听着；付老师认真地在黑板上写着，同学



们认真地在本子上记着。课堂内除了笔和纸的窸窣声外，就是付老师的授课声：

“韦庄是唐代最后一位有成就的诗人，也是我国词坛上最早的杰出词家。”付老师将韦庄的艳诗丽词一一道来。他讲得绘声绘色，同学们听得如醉如痴。

只见付老师换了一支又一支粉笔书写，擦了一次又一次黑板。两个多小时下来，粉笔灰撒满了讲台。付老师的胸前也是灰白一片，难怪人们尊称教师是“吃粉笔灰的人”。

这时，教室外正刮着寒冷的北风，可付老师的头上却挂满了豆大的汗珠。他一边擦汗一边背诵韦庄的小令《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突然，付老师的声音中断了！只见他猛地向前一窜，同学们正在吃惊时，付老师的声音又断续地响起。他直愣愣地瞪着双眼，努力地念完了最后两句：“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就在“断肠”二字落音时，“扑通”一声，付老师倒在了讲台旁。教室顿时静若空谷，同学们都惊呆了！我们坐在前排的几个人，赶紧冲上去搀扶付老师。这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双眼紧闭，脸色铁青。

很快，救护车来了。就在我们抬起他的瞬间，付老师一把抓住了讲台！僵硬的右手在撒落粉笔灰的讲台上，划出了五道手指的指印……

当时，我们是怎么离开教室、怎么回到宿舍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夜传来了付老师不治而亡的噩耗。

接着又听到有关付老师猝死的三件事：

一、他极其清贫。家在农村，育有3个孩子，加上妻子全家五口人的生活，仅靠他一人微薄的薪金维持。平时连像样的猪肉都买不起，偶尔买的也只是五花肉。可他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自己从不动筷子。

二、熬夜写书。当时付老师还是一名讲师，要评副教授需要有著作。于是，付老师就熬更守夜地伏案著书。



三、为了给作家班上课，连续加了几个夜班备课。
同学们听后非常难过，当即开始了为付老师募捐的活动……
追悼会上，易中天老师写了一副挽联：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
生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重斯文。

这挽联说尽了我们当时的心情。

付老师走了，留给了我们不尽的哀思。

我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老师倒在讲台上，怎么也忘不了那个瞬间。后来在我参加创作的电视剧《和平年代》中，将这一感人的情节用在了剧中主人公身上。

付老师走了，我常常被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所震慑，为什么付老师最后念到“断肠”时，他就真的离去了？

当然，最让我难忘的是付老师留在讲台上的指印。那是他作为教师留下的最后“遗言”，讲台是他的生命价值所在，他舍不得离开教学的讲台。

感谢师恩，我们能在毕业后有所造诣，也正是这一座座讲台所做的基石。

今天，在纪念母校 120 周年校庆时，我们不能忘了这份珞珈情，更不能忘了倒在讲台旁的付生文先生。

（选自《羊城珞珈情》，花城出版社 2013 年版）

作者系文学院第一届作家班校友



追忆校友徐宏大使

朱 丹

2021年3月7日、荷兰海牙中午时间，突然从北京的喻杉师姐和上海的王兆华师兄处分别获悉徐宏大使离世的噩耗，一时间脑海中一片空白，心情十分沉重，虽然知道他去年年中因病情回国治疗，却没有想到他的离世来得这么快。这一消息震惊了整个荷兰的校友圈、华侨华人圈以及主流社会知华友华圈的众多校友和友人。



记得2019年5月9日、荷兰时间凌晨三点左右，因习惯于时差和经常与国内连线，一觉醒来查看手机的我突然发现微信中有一个新的好友添加：“我是徐宏，马上登机了，我们荷兰见。”此前，



广州的谢石松学长已告知我新任驻荷大使是武大校友，且是他的同班同学，更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我心中充满了期待。

徐氏旋风

2019年5月9日当天抵达荷兰后，徐宏学长立刻发来了微信，告知他已来到海牙的消息。接下来，就看到他立刻投入到了密集的一系列到任活动中，包括拜会荷兰外交部多名领导、向荷兰国王递交国书、向禁化武组织总干事递交全权证书、拜会荷兰首相与多名部长省长以及多家在海牙的国际法机构，在荷兰主流媒体《新鹿特丹商报》上发表整版署名文章并接受多家荷兰媒体采访，安排接待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对荷兰的访问等。因当时中美经贸摩擦正值热点，美国驻荷兰大使咄咄逼人，频频抛出各种极端言论，徐宏大使则在荷兰多个主流媒体与美国大使隔空论剑、义正辞严。

在他到任一个月后，实现了荷兰首相吕特的再次访华；两个月后，为优秀自费留学生颁发奖学金，迎接了海军西安舰对荷兰的访问；三个月后，在阿姆斯特丹迎接了上海交响乐团的访荷。一连串的全覆盖外交活动，在荷兰主流社会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

逆势增长

在徐宏大使的带领和推动下，中荷双边贸易不断加强，荷兰与中国在2020年创下了双边贸易912亿欧元的新纪录，荷兰对中国的出口在2020年逆势增长了14.2%，中国对荷兰的出口增长了6.8%。在疫情下荷航实现了每周飞往中国5个城市的航班，中国也有5个航班飞往荷兰。随着贸易的不断加强，双方人文方面的交往也在不断加深。

为更好地团结荷兰主流社会的知华友华人士、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更加高效地将荷兰产业资源与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实现对接，并助推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帮助中资企业和中国留学生更好地了解荷兰社会，2019年11月7日，在中国驻荷兰使馆的支持



下，在荷武汉大学校友与多名曾在华工作过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友人一起创建了荷兰留华同学会，之后又联合其他多个国家成立了欧洲留华同学会联盟。

在筹划揭牌仪式期间，徐宏大使主动邀请当天参会的百余名曾在华留学和工作过的荷兰及欧洲籍人士来使馆举办仪式，并为大家准备了丰盛可口的中餐佳肴，来宾中既有多名国家友谊奖、省级友谊奖以及上海市白玉兰奖获得者，也有多名荷兰的90后、95后青年才俊，更有多名曾在华工作5年、10年甚至15年以上的企业家和跨国公司高管。徐宏大使率使馆多名外交人员与来宾亲切互动、交流合影，气氛热烈。他表示，相信大家一定能在增进友谊、搭建桥梁、注入正能量等方面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带动更多人加入到促进中荷两国友好往来的洪流之中。

此次活动在荷兰主流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许多曾在华工作多年但已返回荷兰的外国友人是第一次到访中国使馆并与中国大使面对面沟通，大家都很感动。鹿特丹市政府的一名退休工作人员收到邀请后更是十分激动。他说，真是没有想到在退休多年后还能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邀请并与大使共叙中荷友谊、上海鹿特丹友城之情。

在该活动结束不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多名留华同学会成员在武汉最艰难的2020年2月自发制作《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视频，有力声援了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武汉人民（该视频在中国网和学习强国上均有播放）。

儒雅勇士

徐宏学长在荷兰工作一年多时间，坚定维护祖国和人民利益、恪尽职守、勇于担当、锐意进取，为深化中国同荷兰及相关国际组织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博学多才、温文儒雅、正直磊落、坦诚质朴，和他相处的时光总让人如沐春风。

大西洋畔的荷兰是个17世纪因航海、贸易和金融起家的老牌资本主义王国，由于历史原因，它与美国有着很深的宗教、文化和



种族渊源。荷兰一贯崇尚思想与言论自由，但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也被不少别有用心的人用作攻击他人或他国的政治手段。与徐宏大使同期驻荷兰的美国大使胡克斯特拉是荷裔美国人，对于大多数荷兰政客和普通百姓而言，他有一种天然的熟悉感和亲近感。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胡克斯特拉大使在各种社交和主流媒体发布多种抹黑中国的言论。面对种种挑衅，徐宏大使以深厚的国际法造诣和丰富的外交经验，多次在 5G 安全、合作抗疫、人权问题、香港问题等议题上隔空与之针锋相对、勇于亮剑。

亲民大使

荷兰有约 15 万华侨华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几十个侨团，其中有几个保持着多年不变的传统：一是欢迎新大使到任，二是每年在海牙市政大厅举办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三是国庆活动。这些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华侨华商们生意的逐渐扩大，国庆的庆祝活动也随之升级，变得更隆重、更正式。多名华侨朋友在参加完侨界为徐宏大使举办的欢迎晚宴后，非常感动地告诉我：他太亲民了，与我们亲切交流，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提出的合影要求来者不拒，整晚他都在一刻不停地与大家互动，基本上没有坐下来吃饭的时间。

2019 年 9 月 17 日是荷兰侨界庆祝国庆 70 周年的庆典活动，在鹿特丹市中心著名的多伦剧场，2000 多名华侨华人参加了庆祝晚会，徐宏大使在会前与 800 多名侨界代表参加了为祖国 70 华诞庆生的晚宴，随后率使馆全体外交人员参加了当晚的演出，为在场的 2000 多名观众献上了《情对祖国讲，爱对祖国说》和《歌唱祖国》的大合唱，他们的歌声和精神风貌赢得了在场侨胞的热烈掌声。因当晚侨胞们准备的节目特别多，将近深夜演出还在继续，徐宏大使一直坚持到最后，对那些准备了节目的侨胞给予了最大的尊重。

2020 年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他亲自参加了在海牙市政厅举办的全荷华人新春庆祝活动，与荷兰体育及健康大臣一起为龙点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与多名侨界代表合影留念。



作为身在荷兰的武汉大学校友，我们非常自豪连续有2名中国大使来自珞珈山，而徐宏大使作为知名的国际法专家坐镇世界国际法之都海牙，更是武大国际法专业和武大人的骄傲。





尊敬的学长，在你抛下病痛、驾鹤西去之时，在樱花即将盛开的时节，在珞珈山上、东湖之滨，灿烂的樱花、馥郁的桂花、火红的枫叶、傲雪的腊梅，期待着你的归来。你是我们永远的榜样，也是永远的珞珈一少年！

作者系英文系 1984 级校友



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

张培刚

流光易逝，岁月如梭。2007年已是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前身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经济科设立80周年，也是经济科的前身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创建90周年和自强学堂开门113周年。母校跨越“百龄高寿”，而我本人也是95岁耄耋老叟。

在母校经管学院跨越百岁高寿之时，特将我在10余年前撰写的《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一文，加以简化修改发表，作为我衷心祝贺之意。因为这篇文章所叙述的，均是历史事实，也是我满怀深切感念之情极其认真撰写而成的。

我于1913年7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冬我在湖北省第一中学初中快毕业时，就听说刚创办的武汉大学将在次年1929年春季招收预科和本科一年级插班生，于是我初中毕业后，适年15岁半，就决定以同等学力报考文预科插班生。现在我还记得参加此次考试的情景。那年刚过完春节，农历正月初六(阳历大约2月初旬)凌晨，天尚未破晓，吃完家里为我炒的一碗油炒干饭，就与同村出外打零工的堂叔、堂兄五六人一道，步行70华里到达黄陂县城，找旅店打地铺睡一晚。翌日清晨又步行20华里到京汉铁路横店站，再乘火车到达武汉。半月后我参加考试。那时武汉大学的校址还在东厂口，武昌的山洞还未打开，由胭脂路到东厂口必须先爬山、越过蛇山背脊，再行下



山，真可谓费时费力。俟2月下旬揭榜：文预科插班生录取了张培刚1名，理预科录取了艾华治(女)等6名。

武汉大学于1930年秋冬间迁至新校址珞珈山。我在预科学习一年半后，就进入经济系本科，1934年6月毕业。从预科起，我在武汉大学求学时间共有5年半，为我的学术生涯打下了重要基础。

我进入武大时，校长是王世杰先生，代理校长由王星拱先生担任；王世杰先生调任教育部长后，王星拱先生正式担任校长职务。记得当时法学院院长是皮宗石先生，后来由杨端六先生继任。

当时的武汉大学仅有理科和文科，工科尚未招生。全校学生约500人，学生人数最多的要算经济系。我们班同学共有20余名。新创办的武大，富有朝气，校风纯朴，各系大多由真才实学的教师主教，在国内名列前茅。

我读法学院经济系。法学院下设有法律、政治、经济三个系，师资优秀，阵容强大。老师们教学认真负责，各有特色，使我受益良多，影响深远。

我在武汉大学读文预科和本科一年级时的主要基础课是数学、国文、英文，还有逻辑学等；此外，还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和一门理科课程。

数学从文预科到本科一年级都是由副教授程纶老师讲授，他讲课朴实清楚。由于我本人对数学有较好的天分和特大的兴趣，在中学时做练习总是赶在老师讲课进度的前面，功底较好，所以这次报考武大插班虽然跳了一年半，但我利用课余时间加班加点，很快就补上了数学课的跨越部分。大概经过半年到一年就基本赶上了进度。记得当年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主要是讲授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后来解析几何提前列为高中课程。

英文这门课，我在读文预科一年级时是张恕生老师讲授。张老师体形魁梧，特胖(可能有高血压，后来不幸早逝)，发音清正，教课得法，对作文要求严格，是位好老师；只因要求过严，且批评学生时语中常带有讽刺，有些学生不喜欢他。在文预科二年级时，



英文课老师是文华大学(后改名为华中大学)骆思贤先生。骆老师常年在教会大学里工作,英语讲得流利,教课简明清楚。到大学本科时,经济系的基础英语课老师是哲学系胡稼胎教授。胡老师讲英语是一口“伦敦标准音”,引起学生们的浓厚兴趣,也大开其眼界(实际是“耳界”)。我们都很顽皮,比如“Which”一词,按“韦氏音标”读法,我们故意译为“晦气”,而现在按伦敦口音(或“国际音标”)读法,又故意译为“围棋”,这里“h”是不发音的。胡老师讲课严肃认真,不但注重作文,而且非常注重英文的修辞学。

英文课的张、骆、胡三位老师,教课认真负责,讲授得法,对学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使我当时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上面几位老师讲授英语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大量阅读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短文或传记文学选读,如莫泊桑的《项链》、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富兰克林的《自传》选读等;第二,反复讲清“语法”中的疑难部分,特别是时态和前置词的各种用法;第三,强调作文和修辞。记得从大学预科到本科一年级的三年内所上英文课,几乎都是每两周(至多三周)要写一篇作文。当时同学们被逼得真有点儿“敢怒不敢言”,后来同学们都认识到了这些做法的正确性。大约10年后,1940年暑期,我在昆明参加清华庚款留美公费考试,英文这一重头课一上午就只考一篇作文。这时,我内心更加钦佩这几位大学英语老师的高瞻远瞩、教学得法了。在大学本科上“基础英语”课时,我读到英国大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一篇有名文章,其中有两句我特意译成押韵的中文:“多读使人广博,多写使人准确。”自后也一直把这两句话作为我的“求学座右铭”。

文预科的国文课,主要是鲁济恒老师讲授的。鲁老师当时是湖北省有名的国文老师,我在读省一中时就已闻名。鲁老师为人和蔼慈祥,两眼高度近视,讲课声音洪亮,神情激昂,诲人不倦。教材以古文为主,亦有白话文章,作文每月一次到两次不等。记得1929年春季入学后不久,第一次作文课题是“论文学之创作与模仿”,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又很重要的题目,一口气写了三四千字。文中谈到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其中的几条我很赞成,



但有一条“不模仿古人”，则不完全赞成。我写道：“今人有好的，我们固然应该学习和模仿；但古人有好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模仿。”“不能因古而弃善，亦不能因今而扬恶。”不久，发还作业本，鲁老师在班上对我的作文大加夸奖，并公开宣布给了95分，是班上最高分。待我打开作文本，只见鲁老师对上面几句话，用红笔浓圈密点；文章末尾还有一段评语，最后两句是：“文笔如锐利之刀，锋不可犯。”可见我不赞成“不模仿古人”是完全符合鲁老师心意的。

谈到大学时期的国文课，我还要特别提到中文系刘赧（博平）教授。博平老师早年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当年武汉大学已经开始形成一个良好的校风和教学惯例，那就是“凡属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不论是为本系学生开的或是为外系学生开的，都必须派最强或较高水平的老师去讲授”。所以当我到了经济系这个大系读本科一年级时，学校特委派刘博平老师讲授国文，仍派程纶副教授讲授数学，又专派生物系台柱之一的何定杰（春桥）教授讲授生物学（当时按学校规定：文法科学生要选读一门理科课程）。博平老师虽然刚来武大不久，学生们却早已知悉他是国学大师黄侃（季刚）先生的真传弟子，对说文解字、声韵训诂之学造诣极深。他和后来的黄焯教授一道被学术界公认为章（太炎）黄（季刚）训诂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博平老师为人谦和，讲课认真细致，当时为讲《文心雕龙》及其他古籍书刊，旁征博引，字字推敲，引人入胜。博平师又常曰：“吾推寻文字根源，每于一二字用意穷日夜，仍难得其声、义所由之故；泛览文史，辄日尽数卷，宁用力多而畜德少耶？然吾终不以彼易此。”博平老师的这种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使我终生引为典范，受益良深。

当年我在武大本科学的基础课，除了国文、英文、数学外，还有必修课第二外语（我选了法文），以及我自选了第三外语（德语）。

法文从本科一年级学起，共学两年。一年级的法文课是陈登恪教授讲授，从字母、拼音学起，着重语法和造句。陈老师是一位忠



厚长者，穿一生长袍，却口授外国语，在一般人看来，与其说他是一位洋文教师，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八股中文先生。陈老师对学生和蔼慈祥，教课认真细致，很受学生敬重。

二年级的法文课是当时知名女文学家、外文系教授袁昌英老师讲授。袁老师是当时武大经济系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教授的夫人。她和当时武大中文系的苏雪林老师（后迁居台湾，以逾百岁高龄逝世，著名文学家）、凌叔华女士（当时武大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陈源教授的夫人）一起，被称为“珞珈三女杰”。袁老师讲课，神采奕奕，声音洪亮，强调作文，选读法文名篇短文和小说，要求严格，从不含糊；有时袁师还挑学生朗读课文，回答问题。学生喜欢她，但也怀有三分畏惧之意。记得当时是1931年秋到1932年夏，学校已由武昌东厂口旧校迁往珞珈山新校址，袁师就给我们班出了一个法文作文题“珞珈山游记”，非常应景。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只是要使用的单词很多，难以拿准。我不断地查阅字典，对照法语书刊，几乎花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才写完这篇短文。这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大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多写使人准确”的深刻含义了。

大学法文老师们的认真讲授和严格要求，使我终生获益甚多。我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时，不仅能阅读有关专业法文书刊，而且还撰写了几篇关于法文书刊的书评，先后都发表在该所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上。1941年秋，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能笔试通过第二外语法文的考试。饮水思源，我更加怀念和感谢在大学时的法文老师陈、袁两位。

袁师并不是专职的法文教师，她出生于1894年11月，是早年就以《孔雀东南飞》剧作而驰名文坛的作家，也是以长期研究西洋文学而著称的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更是青年时就能冲破封建传统束缚远涉重洋，留学英、法，专攻西学的女中豪杰。可是，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就蒙受着不白之冤，遭受着心灵的摧残和精神的严重迫害。当我辗转听到袁师



的艰难处境时，自己也正在受审查、挨批判，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真是“泥象过河，自身难保”；除了师生同病相怜外，亦只有暗中祷告上苍，降福斯人了。1969年12月，袁师以75岁高龄，又由珞珈山被戴“罪”遣返湖南醴陵县转步口故乡；到1973年4月，在寂寞中悄然辞世。所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老师生前的“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等错误处理得到昭雪，母校武大也为她老举行了平反大会，袁老师九泉之下有知，也可稍微得到慰藉。

再谈谈德文课。在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我自愿额外选读了第三外语德文。教德文的是一位德国老师格拉塞先生。据说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来到东方的，自后他不愿回德国，就在中国留下来。他娶了一位日本夫人，添了两个女儿，女儿当时只有十几岁，都在读中学。格拉塞先生教书认真负责，讲课用简单德文，很有条理。一般来说，他比较严肃，但有时也很幽默。我总记得他把一堂德语课文编成了一个简单笑话的故事：有一天，老师给学生上课，说是要记住一条规律，凡物逢热就胀大，遇冷就缩小。一个学生连忙站起来，说道：“是的，我懂得了，所以夏天天热，白天长一些；冬天天冷，白天就短一些。”全班同学听后大笑起来，格拉塞先生当时已年逾半百，也和大家一样天真地笑着。

那时上海的同济大学，可说是全国高等学校中学习德文、运用德文的典型代表。为了便利教学，推广德文，该校编辑出版了《德文月刊》杂志，对教育界和学术界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在大学四年级就开始订阅这份杂志，大学毕业后仍然继续订阅，大大有助于我的德文自修，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烽火蔓延至上海，该校西迁后“杂志”停刊为止。由于大学时打下的根底，加上毕业后的连年自修，使我后来在工作中，就已经能够用德文阅读专业书刊了。

在大学本科一年级，我还学习了一门基础课，那就是逻辑学（亦称“论理学”或“名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当时教这门课的是屠孝寔老师，那时屠老师刚刚撰写出版了一本《名学纲要》，颇有名气。屠老师身材修长，举止文雅，讲课条理清晰，常以例子说明原理，步步深入，使人豁然开朗。这门课程对于



我后来说理写作、分析和解答问题佐助良多，终生受益匪浅。

最后，我在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的一门课程是生物学。就经济学而言，这可以说是一门基础课，但也可以说是一门专业知识课。当时按学校规定，凡读经济的学生，除数学必修外，还必须选修一门理科课程：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任选一门。我选了生物学。前面提到过，当年武汉大学有一个好传统，有关的系都是派最好的或较高水平的老师给外系的学生讲授基础课，生物系派出了知名教授何定杰（春桥）老师为一年级外系学生讲授生物学。何老师 40 岁左右，却已蓄起有名的“长髯”，自后在武大学生和同事中就传开了颇有名气的“何胡子老师”。何老师讲课，不但条理清楚，而且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我当时对生物学这门课所讲的内容，特别是对遗传与变异非常感兴趣。比如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通过对豌豆的著名实验，研究出基因（Gene）的分离规律；又如法国学者拉马克以“用进废退”学说阐述长颈鹿的进化过程；至于英国大学者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更是令人推崇、启发深思。

在此，我要特别谈到与生物课相联系的两件事：

一是 1941 年我留学美国，开始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选读了张伯伦（Edward H. Chamberlin）教授的“经济学原理”之后，又选读了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高级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即熊氏后来撰写并在逝世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的雏形和概括）两课程。记得熊彼特教授在课堂上就讲到了经济学的“达尔文学派”，其特点在于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经济演讲过程的分析上。不仅如此，熊彼特本人也早就多次引用过生物学上的术语和概念。比如他在早期成名之作《经济学发展理论》一书中，以其独成一家的“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特征时，就曾借用过生物学上的“突变”（Mutation）一词。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并把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看做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所以他认为“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这使我体会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不仅在方法论上，而且在有些理论上，两者确实有相通之处；更使我体会到，当年母校规定经济系学生必须选读一门理科课程，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是 1950—1951 年，当时正值我国奉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与之相联系，在生物学界也大力介绍和宣传“米丘林学说”及其代表人物“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事迹。本来，在当今世界上，为了走向现代化，介绍和宣传现代科学上任何一种新学派都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李森科一方面把自己的论点和看法所形成的概念称为“米丘林遗传学”；另一方面却把当时国际上广为流传的摩尔根学派“基因理论”说成是“反动的”“唯心的”，并且利用权势排斥持不同观点的各个学派。影响所及，特别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造成了科学研究上的严重不良后果。我们知道，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是美国及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早年曾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创立了“基因学说”，著有《基因论》《实验胚胎学》等著作，1933 年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而李森科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完全抛弃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而把“基因理论”和摩尔根学派一概加以否定、排斥和打击。我国当时的生物学界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亦随声附和，以致当时生物学界不少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素有造诣的老专家如谈家桢教授等，横遭指责和批判，长期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事实真相才逐渐大白于天下，是非曲直也才逐渐得到端正。可见，学海如战场，做学问的人也必须具有承受各类事故的极大勇气和牺牲精神。

追述我在武汉大学文预科和经济系本科一年级学习基础课的情景，我认为这一段打下基础的经历，是我日后通过出国留学的考试并用外文写成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的直接和重要渊源。首先，如前面所谈，1940 年暑期在昆明和重庆同时举行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生考试，英语一个上午只考一篇作文，如果没有大学时期打下



的较深基础，那是得不到优秀成绩从而难以考上的；其次，如果没有英、法、德三种外语的基础，不能充分利用哈佛图书馆大量阅读和引用有关外文书刊，那么也难以写出获得哈佛经济专业最佳论文奖并列入《哈佛经济丛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再次，在其他基础课程方面，如中英文语法、逻辑体系、达尔文学说进化思维等，不仅与《农业与工业化》撰稿，而且与终生的学术写作，都具有深切的关联。当前学术界在学风和文风上，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之风颇为流行，此风如不刹住，必将影响子孙后代，贻害无穷。

在大学时期，除了打好做学问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基础外，同样重要的是打好经济学专业基础。1930年秋，我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那时法学院（包含法律、政治、经济三系）教师阵容极强。就经济系而言，著名教授及其开设的课程有：周鲠生（宪法、国际法，法学院共同课程），杨端六（会计学——含成本会计、货币银行、工商管理），皮宗石（财政学），刘秉麟（经济学、货币银行、经济学说史），陶因（经济学），任凯南（外国经济史、外国经济思想史），李剑农（中国经济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朱祖晦（统计学），张竣（国际贸易——含海运保险）等，可谓极一时之盛。

当年武汉大学经济系的教学有三大特点：

第一，教与学极其认真。那时经济系的教师大多数留学英国，只有陶因师留学德国，而周鲠生师除留英外，还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学风和作风踏实认真，注重基础，人人国学功底深厚，撰写讲稿和发表文章水平极高。这对青年时期的我影响极大，终生奉行不渝。

第二，理论与实务并重。比如设置的课程，既重视理论课程，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等，又重视实用课程，如会计学、成本会计学、统计学、工商管理等，因此武大经济系毕业的学生，一方面，不少在大学讲授经济学或经济思想史课程；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在国家机关或实际部门担任会计或统计工作，还有不少担任大型国有工厂如钢铁公司、机械厂、造船厂等的



会计主任或会计处长。

第三，那时武大法学院的经济系，在课程设置上还有一重大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法学课程，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宪法、国际法外，有必读的民法概要、商法、保险法、劳工法等。

我在武大经济系本科四年的勤奋学习(年年得系奖学金，全系成绩最优；毕业时得法学院奖学金，全院成绩最优)，确实为后来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从事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研究并取得较优成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其中还要着重提到为我们讲授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的任凯南老师。我记得任师讲课湖南乡音极重，但条理分明，十分详尽。讲到激昂处，喜用口头禅“满山跑”——遍地开花结果遍地发展之意。任师讲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特别是讲述纺织工业的兴起过程，极为详细，比如讲“飞梭”的发明及其广泛流传应用，就在好几处用“满山跑”口头语。当时我在教室听课做笔记，为了求快以免遗漏，同时也来不及另行措辞，就直接写下很多处的“满山跑”，成为这门课笔记的一大特色。任师不但在课堂上讲课认真，还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英文参考书，主要是关于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任师见我读书用功，特在自己的书库中，拿出英国瑙尔思(L C A Knowles)女教授撰写的一本英文名著《19世纪产业革命史》(1927年版)送给我，让我细读。在大学毕业前的一两年内，我挤出时间将该书读完了。任先生讲授的这两门课，加上阅读有关英文参考书籍，使我开始认识到两点：第一，像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除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兴办现代大工业之外，别无振兴经济之道；第二，我从老师的讲课和自己阅读欧洲经济史的书刊中，又得知在城市大工业兴起过程中，却引起乡村工业纷纷破产，加上不断圈地使土地兼并之风接踵而来，又使得广大农民失掉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落城市街头，景象十分悲惨。因此，我不断思考，终于又得出一崭新思想：在实行城市工业化的同时，也必须实行农村工业化。这一思想体现在两年后(1935年)发表在胡适之先生主编的《独立评论》杂志上的《第三条路走得通吗?》一文



中；与此同时，也使我初步认识到，要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还必须借鉴西方。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担任过武大校长的周鲠生教授。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国际法学专家，他为我们讲授宪法和国际法。在我的记忆中，周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西服，冬季寒冷，教室未生火炉，无热气取暖，他老一进教室，先脱去大衣，再走上讲台，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先生担任武大校长。周校长有孕育栋梁的博大胸怀，爱才惜才，也善于大胆启用青年人才。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尚未毕业，他到美国，就预先聘我和吴于廑、韩德培三人学成后到武大任教。后来我们三人就被称为“哈佛三剑客”，分别主持经济系、历史系和法律系。后来我代理法学院院长一职，当年我和吴于廑 32 岁，德培兄长我们 2 岁。我还邀了一批国外留学生相继回国到武大任教，他们是吴纪先、李崇淮、周新民、刘绪贻、谭崇台、刘涤源、黄仲熊等。前任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曾给董辅初说过：“那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系，师资最整齐，最年轻，水平超过南开。”要知道，那时的南开大学不仅设有经济系，还有经济研究所，并有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何廉、方显廷两位著名教授主持，他们在《大公报》上创办“经济周刊”，按期发表文章，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

十分遗憾，1952 年年底我被调离武大，到喻家山筹建华中工学院，从事基建工作。虽然我对母校情感依依，但此后再未回到母校工作。

上述武大法学院的诸位老师，不仅是学识精纯的著名经济学家或法学家，而且也是道德、文章、品格高尚的教育家。就时间顺序而言：李剑农师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皮宗石师、任凯南师先后担任过湖南大学校长，陶因师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周鲠生师 1945—1949 年曾任武汉大学校长。还有杨端六师，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曾被礼聘兼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上将厅长，以他老那样性格耿直、办事认真的态度和作风，实在很难见容于官场，所以，仅仅



一次或两次暑期到任之后，他老就借故辞职，回校专门教书了。

我的大学老师都已作古，有的已离开人世五六十年。但不论是基础课老师还是专业课老师，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风度，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他们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精神，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选自《商务门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经济系 1930 级校友



老师教我做人和做学问

李德仁

我出身于贫民家庭，父亲在县银行当会计，母亲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一家7个兄弟姐妹，读中小学时学习成绩都很好。为了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活，大姐进了财经学校，早早参加了工作。我是老二，在江苏泰州中学初中毕业后，老师劝说父母让我继续读高中，由小姨每月给我五块钱住校读书。所以，我从小就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在高中期间，做了十几本数学题，参加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课外活动小组，测过学校后面泰山的高度，做过工业零件模型，制成了肥皂、塑胶纽扣、硫酸生产线模型等。省泰中的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地关怀，给学生以智慧，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1957年高中毕业后，还是老师劝我父母让我考学，并谈妥：考不上就找工作挣钱养家。我当时报考了北大工程物理系，自己觉得考得不错，可结果被录取到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当时有些想不通，总想查看一下高考分数；但当时我是7512班班长，又不好意思闹情绪。

慢慢地对学校和专业有所了解，知道学校有夏坚白院长、陈永龄教授、王之卓教授和叶雪安教授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他们都是20世纪30年代去德国留学后学成归国的前辈。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许多老师，如教测量学的蒋维恒教授、教画法几何的黄振寰教授、教地貌的潘丹杰教授、教化学的梅其祥讲师，都善待我们，课讲得有声有色。老师传授知识给我们，也传授给我们他们对事业执着的追求，很快我就经常到图书馆里去埋头读书。低年级时我除了学习



各门功课外，自学了斯米尔诺夫全套数学教科书，还看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到了高年级，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学校提倡劳逸结合，要我们多休息少看书，我只好偷偷地挤时间看参考书。当时学的是俄语，我把俄文测绘杂志有关航测的文章逐期逐篇地读完，还做了笔记。

我的航测课一半由顾葆康教授讲授，另一半由陈适教授讲授，他们讲课各有各的风格。顾老师教我们思路明晰，陈老师教我们条理简明。全班同学经过十几个月海南岛航测专业实习后，增强了求知欲，学习上你追我赶、相互帮助，学习动机明确，尤其在 1962 年广州会议之后，人人明确为了国家的富强就要学习好本领的道理。

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我喜欢在笔记本边上留下一侧空白，以方便课后自己思考或看了参考书后加以补充。这种方式使我的知识面在宽、深两个方面都有了提高。渐渐地，我敢于批判地对待书上的知识了。毕业前一年多，我结合航测课写了 3 篇习作，经过些许周折有幸送到了王之卓教授手中，没想到过了几天，王教授就约我去他家。

记得那是一天下午的五点钟，我按时来到王教授的小洋楼，师母微笑着将我迎到王老师的书房。王教授已经在我的习作上写了一大段赞扬的评语，充分肯定了我用仿射变换理论对变换光束测图的误差所作的分析和用多普勒效应测定航摄影仪外方法元素的设想。师生一席谈话不知不觉过去了 3 个小时，直到师母进来请老师去吃晚饭。这次难忘的讨论实际上是我第一次登门拜师，也是王教授伯乐识马，从此开始了我 30 年随恩师学习的历程。临告别时王教授要我学好英语，跟他做毕业设计。

我们大班有十几个人凑了一个业余英语学习小组，请陆铁铺老师辅导。当时这种学习是很危险的，因为有人说这是不安心航测专业工作的表现。我们只好在晚上找一个房间偷偷地学。

为了做毕业设计，王之卓教授要求我阅读英国摄影测量学家汤姆逊教授的几篇英文论文和加拿大乌尔赛克教授的论文。我竟然用刚学的英语将它们译成了中文。毕业设计由王教授和郑肇葆教师指



导，题目为《反光立体镜在航测分工法测图中的应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导出了比加拿大马尔赛克教授更加严密的公式及其简化形式，并用此公式完成了相对定向、绝对定向和平高加密及分工法测图等工作，而使用的工具仅为反光立体镜和视差镜。

我的毕业设计被评为全年级最佳论文，并举行了全班优秀论文答辩，为日后走上讲坛开了一个头。随后王之卓教授又推荐我将毕业论文压缩成一篇较短的论文在《测绘学报》上发表。他亲自为我修改论文、排章节、理头绪。那次指导后，我学会了如何撰写科研论文。

1963年，我们按照周恩来总理对大学生的要求，服从组织分配，到野外测量队去锻炼自己。在生活了6年的大学学到了建设祖国的本领，我由衷地感谢教我们做学问和做人的老师们，我还要特别感谢杨坚老师，她能顶住压力，引导我这样一个初涉人生曲折的人勇敢迎接艰辛的生命历程。

我在国家测绘总局地形二队工作了一年，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之间留下了足迹，完成了国家测绘总局试验场的大量控制和测图工作。遵照王之卓教授写信对我的要求，注重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和提高自己，我发现了按规范测山区高程导线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方法，重新计算了视距高差表，初次尝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甜头。一年野外工作结束后，我们小组被评为先进小组，组长温昌泰同志也得到晋升。1964年年底，我奉调分配到国家测绘总局科学研究所工作，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鉴于某些原因，我未能录取为王之卓教授的研究生，也未能分配到航测研究室工作，而是来到了情报研究室。即使如此，听说这其中已包含了王之卓教授向陈永龄所长的鼎力推荐。

好在这些内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的，所以我在研究所工作得还是十分起劲的，在情报室为了完成编辑《测绘译丛》和《测绘文摘》两份期刊，我有了大量阅读国外有关文献资料的机会。同时，我还自学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矩阵代数》两本书。邢台地震发生后，我参加了北京郊区地壳形变水准测量，足迹留在了长城内外。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我们失去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也导致国家测绘总局整个系统的撤销。1969年，我随国家测绘总局驻京机关大多数人员一起来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半年做建筑，半年种水稻，半年当炊事员。

1978年，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王之卓教授执意推荐我免试读他的研究生，由黄世德教授(当时航测系副主任)给我写信。我随召回到母校参加口试。可惜我当年考研究生的成绩档案已因“文化大革命”而丢失，省教委要我临时重考，学校专门为我出卷，总算顺利地通过了英语、政治、数学和航测4门考试，正式成为硕士研究生。

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国门打开，我看到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全国人民振奋精神，为建设“四化”努力拼搏。在这种形势下，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广泛阅读本专业有关国内外文献。由于当时复印不普及，我做了20本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其中90%为国外文献，这为我日后出国进修和从事科研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1981年，我顺利地通过了硕士论文《自检校光束法区域网平》的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在论文中我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在平差过程中自动补馈和消除系统误差影响的方法，提出了信噪比是决定自检校平差效果的主要因素，指出了未知数及附加参数问题相关可能引起过度参数化的问题。这些研究充实了国际上对系统误差自检校的理论与实践。

硕士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82年10月，在先后通过了英国和德国的国家水平考试之后，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德国的波恩大学和斯图加特大学进修。王之卓教授把我推荐给阿克曼教授。阿克曼教授是国际航测界的知名权威，他为我设计了学习计划，先送我到波恩大学在库普费尔教授处学实践。在波恩大学进修时，我改进了该区的区域网平差软件，提出了克服自检校平差中过度参数的3种方法，并从验后方差分量的估计原理出发，提出了选权选代的粗差检测方法。这是我最早用德文写的两篇论文：一篇在德国的LuB杂志上发表(1984年)，一篇在波恩大学作专题报告，并以专辑发行(1985年)，基于验后方差分量的粗差探测方法被称为“李德仁方



法”。记得当时我把这篇论文交给库普费尔教授时，他连声叫好并问我：“像你这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多不多？”我回答：“仅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就很多。”库普费尔教授为了帮助我提高德语口语能力，专门出钱请了德语家庭教师，与我共同学习《当代德国文学作品选》。

1983年5月，我从波恩转到斯图加特大学，阿克曼旋即提出要我攻读博士，这也正是王之卓教授的想法。我为此下定决心，抓紧时间阅读文献，推导公式，设计实验，每天工作14~16小时。我为一个人能同时使用多个计算机终端而高兴。1985年2月5日，我以优异成绩（据说此成绩目前仍保持着斯图加特大学博士考试最高分）通过了博士论文《摄影测量平差中控制点粗差和像片系统误差可区分的理论及试验研究》的答辩。该论文将经典的可靠性理论发展到新的可区分阶段。在我的告别宴会上，阿克曼教授对我回国工作提出了许多期望，并激动地说：“我可以在这里提供一点点秘密。国际知名理论大地测量学家格拉法伦特对李博士的工作评价是：‘我为此文而激动，它解决了测量学上一个一百多年的难题。’”

1985年2月底，我如期回国。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系信息学部（原武汉测绘学院）1957级校友



我的老师彭斐章

吴 平

彭老师八十寿辰之际，非常高兴有机会再次向老师表达心中的感谢。我经常对老师及师母说的一句感谢话是“彭老师救了我”。可能很多人不解其意，但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对先生的感激之情。

1983年，我大学毕业时曾考过一次研究生，没考上，后直接留校任教了。到教研室工作时很是羡慕那些攻读研究生的，于是报名参加了图书馆学系组织的助教进修班，除彭老师外，黄宗忠、谢灼华等老师都是从本科起就教了我的，在进修班里从他们那我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自觉业务能力、学习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经历，后来也有了资格直接报考博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下海”高峰阶段，社会上“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传说在公共汽车上带上校徽小偷都不会光顾。那时，教师的工资的确非常低，我们在外上函授聊起每月工资300多元时别人都不相信，很多教师都改行了。我改变职业的兴趣不大，想继续深造的愿望却非常强烈，那时，不知其他人什么想法，而我一直就觉得不读研究生在学校待着就不自在，但却因为没有读过硕士不知如何达到理想的彼岸。

直至1992年春节，在与萧希明的一次谈话中才知道可以以同等学力的资格直接报考博士研究生。这一信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当即决定当年就报考。去研究生处报名时，好些人问我：“你现在还要去读书吗？”因为那时看到读书不挣钱、对读书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人已经很多了。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既入佛门必



成正果”的想法非常强烈，好不容易有了这一实现梦想的机会，我岂能放弃。但毕竟备考过于匆忙，那一年我两门公共课通过，专业课却都失误了——没考上。从小到大我的学业都很优秀，大学毕业那年考硕士是凑热闹，看着有同学报考也就报名了，没考上既不影响分配工作，也没影响心情。而这次抱着信念来实现心中的理想却遭到沉重打击，着实有些焦急。知道没有录取希望后，再没吭一声，也没跟彭老师联系，只是暗下决心：明年再来。扎扎实实地又复习了一年，再一次参加考试。很幸运，1993年，我终于成了彭老师的学生。

彭老师救了我。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彭老师该放手时放手，该批评时批评，该提携时不忘架云梯。有一次上课，彭老师想听听我和卿家康同学的想法，而我事前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彭老师生气之状一目了然。好不容易能做彭老师的学生，岂敢让老师如此为我操心，回去抓紧时间做功课。摸到路径后功课准备得很顺利，果然，第二次课上老师的脸“云开雾散”“由阴转晴”，我也有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为了让我们见世面，学会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彭老师让我们准备毕业论文参加全国目录学研讨会，并分别在大会上发言。不说研讨内容对我学业的影响，仅仅研讨会的形式就让我大开眼界，还认识了很多师兄师姐师妹。

写这段文字时我刚刚从台湾回来，不由想起读博期间彭老师也给了我一次去台湾的机会。那是1995年，两岸图书馆协会交流，大陆要派两名博士生去台湾图书馆考察，一名是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博士生，另一人是我，代表武大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去的。开始，我办了很多手续，却直至该启程前都没有何时走的任何消息，实在忍不住了，就去国际交流处询问，才知道所有手续在教育部审批时受阻，理由是：大陆还没有博士生赴台的先例。事后多年，一次开图书馆学术交流会时跟台湾图书馆学代表说起此事，他大声说道：“原来要去的是你呀，我们做好了全程安排呵。”尽管那时没能成行，但彭老师资助、提携之意我一直记在心里。

撰写博士论文是对所有博士生的挑战，它最能反映我们的学术



研究水平与能力，也是对博士生导师责任心的挑战，不负责任的导师可以一目十行，甚至粗疏过目再返给学生。自知此事不可大意，我很早就着手写了。当时，还不会电脑打字，我给自己一天一页的写作计划，生怕字写大了任务完成有虚假，每一页我都写得密密麻麻，终于完成初稿后送给彭老师审阅，却因为密如蚂蚁的小字让彭老师费神费力。再从彭老师手中取回初稿时，他用铅笔仔细地点出了论文中的毛病和修改意见，同时跟我说：“看你的论文真费劲呵。”呵呵，真难为彭先生了，现在想来都不知他老人家是如何拿着放大镜趴在桌前细细审阅完那十几万字的。后来，在董慧先生的帮助下，我下定决心自己把论文一字字地敲打了下来，五笔输入法也是在那时被逼学会的。

因为有了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重要经历，它给了我信心，给了我教学与科研的方法，也给了我发展的重要机遇。后来，被学校推荐到教务处工作；再后来，职称也一步步跟上，出论文、出教材、出著作，也开始带博士生……面对所有这一切，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给老师脸上抹黑。因为，没有彭老师当时收我为徒，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彭老师真的救了我！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79 级校友



我心中的好老师

——冯天瑜先生指导我学习思考的点滴回忆

张艳国

我追随冯天瑜老师学习已久，从1985年入职《江汉论坛》从事史学编辑算起，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从“门外”追随到“入门”请益，冯老师留给我感人、温暖的场景历历在目；每当回忆冯老师指导我学习思考的点滴片段，体会从中所受教益，总会感叹“遇到冯老师真好！得到冯老师教育培养，真是我一生的造化”。

2001年初夏，经过章开沅先生、严昌洪老师三年悉心指导、培养，我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就要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了。当时，冯老师既被章先生礼聘为我的博士论文《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评审专家，又是6月4日我们博士论文答辩会的主席。我在5月20日晚就将自己的论文送到冯老师府上，请他审阅，当时心情十分紧张。冯老师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紧张情绪，招呼我坐下后，并不急于与我谈论文，而是与我交谈近来的工作。在我的情绪稍稍平复后，他才慢慢地翻阅起我的论文来。在翻阅中，冯老师就他感兴趣的问题询问我，其间不乏肯定和鼓励的话语。在我即将告辞时，冯老师询问出席答辩会的其他专家，并嘱咐我认真准备，努力答出学术内涵来。从冯老师家出来，我紧张不安的情绪一扫而光，内心满是自信和轻松。

6月4日的答辩会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进行，我的论文安排在上午半场答辩。在上午的答辩中，冯老师作为答辩主席掌握会议的节奏和调理会议的气氛，很有艺术性，效果很好，会后受到章先生赞扬和感谢。应邀参加答辩的老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对于



他们认为研究不充分、表述不准确或者论文挖得不深不精的问题，紧紧抓住不放，穷追不舍，刨根问底，学生最后“禁不住问”时，自然面有羞色，难免流露尴尬之情。这时，正好该冯老师进行总结了。冯老师微笑着温和地说：“老师追问的问题，正是有待继续研究完善之处，这是一种有益的提示和强化性强调，不必难为情。学无止境，贵在精益求精。”冯老师的话语让整个会场如春风吹过，满屋子冷峻的气氛回归平和。我因为在答辩前得到导师组老师较多肯定性评价，原以为答辩能“轻松过关”，不想在答辩中也遭遇了猛烈的“学术炮火”。开始时颇为慌张，慢慢才跟上答辩节奏，进入状态。对于我开始时的紧张情绪，冯老师也像对待其他同学那样，时有善意提醒：“不要紧张，更不要慌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就好。”也可能由于专家们对我的论文感兴趣，在提问讨论环节，汇总起来有20来个问题。数量较大，让我很为难。正在犹豫不决之时，冯老师给出了很好的建议。他微笑着说：艳国，这样吧，综合各位老师的评论和提问，你在以下四个问题上再结合论文准备一下吧……问题集中后，我进行了认真思考、梳理，我的回答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

答辩结束，冯老师代表答辩委员会宣读评议结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优秀”。正是因为答辩委员会的肯定，我的博士论文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年度优秀学位论文，我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并获得了“野泽丰奖学金”。冯老师的“专家评语”和代表答辩委员会宣读的“答辩决议”，激励着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坚定地走下去。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一心想着做博士后研究。我心中的理想导师是冯老师。为了慎重稳妥起见，我专门征询了我的导师章开沅先生和严昌洪老师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冯老师是合适人选。章先生说：“你在冯老师的指导下，一定还有大的进步。”这句话鼓舞着我，坚定了我跟随冯老师做博士后研究的选择。在章先生、严老师的推荐下，我专程拜访冯老师，当面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冯老师在批准我的申请后，对我做博士后研究的思想准备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冯老师说：博士后研究，重在研究，贵在创新。不要做一般性



研究，不要为了“做博士后”而“当博士后”。下决心做博士后研究，就要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找准问题意识，深化下去，取得有厚重感的学术成果。冯老师语气平和，但要求明确、指向具体。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做博士后研究的科研方向，围绕博士论文与博士后研究选题的对接口做足文章，在寻找问题意识和突破口上狠下功夫。

在冯老师指导下，入站手续办理得很是顺利；在冯老师指导下，我三次登门向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朱雷教授进行深度请教，每次都得到朱雷先生的亲切鼓励和热心指点。因此，我的进站评议会开得很成功，老师们都对我进站研究表示了欢迎，提出了要求，提点了问题。进站后，我和冯老师就博士后研究的问题意识很快达成一致。冯老师在明确问题意识、目标导向和研究进路后，在选题的拟定上显得尤为慎重，与我多次交流讨论。

在冯老师悉心指导下，我经过三年研究，“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唯物史观思潮互动性研究”报告顺利完成。2006年1月9日下午，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时，冯老师担任中心主任）举行了博士后研究报告答辩评审。历史系和中心的敖文蔚、陈锋、张建民、李少军和谢贵安等教授应邀参加。冯老师和专家们对我的研究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研究报告也被评为“优秀”等级，我被评为武汉大学年度优秀出站人员并获得奖励，这既是冯老师精心培养教育的成果体现，也是我继续前进的新起点。更为重要的是，冯老师为我在出站后继续在学术研究上探索前行，站在更高的学术视野上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指明了正确的努力方向。

2016年寒假、2017年春节前夕，我从江西师范大学回到武汉，赶往冯老师所在的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部病房看望他，特地带上了我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上题为《李大钊、瞿秋白对俄国道路的认识》的长篇论文。当时，尽管冯老师重病在身，却一如既往地处在思考、写作的状态之中，丝毫没有身患重病的疲惫倦怠与痛苦不堪。他在接过我手中的杂志后，非常高兴地翻阅着，还将感兴趣的文字读出声，并望着我笑，非常慈祥。他说：“你带



来的杂志及其发表在上面大作，是对我最好的新年祝福。”我说：“感谢老师的教诲，我的小作受到了您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的深刻启发。”冯老师连忙打断我的话说：“不，不。看得出来，你的这篇大作，是你博士后专题研究的继续深化。这些年来，你还没有放弃，继续深入研究，功夫没有白费啊。可喜可贺！”真是“了解学生莫如其师”啊：这些年来，我的确始终牢记着冯老师在我出站答辩评议会上的总结讲话，遵循着冯老师关于学术研究要重视“后续研究，继续推进”的教导，锲而不舍，终于有所收获，尝到了继续努力的甜头。冯老师对我的教育培养，充分体现了做一名“好老师”“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深厚情怀，这对我传承冯老师“好老师”的育人精神，具有示范意义。

冯老师成名很早，学术成果丰硕，赢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尊敬和尊重。在常人看来，冯老师能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极大成功，一方面源于他的勤奋努力，他常年孜孜不倦，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师母刘老师不无诙谐地评论：“冯老师做起学术来，有瘾。”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冯老师的极其聪明，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敏捷的反应力。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也这样认为，觉得做学问要勤奋+聪明，甚至认为具备超强的记忆力在治学中是主要的，直到前不久，冯老师在来信中对我进行训示，才使我顿开茅塞，明白了做一名出色的职业历史学家，究竟应该具备什么！2020年9月4日上午，冯老师在来信中这样说道：

“艳国君好！做史学研究，诚如你言，记忆力重要。然不必过多地寄望于天赋的记忆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感悟力也至关重要。而这种感悟力的获得，除部分凭记忆力赐予外，更多则是依靠研史实践中理性思维的锤炼。至于史学撰著，记忆力提供某些基础，更赖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你在这三方面皆有优势，再下功夫定可再上层楼。”

这既是冯老师对我的教益，更是冯老师对自己学术思想、学术方法进行自我总结的经验之谈，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使义理、考据和辞章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



中国学术史上大家、名儒素来提倡的学术理念、学术门径，也是冯老师一贯坚持的学术指向。早在1994年，冯老师在应邀撰写的一篇学术总结性自述中，专门论述了他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理解、重视和坚守：

“清人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从姚氏之言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史学工作者自然也在其列），应当有理论准备，得以攀登时代的理论高峰，对错综的研究对象获得理性的真解和创造性的诠释；应当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占有丰富的材料，并具备辨析材料的能力，所谓‘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记无不达也’；应当锤炼语言，长于词章，有一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追求。姚鼐提及的‘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是我近十年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的所在。……‘义理、考据、词章’不仅各具独立价值，而且，理论指导、材料辨析、文字表达三个方面的能力缺一不可，此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相济’而不得‘相害’。以史学而论，忽视史料的占有与考证，其义理不过是空中楼阁，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没有理论思维，所占有的史实也只是一堆原材料，无以建构伟岸的大厦……此外，有义理与考证功力，如果文章苍白乏力，也难以成就良史，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反之，擅长文章表达，却缺乏义理考证功夫，则不过是花拳绣腿，上不得真阵式，而且还会以文坏史。古来忌文人修史，文人修志，即是防范这种情形。”

难怪冯老师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都着重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在治史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价值，这实在是他承续古人而又发扬光大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由此看来，勤奋也好，聪明也罢，包括超群过人的记忆力，这些都是做学问的“外功”，而不是“内力”。治学，真正的内力乃在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有机结合，有了这个内力，外功才起作用。这应当是治学，特别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法门和应予遵循的学术准则。

在与冯老师交往、追随冯老师求学求知的几十年历程中，我既



受到冯老师严谨治学的学风影响，又受到冯老师海人不倦的人格魅力熏陶。作为个体人物而言，冯老师具有“好老师”的品质情操和文化内涵，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存在。但是，冯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热爱中华文化，研究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他既有历史感、“追究历史”，又有现实感、“考察现实”，同时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自豪感、归宿感，坚信“中华民族正驾驭巨舟，升起云帆，在无垠的文明沧海破浪远航，‘诞敷文德’”，他像古人的史学情怀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了，而应该就是一种必然产生了。在冯老师身上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文化发展与士、君子道德承载的必然性，无论如何，都是任何一个时代、一切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的。

良师之风是教师长期积累的善美风尚、内涵品德、情操和育人理念。“教师的良好风范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功能，而是长期刻苦磨砺形成的优秀素质，包括思想作风、道德操守、文化素养、生活情趣等各个方面。”良师之风又会风行草偃，春风化雨，润物发生。俗话说得好，“一落叶而知秋，一滴水能成冰”。尤其是在冯老师身上所映现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德、“天梯度与有志人”的君子之风、“终生追求从不懈怠”的君子之行，把“好老师”的使命担当扛在肩上的教育实践、文化实践，理所当然地是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标志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典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切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应予珍视的榜样。

衷心祝福冯老师八十华诞！老师健康，学生幸福，学术界大幸！

作者系历史学院 2005 级博士后校友



我的老师郭齐勇

秦 平

今年(2016年)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系)恢复重建60周年,而我到哲学学院学习和工作也已经有20多年了。现回忆当年求学过程中的几件小事,借以表达对我的导师郭齐勇教授和哲学学院(系)的感激之情。

我的“中国哲学史”课程

我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第一届人文实验班(1993级)的哲学方向。那时的人文班算得上是学校的明星,给我们开设课程的大多是文史哲诸系的名教授。大二那年,我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一门课——“中国哲学史”。当时人文班的“中国哲学史”一共有8个学分、144个课时(每节课50分钟),分两个学期开设。郭齐勇老师负责讲上半段(从先秦到汉唐),李维武老师负责讲下半段(从宋明到现代)。

先说说李维武老师的课。李老师讲课非常严谨,从教案到板书均工工整整。他上课时,总是穿白色衬衣、浅灰色的西服或是很正式的夹克,声音洪亮,语速较慢,目光炯炯有神,让全班46位同学顿时感到无处逃遁,唯有老实听讲、狂记笔记。李老师讲授的内容体系完整,线索清晰,信息量极大。我在他的课堂上记的笔记足足有好几万字,看上去就像小半部书稿。连课间时间也基本上都用来与做笔记认真的同学相互对照、查缺补漏了,现在回想起来,真



是“痛并快乐着”！

郭齐勇老师讲课又是另一种风格。郭老师的课程安排在上半年，天气逐渐转热。我印象中，他习惯穿白色长袖或短袖衬衣，不系领带，有时候外面加一件灰白色夹克。同学们一致的感觉是：郭老师的每一次课，就是一场完美的讲座。他的课堂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辞章非常典雅，铺陈华美而又精准细腻，细细品味，顿觉字字珠玑、恰到好处。时隔多年，郭老师课堂上讲授的具体内容大多已经模糊了，或者更准确点说，是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中去了。如果让我总结郭老师讲课的最大特点，那就是大气磅礴。当时武大的教室基本上没有话筒，郭老师或者语气轻柔，娓娓道来，或者语调高亢，慷慨激昂，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直透人心，让我们高回低转，欲罢不能，大呼过瘾。郭老师的课堂总有一股气韵贯穿始终，后来我学习《孟子》的“养气”说时，没有丝毫隔膜——并非我与孟子的浩然之气遥相契合，实在是我从郭老师的身上早已真切感受到这种“气”了！

读本科时，我已决定以哲学为一生志向，不过却一直在中哲西哲之间犹豫未定。听完郭老师、李老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后，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是它了。

该怎么称呼？

大三快结束时，我已经明确获得推免读研究生的资格，而且享有优先选择专业和导师的“特权”。记得当时是在桂园八舍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那时还在用 201 电话卡），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拨了郭老师家的电话。电话接通后，话筒中传来了温暖敦厚的声音——“你好！我是郭齐勇。请问你是哪位？”我恭恭敬敬地称呼道：“郭先生！”然后提出自己希望追随他学习中国哲学的愿望。很幸运，郭老师同意了。从那一时刻开始，心里就觉得只有称郭老师为“先生”，才能表达我对他以及对中国哲学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

跟随郭老师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时时感受着他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自不待言。印象最深的，是 1998 年郭老师和师母应邀到



美国哈佛燕京访学半年。临行前，郭老师多次找我们几位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从读书写文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叮嘱、仔细安排。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郑重拜托同教研室的徐水生、吴根友等老师照顾并督促我们。我是第一次发现郭老师竟然也有“婆婆妈妈”的一面，调侃之余却不知不觉眼眶已经湿润了，他就像一位即将远行的父亲，总是放不下我们这些年幼的子女，宁可啰唆也不愿留遗憾！

后来，我又追随郭老师攻读博士学位，更加体会到他对待学生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老担心学生的科研压力太大，于是制定了不成文的规矩——在每位研究生读书期间，他都会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为学生提供至少一次外出参加正式学术会议的机会。我去郭老师家求教时经常看到的一幕是：他正费尽心力应对各种学术期刊的约稿和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函。之所以如此辛苦，是因为他要多积攒一些学术界的人情人脉，好让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参加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以及向学术期刊推荐学生的论文（当然这些论文都是经过他反复批改审阅且有一定学术水准的）。另一方面，郭老师又担心我们这些学生太过放松而荒废了学业，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必定会给学生安排种种有挑战性的学术任务，鞭策大家进步，甚至连毕业多年的师兄师姐也不放过。无怪乎，很多曾经跟随郭老师学习的同门师兄弟在毕业多年之后，私下闲聊时仍感觉自己还没有毕业！

有不少同门师兄弟称呼郭老师为“恩师”，我很理解。不过，我心目中对郭老师的称呼仍然是“老师”！并非没有感受到他在各个方面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始终觉得：他所给予我们的，已经不是私人性的“恩德”，而是一种精神的指引。中国人讲求“安身立命”，当“安身”（温饱乃至小康）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时，“立命”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立命”的过程中，我们时常会遭逢挫折、遇到诱惑，有时不免迷茫、懈怠，这时候“精神的指引”显得格外重要。对于我而言，郭老师就是我人生路上“精神的指引”，这又岂是一个“恩”字说得尽的？！



郭门？萧门？

几年前，已经毕业多年的师兄弟们私下相聚时，深感有必要加强联系，便于相互砥砺、切磋共进。于是，一位师兄牵头，开始汇总郭老师历年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联系方式，编撰同门通讯录，并冠名“郭门师友通讯录”。编订好的通讯录呈送郭老师审阅，郭老师指着名称非常严肃地说：“什么叫郭门？哪里有什么郭门？我们都是萧门！不光是萧萐父老师门下，我们还是唐明邦老师、李德永老师的门下！”

郭老师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武大的中国哲学学科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整体，萧萐父先生是第一代学科带头人，萧先生气度恢弘，集儒道之真精神于一身，可谓“博大真人”！而唐明邦先生通达洒脱，李德永先生敦厚至诚，是萧先生的左膀右臂。三位先生的人品学品，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协调、互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也深深教育、滋养了武大的中哲学科。后来，萧先生等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培养郭老师担任第二代学科带头人，同为第二代学者的萧汉明、李维武、麻天祥、田文军、徐水生、吕有祥、吴根友等老师均无怨言，和郭老师团结协作，共同建设中国哲学学科。郭老师总是强调，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与长辈的提携关爱，以及同辈师兄弟的无私奉献、支持配合分不开，所以，他坚决反对“郭门”之类的提法，说这种小山头意识会害了整个学科点。可以说，武大的中哲学科点在团结方面一直是国内同行的楷模。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培养研究生上。

我刚读硕士时，有一次和问永宁学长在校园里散步，行至珞珈山庄门口巧遇郭老师。记不清为了什么事情，郭老师抓住问永宁就是一顿猛批，让一向淡定的问学长出了一脑门子的汗。我很是惊讶，要知道问永宁学长当时是跟着徐水生老师读硕士的啊！郭老师训起其他老师指导的学生怎么这么不客气？！郭老师走后，问学长擦了一把汗，对我说：“以后你见多了就不奇怪了，我们中哲都这样！”后来，我发现：在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点，各位老师在



帮助某个学生或者训斥某个学生的时候，从不考虑这是谁的博士生、谁的硕士生，而是毫不客气地都当成自己的学生一样对待！于是，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会和论文答辩会总是刀刀见血，令学生心惊肉跳！

再举个例子。当中哲的某位老师主持召开学术会议，需要学生参与会议服务工作时，向来是本专业的全体研究生总动员，集体参与、点兵点将，大家分工明确、彼此配合，从不论你是谁的学生。久而久之，我经常忘记，某个师兄弟、师姐妹究竟是哪位老师指导的学生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他（她）是我们中哲的。这笔糊涂账算不清，也无需算清。我干脆把这称为“朦胧美”。



2000年6月，武汉大学哲学系（当时还合并在人文学院）中国哲学专业
硕士答辩结束后，中哲教研室老师与参加答辩的同学合影。后排
左一为郭齐勇教授，前排左一为秦平

作者系哲学系1993级校友



我的导师杨代常

何 洋

2007年夏，我徘徊在工作和读博的两条道路之间，怀揣着迷茫在生科院寻找着自己理想中的导师和科研方向，幸运的是遇见了杨代常老师。

初次见到杨老师是在他办公室，给我的印象是谦逊、和蔼。简单介绍之后，杨老师对我即将开展的项目侃侃而谈，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是新奇和吃惊——新奇的是研究的内容，吃惊的是预期的结果。于是，我放弃了其他选择，毅然加入了杨老师的课题组，开始了博士研究生生活。接下来，我用5年的时间经历了一段创造奇迹的历程，同时也见识了这个谦逊和蔼的“老杨”（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我们可以叫他老杨）的激情和勇气、责任和严厉。

进入实验室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实验室的人似乎比其他实验室的人都要忙一些，深夜11点，实验室的灯光依然亮着。除此之外，让我颇为惊讶的还有，杨老师几乎每天也是晚上十点半才回家，早上七点半就来实验室了，比任何研究生都早。他每天都会认真听学生的报告，与学生讨论课题，有时候也会为了一个问题与学生争论。记得杨老师总会在办公室的板子上面密密麻麻写下他这一周的时间安排，同样还会记录下与我们讨论课题的内容。他每次与我们讨论课题的时候总能乐在其中，而他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们，带给我们快乐。

杨老师调侃自己的工作模式是“3N工作方式”：No day and



night, No holiday, No weekend。不分昼夜，不分周末，不分节假日。有人说这个总结过于夸张，但是我知道，杨老师多年来都是恪守这一模式尽心尽力、辛勤耕耘的。

2010年，在我们大试生产时，需要连续3天工作在净化车间里。参与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组，一组白天工作，另一组晚上工作。记得一天凌晨1点左右，我在车间里面测试仪器数据，隐约听到杨老师在问“实验结果怎么样”的话，我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一回头却发现杨老师竟然已经换上了洁净服，正站在我身后询问情况。有一次出差去上海考察设备，飞机晚点到凌晨3点，我已觉得很疲惫，但第二天早上7点，杨老师仍然精神抖擞地把我叫醒去了解实验设备情况——他似乎从不知疲倦。我起初怀疑杨老师是强打精神，后来听同学们说，为了实验材料，杨老师经常半夜赶到海南，第二天一早照旧来田间工作。现在想想，不是导师不觉得累，而是他心中有责任、有梦想、有信念。

就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下，杨老师带领我们创造了“水稻造血”的奇迹——我们研发了从水稻种子高效生产人血清白蛋白的技术，不仅可以缓解我国对该蛋白供不应求的局面，而且解决了血液制品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对传统重组蛋白质生产技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我们证明了水稻种子可生产出充足、廉价，并且安全、有效的人血白蛋白。曾经有人怀疑过我们的研究，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说我们的研究是不可行的——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研究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种种质疑声中，我也曾苦恼疑惑过。杨老师从不质疑，他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技术和研究结果，他的笃定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我们巨大的鼓励。我们的研究结果最终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国内外主要媒体同时报道了这一科研成果，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该项研究项目获得了2013年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优秀专利奖等奖励。

在我们研究的同时，杨老师战略性地成立了武汉禾元生物公司，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如今禾元生物已经成功登陆新三板，市值逾10亿。一路学来，我受益匪浅，感慨感谢之余，更多地是看到了导师兢兢业业的职业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



实验室研究是枯燥乏味的，有时甚至是打击信心的，大多数时候，实验结果和预期是不符合的，我的研究历程也是如此。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09年，我们终于迎来第一次动物实验，我们要证明我们的样品可以治疗肝硬化腹水大鼠，我们加班加点、千辛万苦地制备了一批样品，满怀希望地送给了医学院的合作者，然而送去的第二天就传来了噩耗——合作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们的样品不行，注射之后有一部分老鼠死了。杨老师也得知了实验结果，看到我的一脸疑惑，他平静地和我分析讨论了对策，最后安慰了我一句：没什么，实验失败是正常现象，我们按照新方案再制备一批更纯的试试。

经过改进，我们提供的样品可以进行动物实验了，经过三个月的动物实验，合作者反馈给了我们实验结果：60%的大鼠死于样品治疗，仅有20只的数据可以用。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沮丧，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去分析这些数据了，只是将这个“噩耗”告诉了杨老师，然后将数据发给了他。第二天早上8点，杨老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数据，他激动地告诉我，我们的样品治疗效果很好。我很意外，心想老师是不是受不了打击，拒绝接受这样的实验结果。后经过分析，证实我们的样品确有治疗效果，但我却不如杨老师那般乐观。杨老师仍然平静乐观地鼓励我继续改进，再做一次，激情满满地期待着下一次的实验结果。说实话，我再也不敢期待动物实验的结果了，甚至还有一点怕。

几个月以后，我们得到了新的样品，再次送给了合作者，但是这次合作的老师拒绝了，理由是样品毒性太大，浪费大鼠，他们再也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个实验上面了。杨老师听说之后，立即前往合作试验室讨论方案，让合作者重拾信心。尽管如此，合作者依旧坚持说如果这次失败了就不会继续了。几个月后的实验结果反馈回来，和我们预期的一模一样，证实了我们的研究是正确可行的。于是我们终于又可以信心百倍地开始后面的研究了。

回想起来，假若没有杨老师的乐观和激情，我或许早已被不尽如人意的实验结果打击得止步不前了。我也曾怀疑过杨老师的乐观是不是一种偏执，参加工作之后，才体会到杨老师并不是盲目乐



观，而是审时度势。不论结果如何，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这是科研人员的一种必备素质，就如我们调侃的：实验虐我千百遍，我待实验如初恋。然而，作为导师，我想杨老师乐观的意义，更多地是给学生鼓励和信心吧。

杨老师的严厉也让我终生难忘——他要求认真做好实验笔记，毕业时严格检查实验记录；他要求实验桌面整洁无杂物，每周按时总结实验结果；他要求论文写作规范，实验严禁造假；他要求……杨老师似乎要求很多，那个时候的我有时真的不理解，印象最深的是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

2011 年我开始撰写毕业论文，着急答辩的我匆匆写完后就发给杨老师修改。本以为杨老师会欣赏我写论文速度如此之快，谁知第二天却接到杨老师的电话，他说：“你毕业论文的错误太多，请仔细修改之后再发给我。”我不以为意，觉得导师是故意为难拖延。我满腹抱怨地开始修改，后来真的发现了很多错误，抱怨变成了愧疚——竟然错了这么多！随着越来越多的错误逐渐被发现，我的愧疚最后渐渐变成了庆幸——幸好没有送审，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我改完之后，杨老师又耐心仔细地帮我修改，检查每一个数据是否正确、每一句话表述是否完整、英文对照是否正确，甚至检查到了每一个词、每一个字的错误，毫不夸张。就这样，我反反复复修改了三四遍，最后终于达到了他的要求。正是得益于杨老师这似乎“不通情理”的严厉和一丝不苟，我的毕业论文才获得了 2012 年 Eli Lilly 亚洲优秀博士论文奖，也为我的独立科研生涯打下了基础。

如今，已经参加工作的我，对导师的认识更加深刻，对他的心胸气度和责任感更有体会，也更加敬佩；导师的勇气和智慧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鼓舞着我。已经年逾花甲的杨老师依旧昂首迈步在创业的道路上，充满传奇的他也必将创造新的奇迹。

言有物，行有恒，老骥雄心，志在千里，导师风范，永照吾心。

（选自《我的武大老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系生命科学院 2007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热衷于“探索”的大卫·佩里教授

陈 超

下午的课在外文系，进门右转，102 教室。

选这门课的同学都到了，1983、1984 级的研究生，加旁听生，一共不到 10 人。大家安安静静，互不打扰，各自沉思或发呆。



建校初期的文学院，1977 级在校时的外文系(照片出自 1933 年的《国立武汉大学建筑摄影集》)



还有两三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大卫·佩里（David Perry）教授走进教室。他似靠非靠地站在讲台左侧，低头专注地看着手里的讲稿。

“*Who's there?*”

突然，教授大跨步一个后跳，掩身讲台后，惊疑地冲着半开半闭的门，再次问道：“*Who's there?*”

同学们屏住了呼吸，所有的眼睛都望向旁边半开、半闭着的教室门。一秒钟过去了，两秒钟过去了，三秒、四秒……



上课时坐的椅子

就这样，一句突如其来的惊问：“*Who's there?*”佩里教授把我们带进了英国戏剧，进入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句惊问也把我带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高深”的学问可以这样传授和分享。多少年后，我在哈佛大学工作时，上了一堂培训课，正是《教学与表演》。

讲台就是大卫·佩里教授的舞台。他是在传授知识，更是在施展才情。在工作中、在生活里，大卫·佩里永远都不乏味不枯燥。

1930年4月2日，大卫·佩里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小镇西田出



生。他的外祖父毕业于圣彼得堡艺术学院，被俄国皇室尼古拉二世封为宫廷肖像画师，外祖父并未因此止步，他继续求学于慕尼黑、巴黎、伦敦，师从本杰明·康斯坦、让·保罗·劳伦、詹姆斯·惠斯勒，成为当时最受赞誉的肖像画家之一，其所作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肖像现今收藏在美国史密森安博物馆的国家肖像画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祖父投笔从戎，追随钢琴演奏家帕德雷夫斯基，为波兰独立而战。

大卫·佩里在一口气读完哥伦比亚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之后，31岁即任教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年纪轻轻，一切顺遂。

也许是遗传了外祖父不安于现状的个性，1975年，佩里教授告假西蒙斯学院，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二次读研，他的学术兴趣是神话，（先古）众神起源，（先古祭祀）礼仪流传。面对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同学，佩里并非没有忐忑，却仍和其他同学一样上课、写论文、考试，和同学们一样“挥汗如雨”。“我可不是以教授的身份来蜻蜓点水的。”他说。

1977年夏，佩里教授踏上了以色列的土地，亲临赫兹利亚考古现场：

我在寻觅那些（神话）想象的源头。我认为应该是起源于青铜时代。今人可以辨识的，形成于那个时期的图案和符号——先人想象力的实证——后来就在圣经、古希腊神话中重现。

大卫·佩里告诉学生们：对自己热衷的事物，一定要拿出时间去探索。

正是这份热烈、执着不休的探索把大卫·佩里带到了中国武汉，带到了珞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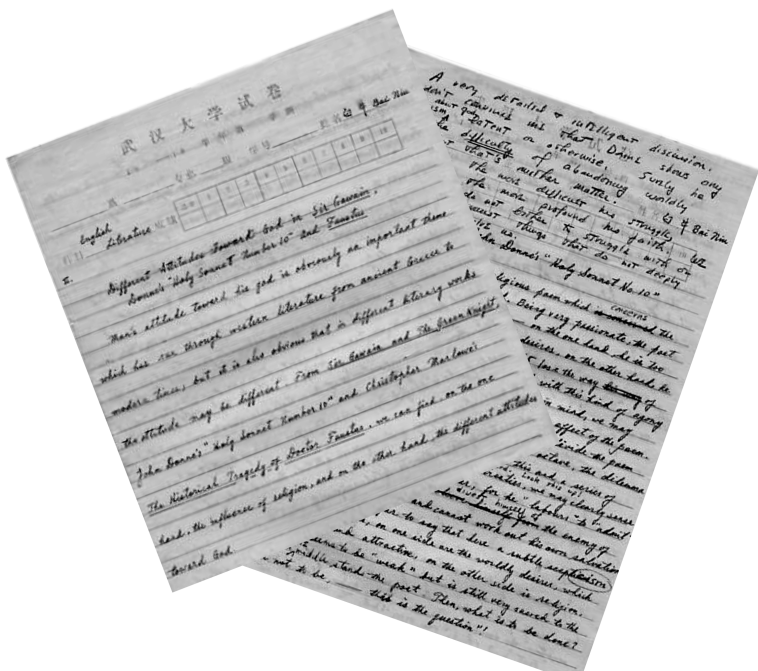
1983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武大与外国高校开展交换教授项目，佩里教授从西蒙斯学院来到东湖畔、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改革开放的朝气，莘莘学子强烈的求知欲，感动、吸引了教授，一



年交换期满后，佩里教授继续签约，前后在珞珈山教书近 10 个年头。

1988 年，大卫·佩里教授从西蒙斯学院提前退休，全心全意在武大教学；1992 年，他决定留居中国，成为当时为数不多在中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士；1994 年，他获得湖北省首届“编钟奖”，及“武汉市荣誉市民”称号。

1993 年在校的校友们或许记得，当年的 5 月 14—16 日，武大主办了“武汉国际莎学研讨会”，引起了国内外莎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佩里教授不仅为此次研讨会撰写论文《仲夏夜之梦》和《暴风雨：前后的连贯》（程雪猛译），还亲自担任导演，指导武大英语系学生出演《仲夏夜之梦》及《皆大欢喜》两剧的片段。莎学专家孟宪强先生在《中国莎学简史》中记录了这两场武大学生的莎剧创作：“不仅英语水平很好，而且在艺术处理上也很有特色，获得好评。”





照片由张汉斌提供

大卫·佩里长眠于武汉洪山区石门峰纪念公园。

2021年，清明时节，珞珈山的老朋友瑶瑶(卢平瑶)、张汉斌专程代我们扫墓，敬献红烛、黄菊。

作者系外文系 1977 级校友



回忆关文发教授在武大工作的日子

李龙章

关文发先生是当代著名明清史专家，在学界拥有很好的口碑，他的崇高品格和学术建树受到学界同行的尊敬。关先生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武大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负责人、武大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分会主席、湖北省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对武大历史系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和学科发展贡献良多。今年是关文发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关先生的敬意和缅怀。



关文发先生 1987 年在武汉大学

—

我于 1976 年从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武大历史系任教。还记得第一次与关先生认识的过程，一次因看门诊与



武大医院一位会说粤语的牙医相识，出于感谢，我到该医生家中造访，交谈中得知其邻居关文发先生也是历史系的，并且也是广东人，顿时兴奋起来。与关先生见面后，他用粤语表示了欢迎，还仔细询问我的住处，家具添置齐否、在哪开伙、衣服被子够不够等，并介绍了武大历史系的情况及武大的环境。从交谈中我看出关先生是位很真诚和善的长者，他身上有一种魅力，让我这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深受吸引。临走时关先生把我送出门，让我有空就去做客。这次偶遇使我与关先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友谊，印象深刻难忘。

自此以后，逢年过节我必定到关先生家走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7年元旦中午，汉华（关文发之子）到桂园八舍来叫我到他家吃饭，原来梁师母做了很多美味的肉丸子（那年头吃肉凭票，能吃上一次肉丸子很不容易）。是日天色晦暗，气温大寒，和先生一家围坐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吃饭倍觉暖和舒适。眼看窗外天色越来越差，梁老师说：“看样子要下雪了。”我回答：“下雪好啊，我还没见过下雪呢。”说话间，屋顶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只见窗外有细密的白色颗粒飘过，我有种莫名的快感：“好大的雪啊！”关先生说：“这像撒盐不算大，真正大雪是鹅毛大雪，那要下得没脚深。”不一会儿天降大雪，很快把前面房子的屋顶、窗台变得一片银白。关先生望着穿着单薄衣服的我，似乎看出了我的担心，安慰说：“下雪不冷，融雪才冷，你若没有棉衣，从我这里拿一件穿吧。”我谢过关先生的好意，表示已备有，只是今天走得急没穿。这次新年午餐让我想起东晋谢安府上的议雪，面对同样的雪景谢府是即景赋诗咏雪，而我在关府则是从身心都得到温暖。

饭后小坐闲叙，我其时已接受给1976级考古班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的任务，但备课一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抓起，特意请教关先生。他表示对考古并不擅长，谈不上给具体意见，但从治学备课的角度看，要掌握好专与博的关系。先应熟悉专业教材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这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相关的史料、历史地理知识、民族学知识等也需要了解，只有知识面宽了才能更专、上课讲授才能收放自如；要先读必要的史料，在读懂读通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他还建议我把《史记》前部分的《五帝本纪》等章节先读，然



后再读其他典籍。关先生的点拨让我豁然开朗，其后我的备课就是沿此方法的。经过1978年上学期的授课，我这个教学新兵得到了系领导和学生的一致肯定。

二

“文革”结束后，中断了十多年的全国高考恢复了，这是一件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也给耽误了青春的“老三届”带来难得的机遇，引起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然而要做好全国高考工作，第一关就是把好命题关，若考题出现差错，其影响之大与影响之坏实难估计，故对命题组成员的选聘必须十分审慎，容不得半点闪失。1980年，教育部聘请关先生担任全国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组组长，赴京主持这项既神秘又艰巨的工作，命题组成员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包括南京大学方之光、山东大学孟祥才、人民教育出版社李纯武等。命题组首先要熟悉和掌握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其次对1977—1979年的试卷进行分析研究；再次确定题型及分数；最后根据规定的中外历史分配比例，从历史教科书中选择出题型的条目。出好甲乙两套试卷后，还要对每道试题逐一打磨，检查是否超出教学大纲的范围以及教材的覆盖面等。命题是一项学术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绝不能出半点差错，包括标点符号，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在关先生的主持下，命题组成员经过20多天有条不紊、齐心协力的紧张工作，进展顺利，试题上报后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也充分展示了关先生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

20世纪80年代是武大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校长是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乘着思想解放的改革春风，刘校长在武大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新政，武大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关先生担任历史系主任后，着重抓了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和提升科研水平以及图书资料的建设，成绩斐然，影响巨大，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武大历史系地位，在全国高校历史系中仅次于北大，处于领先地位。在具体学科上，又以唐长孺先生领导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吴



于廪先生领导的“世界史”研究所在全国史学界地位最为显赫，就连我们这个新办的考古专业到了 80 年代中后期也都人才济济、小有名气。

感触最深的是，以关先生为首的系领导对学生教育的不遗余力。我曾当过 1985 级博物馆班学生的导师，这虽然只是个大专班，但从系领导到专业领导都是倾尽全力加以培养。除了常规课程，还专门聘请了全国有名的考古学、博物馆学、民族学方面的专家来武大讲课，包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文物鉴定泰斗史树青、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中国青铜器专家李先登、中国农业考古开创人陈文华等。在最后一学期还将全班送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实习，请著名博物馆学专家石志廉授课指导，所以这个大专班也出了不少人才，国内考古界后起之秀张桂莲、许道胜、刘新等就是出自此班。

以往历史系资料室的图书资料在武大文科各系中是最丰富的，资料员配备也很整齐。“文革”后人员有点青黄不接，图书资料添置缓慢。关先生当系主任初期，主管文科的一位副校长曾想用行政命令将历史系、中文系资料室合并，如果这一做法实施，历史系将失去独具特色的图书资料阵地，对教学科研影响巨大。为了保存历史系资料室，关先生找到刘校长反映情况、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历史系资料室。此后关先生更关注资料室的建设，一方面从武大图书情报系遴选优秀毕业生到资料室担当骨干；另一方面利用有限的划拨经费加强图书资料购进，特别是与校图书馆、省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单位合作，联合举办“港台学术图书展”，并借此机会增添了大批“文库式”港台学术著作，使得历史系资料室的港台学术资料一时成为中南地区高校历史系之最。这批学术资料也为我们的考古科研提供了极大便利，过去无法读到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济、董作宾、石璋如、劳幹、周法高等大师的考古学及古文字著作，在这里都能看到。我离开武大后，因撰写《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一书，有些资料在广东查不到，还回到武大，利用系资料室的便利条件帮助完成。

从我 1976 年到武大报到起，历史系一直在桂园操场旁的工农



楼办公，这是一座“大跃进”时期由武大师生自己动手用土法烧出的砖建造的三层高的“火柴盒”，外观简陋、质量甚差，有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和中文系等共用。由于责任不明确，这座楼的维护和保养长期以来欠佳，外墙基础处有长长的裂缝，缝隙中透出红砖；至于内墙和天花板更是粗糙，很多地方的批灰已剥落，裸露出简陋的水泥预制板，走廊的水泥地面也是坑洼不平。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文系迁出，这座危楼就为历史系专用，同时还要帮历史系承担全校最重的中外学者接待任务。关先生上任后频频与校领导商量解决方案，在提出的“搬迁”“改建”等方案都无着落后，关先生向刘校长提出“抗议”，并表示若问题得不到解决，历史系将不再承担接待外宾任务。刘校长了解情况后，随即批示了工农楼改造方案——加固楼宇的基础和承重，里外墙和天花板地板重新批荡找平粉刷油漆。经过半年的精心施工，到9月份开学时，工农楼面貌已焕然一新，使教学、科研和接待环境大为改善。而对楼板承重威胁最大的图书资料室则搬到一楼，历史文物标本室扩大后放到三楼北侧的房间，总面积达400平方米，除原有收藏品外，新增加了不少武大考古专业师生外出考古征集回来的各时期的文物标本，文物总数达1000余件，接待了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

在教学工作中，关先生对我们这些一线教师也给予了不少支持和帮助，举一件难忘的事例：1986年秋，我和同事承担了带1984级考古班学生田野考古实习的教学任务，选定在湖北麻城栗山岗遗址开探方发掘。系里很重视此次实习，特地在紧张的教学经费中划拨了专项经费。当地麻城博物馆起初也是支持和配合发掘工作的，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在费用开支和相互配合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双方逐渐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摩擦。我们于是决定发掘结束后不在当地搞后期资料整理，全部发掘资料撤回武大整理，但麻城方面坚决不同意。为此事，教研室主任肖亢达老师和我多次与麻城文化局、宣传部交涉都无果。我们又找到湖北省文化厅文物处，请省里出面疏通调解，也没效果，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考虑到此事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学生的后期实习，关先生听取我们的汇报后，提议不妨请麻城的领导来学校商量解决。听到武大方面的提议后，麻城方面便



派了宣传部宋副部长及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博物馆正副馆长等一起来武大商量解决问题。我系则由关主任、张荣凡书记出面接待，肖老师和我作陪。在商量的过程中，关主任首先肯定了麻城方面在武大师生考古实习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并表示了感谢，然后强调了学生在后期进行资料整理实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后期实习顺利完成的几个必要条件，包括场地、住宿、伙食、必要的整理修复技工和工具、材料要有保证等，如果能满足以上条件，其实在哪整理资料并不重要。宋副部长见关主任态度真诚、待人诚恳，立即表示只要后期整理仍在麻城进行，麻城方面一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麻城文化局领导和博物馆馆长见领导已表态，就给出了具体的配套方案，事情终获圆满解决。此后武大考古班师生的后期实习顺利完成，这次实习成果《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湖北麻城栗山岗战国秦汉墓清理简报》很快发表在《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和《考古》1990年第11期上。而通过后期整理修复出来的几百件文物也通过友好协商，由麻城博物馆、黄冈地区博物馆和武大历史系三家平分，这些发掘文物随后都成为历史系考古标本室重要的展品。

1985年，国家教委聘请关先生担任“全国高等院校历史专业教学改革调研组南方片（华东、中南、西南）”组长；北方片（华北、东北、西北）组长则由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担任。为什么教委要进行这次重要调研，原因是受“文革”影响，历史学在“文革”后迅速“降温”，甚至成为高校冷门专业，考生不愿报读，在校生无心向学，老师盼望跳槽，再不改革将是“死路一条”。接到国家教委任命后，我系兵分三路进行调研工作，关先生带队先后到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湖南师大进行调研，既了解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广泛听取他们对专业改革的建议和希望，再综合华东、西南的调研情况，确定专业改革应从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着手，本科课程应拓宽口径，扩大知识面，使学生毕业时能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事实证明，这些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若从事编辑、记者、文秘、公务员等工作，并不比其他专业的毕业生差，甚至还具有知识面广、根基扎实、逻辑性强等优势，考生的选报率亦



明显上升，至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口径，则应适当收窄，这将有利于“专才”培养。总之通过这次调研，为国家教委对高校的历史专业分不同层次进行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作者与关文发教授合影

三

关先生于1988年夏调到华南师大工作，担任该校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等职，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也于1989年调回广东文博系统工作，之后我们也常有联系，时而上门看望关先生并请教一些学术问题。

2016年年初，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与关先生较长时间没见面了，非常挂念。本打算春节期间到广州探望关、梁两位老师，给二老拜年。不料年三十晚突发胃出血，被送进医院急诊病房留医，这一住便是半个月。等病情稳定回到家没几天，却突然接到汉华发来的信息，说关先生已于2月23日病逝并已经办完后事。听到消息，我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充满了难过与懊悔。我为失去



几十年来亦师亦友的关先生感到难过，更为因错失时机未能见到关先生最后一面感到无比沮丧！3月6日，我和夫人专程到广州关府拜祭，面对关先生慈祥的遗像焚起三炷香。愿先生在天国一切安好！

作者 1976—1989 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



珞珈琐忆

罗长超

离开武汉大学不觉已半个多世纪。回忆在珞珈山求学的5年时光，有过太多不能忘怀的人和事；特别是有一些生活碎片，比如不经意间回眸所见、校园小径和老师邂逅时的三言两语、向老教授的一次请益等，随着年轮的飘转不仅没有模糊，反而愈加清晰；好多年以后，还不时如电影特写镜头一样在眼前浮现，还能引起心灵的悸动，进而引发对人生的思考、灵魂的净化。

教授、牧牛人、资料员——宠辱不惊程千帆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一天下午，我从校图书馆回学生九舍，走近新四区操场，不经意一瞥，发现操场边的草地上一头水牛正悠闲地啃着青草，旁边一位不高微胖的人头戴竹笠、手持竹杖，牵着牛绳，牛行他行、牛停他也站住，面对来来往往行人的注视，包括一些人的白眼与鄙视，泰然自若、一脸平静，俨然正享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式的悠闲。

我知道他是中文系的教授程千帆。一进校就听高年级学长讲，程教授在古代文史学方面造诣颇深，在武大任教多年，由副教授而至教授，还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不幸在反右斗争中被发配到农场劳动，长期被剥夺了从事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大概是我们进校的第二年吧，程教授被安排在中文系资料室担任管理员，因为



查资料借书，我去过几次资料室，看见他不是默默地整理图书卡片，就是专注地阅读，一脸平静，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许多年以后，我在浏览网上新闻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蓦然闯进眼帘：程千帆。细读之下，才知道程先生在“文革”结束后进入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果，在校讎学、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均有杰出成就。代表著作有《校讎广义》《史通笺记》《文论十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闲堂文薮》《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等，是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是公认的国学大师。程先生虽经十多年磨难，尽管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摧残，但是他的斗志并没有被泯灭，恢复自由之身后又深耕于古典文学史学的莽原之中。每当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我就会想到他在操场牧牛的画面，不禁总会想起郑板桥笔下“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岩竹！“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的不就是程先生这样的人吗！

学生九舍、填词、改词——诲人不倦祖蔡老

忆起程先生，自然就想起了他的老伴，当年同在武大任教的沈祖棻教授。

沈先生有“江南才女”“当代李清照”之美誉。1932年春天，她创作的一阙《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长的汪东拍案叫绝。沈祖棻在词坛由此赢得“沈斜阳”的别号。

沈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颇有建树，出版有《微波辞》《涉江词稿》《涉江诗稿》等。程千帆在《宋词赏析》（台湾版）的《后记》中称沈祖棻：“首先是一位诗人、作家，其次才是一位学者、教授。她写短篇小说、写新诗和旧诗，主要的写词，这是她的事业，而教文



学则只是她的职业。”作为一位爱国词人，沈祖棻受到了极高的评价，朱光潜题诗云：“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经离乱多忧患，古今一例以诗鸣。”陈永正致函程千帆时甚至说：“时人每谓涉江为易安而后一人。窃以为其才情之富，学养之深，题材之广，似更凌而上之，谓为千古以来第一女词人亦无不可。”

“文革”中，军宣队进驻学校，每天组织师生政治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我们这些学生得以同以前令我们不敢仰视的名教授朝夕相处。在学习之余，每逢重大政治活动，我们都会以中文系学生喜爱的方式去庆贺颂扬。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际，全体师生都为政治生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而欢欣鼓舞，利用各种形式谈体会搞宣传，当然也免不了写诗填词。记得沈先生填了一阕词，到底是大家手笔，虽是应景之作，却也韵味十足、佳句频出。我也依“沁园春”词谱学着填了一首，自觉不错。当时我们班正在学生九舍房间里分组学习讨论，沈先生也参加了。趁学习间歇我将习作送沈先生请她指点。她认真看过，沉思有顷，便提笔把词句中几个字调换了一下位置，有的句子改动了一两个字，再读沈先生改动过的词，顿觉韵味已大有不同，比自己原来写的不知高明了多少。我嘴上不敢恭维，心里实际上佩服得紧。遗憾的是，经沈先生修改过的习作未能保存下来；更惭愧地是，沈先生的学问我也未能真正入门。

廊道、矮凳、昏灯——孜孜以求夏老师

夏老师叫夏涿，是当时武大中文系很有业务发展潜力的中青年教师之一。

我认识夏老师，其实是在批斗会上。1969年，军宣队进驻学校，平时除了政治学习，就是隔三差五地召开各种大型中型小型批斗会。对本系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进行批判斗争。新中国建立前，夏涿是杭州一中的学生，抗战流亡到四川，毕业于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参加过爱国学生运



动和进步文艺工作，主编《诗激流》，出版过诗集《钟声》。就因为他在重庆的这段活动历史，被指有中统特务嫌疑而不断受到调查批斗。

斗转星移。一晃，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过去半个世纪。夏涑先生苦尽甘来，重新活跃于教坛且卓有成效，对武汉大学古文字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著作有《评康殷古文字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古文字演变趣谈》（文物出版社，2009）、《文字学概论》（夏涑著，肖毅整理，线装书局，2009）等。

写到这里，《警世贤文》中一句几乎世人皆知的励志诗句跳出我的脑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想，夏涑老师经受住艰苦砥砺冰封雪冻，终于迎来了灿烂时光，利剑出鞘宝光耀眼，寒梅绽放香飘万里。

古寺、疏林、书声朗——学无止境詹伯慧

在襄阳县城西约 13 公里处，有一所禅寺。寺内殿宇林立，古树参天，苔藓匝地。寺外一条小溪环绕流过。四周山岚拱峙，田园散布，林木扶疏，鸟语花香，异常幽静。广德寺正门的对联：“地接隆中，鸢岭千峰云叠嶂；塔悬汉上，虎溪一派水环流。”道尽了该寺的山形水胜。

“文革”初期，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几百名师生背着背包住进广德寺，开门办学。那时，除了增加批判“三家村”的内容，正常的教学活动仍旧照常进行。白天教学讨论，晚上到附近农村访贫问苦，教村民识字唱歌跳舞。周末，在寺内多宝塔墙面上挂上一片银幕和村民们一起看电影。每天清晨洗漱后早饭前，我们都分散在寺外的小树林里自习外语。自此开始，这里除了鸟鸣虫叫还多了一阵阵诵读外语的嗡嗡声。我和同学们一样，蹀躞在溪畔林间念念叨叨，读着俄语。不时也东张西望思想上开点小差。不经意间，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一人正来回踱步，捧着书神情专注地念着。仔细一看，原来是教我们写作课的詹伯慧老师。我很奇怪：我们拼命地背



外语，是因为要考试，老师不再需要应付考试了，还那么起劲地背外语干什么？

詹老师我熟悉。当时武大中文系有“五老八中”之说，说的是五位最有名望的老教授和八位发展前途最好的中年教师。詹老师就是八中之一。关于这些老师的背景、实力，在学生中自然是口口相传。詹老师出生在广东潮州，家学渊源，其父人称“岭南词宗”，府上常常是“谈笑有鸿儒”，詹老师自小在旁聆听，深受熏陶。给他带来最深刻影响的是家中常客王力、岑麒祥等语言学教授。从他们跟其父亲的交谈中，詹老师逐步对语言学研究有所认识并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入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毕业后分配至武大任教。

我上武大后写的第一篇作文就是他阅评的。我满怀激情地运用自以为很美的戏剧语言完成了第一篇写作作业，自信满满。不想詹老师批改时给了我当头一棒，告诉我文字要重思想重内涵、朴实准确，不要华而不实，这着实让我清醒了不少。因为作文评改的交流，在我的所有任教老师中，我与他最亲近。早自习结束时，我赶紧跑到詹老师身边和他攀谈起来。詹老师告诉我，英语是他掌握的第一外语，现在他正在学习第二外语——俄语；他还说，语言是获取知识的工具，学得越精越好。听了他的话，我不觉满面赧然，对他更敬重了。

开门办学结束回到学校，“文革”拉开序幕。詹老师因为日记内容，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光阴荏苒，大学时光匆匆而过。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詹老师，只是从校友口中、从网络上，获得了詹老师的一些消息。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詹老师在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拓荒”不止，坚持不懈，成果丰硕，著作等身。迄今已刊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他曾作为骨干成员之一参与编纂国家“重典”——《汉语大字典》，还以80多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这



部词典上下两卷总计 465 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汉语方言和方言学面貌的百科性辞书，历经多年努力，于 2017 年下半年正式出版。

我为能在武大度过难忘的五年求学生活而感到幸运！为我的老师们受尽磨难终于创造辉煌而骄傲！为受教于这些国学大师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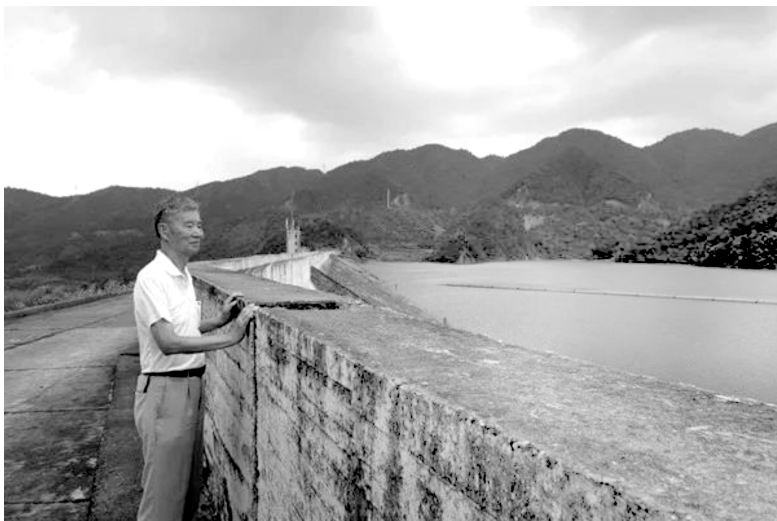
作者系中文系 1965 级校友



父亲的武大时光

朱晓霞

1953年6月，父亲高中毕业于湖南省岳阳市一中。同年考入武汉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从岳阳楼旁来到黄鹤楼下。



父亲在柘林大坝，本文作者摄于2015年

在大多数对武大的介绍中都有这样一句话：全中国最美的大学之一。在父亲这儿，武大就是“最美”的，没有“之一”。景色清丽的珞珈山，烟波浩渺的东湖，落英缤纷的樱花树……是父亲晚年最



难忘的记忆。

在父亲的讲述中，珞珈山上的武大以沟为界，一边是教学区，一边是宿舍区。彼时的樱顶宿舍，被称为“武汉的布达拉宫”。三栋蓝色琉璃瓦建筑、十六个门洞以《千字文》开篇十六个字命名：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父亲住在张字斋。每间宿舍住两人，很是舒适。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窦文涛的话印证了父亲的回忆，他说：“我这辈子最好的住处是在武大樱顶。”他还说：“武大是最漂亮的大学，四季有花，我读书时学校没有围墙，就在山水之间。”

父亲就读的土木工程专业共 90 多人，分 4 个小班，每个小班 25 人左右。父亲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每天穿过宿舍楼下的樱花大道，走向对面山坡上的教室。父亲说，那时有人主张把樱花树砍掉，说那是日本人栽种的，但最后樱花树还是保留下来了，因为“樱花树本身没有错”。

珞珈山背面是教工宿舍——著名的“十八栋”。我每次去武汉，父亲除了叮嘱我一定要看看樱顶上的老图书馆，还总要提到：“那里还有个十八栋，是很值得去看看的。”十八栋是著名的教授楼，曾经住过很多名人。父亲念念不忘的恩师叫俞忽——中国结构力学专家，他不仅是父亲就读武大时的老师，也是之后从武大独立出去的武汉水利学院的老师，他在武水一直教父亲那个专业的“建筑力学”。

2016 年 5 月，我随丈夫返乡途经武汉，游览了整座武大校园。适逢雨季，珞珈山满目葱郁，我寻觅着父亲的足迹。遗憾的是，那时的樱顶宿舍（老斋舍）正在修缮，我们没能进去把父亲住过的“张字斋”好好看看，但我找到了十八栋。我踩着满地苍翠，在十八栋的某一栋前留下了自己的背影。下山后，我们在桂园学生食堂享受了丰盛美味的一餐。父亲读大学时学杂费全免，生活费却是要自己负担的。当时的武大有两个学生食堂，我问哪个更好些，他说：“都好。都有辣椒吃。食堂的早餐是馒头配白粥，有咸菜。”我说那岂不是太简单了吗？父亲说：“武大六一亭旁的那条路上有一排小吃店，可以到那里买东西吃。”父亲来自农家，大概是不会去小吃



店加餐的，自然是“有辣椒吃就好”了。

那个年代上大学并不轻松，四门不及格会被退学。班上有学习小组，同学间互帮互助；班上没有班主任和辅导员，班长责任重大，班上的一切问题由班长负责向学校办公室汇报。教主科“水力学”的教授叫姚琢之，对学生要求严格，学业退步的学生他还会亲自找去谈话。由于功课紧张，基本没有时间逛街。父亲谈到武汉时永远都是谈武大，对武大之外的这座大城市并不了解。

1954年，武大部分专业独立出去，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父亲从珞珈山上搬到了珞珈山下，从琉璃瓦房搬到了“毫无特色”的砖瓦房。两相对比，父亲谈到武水的建筑时心情是失落的。好在两校之间并没有建起隔墙，只以山坡为界，山上是武大，山下是武水。武水的学生还是常跑到珞珈山上探望老乡和留在武大的老同学，尤其是下午放学后锻炼身体时，两所大学的学生都在樱花大道上跑步，在运动场上打球，去校门外的东湖游泳。父亲喜欢打篮球，偌大个东湖就在校门外，他却不太会游泳。

武水刚成立不久，这些未来的水利工程师们就在抗洪第一线上上了一堂实践课。当时，长江中下游遭遇百年来最大洪水，全线告急，武汉30万人参加抗洪，武汉的大学生都上了抗洪第一线。大学生与解放军战士一起，将汽车运过来的土或用板车拉或用担子挑到大堤上，父亲是挑担最多的学生之一。他说：“我们这些农村来的，从小做惯了体力活，这个时候就有用多了。”毛主席曾为武汉市战胜1954年洪水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这对于刚成立的武汉水利学院师生来说，任重而道远。

毕业那年，为了支援江西的水利建设，父亲他们整个年级奔赴江西实习。一到江西，便被安排到抚州等几个县的水库工地看地形，设计大小水坝。三个月实习期满，全体实习学生在南昌集合，准备返回学校写毕业论文。当时，江西的水利建设正需要技术力量，江西省委书记去北京开会时，直接找周总理要这些大学生。于是，父亲和他的同学们被留在了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他们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毕业证都是由学校随后寄到工作单位的。



1958年，父亲与20多位同学去了江口水电站，这是父亲参与设计的第一座水电站。此后，他们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在荒山野岭里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大型水库。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出差是常事，幼小的我也跟着父母去过罗湾、柘林两处水库建设工地。因为父母要下工地，设计院的很多孩子都是在故乡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家里长大的。

让父亲这批人倾注心血最多的当数柘林水库。这是个土坝库，容量是全国土坝水库之最、亚洲第二。2015年8月，我们陪年迈的父亲回柘林。小镇清幽宁静，当年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已封存于历史的尘埃中。指给我们看了母亲参与设计的溢洪道后，父亲走到了主坝上，抚摸着大坝久久无语。下了大坝之后，我们又带父亲去观看了水库宽阔的水面，它现在已是国家4A级风景区，叫“庐山西海”。

2000年，武水重新回归武汉大学，父亲所在的院系改称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满头白发的父亲知晓后，颇为动情地说：“哦，又回去了，又回去了。”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53级校友朱本堤女儿



在武大学习生活的几点记忆

刘寒冰

一、报到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那是1972年4月初（笔者这一届为特殊招生，提前三个月进校进行劳动锻炼），三个星期后的4月27日我即将满18岁。爸爸说，家里出了第二代大学生是大事，他跟妈妈加上9岁的弟弟全家出动，一起送我去学校。

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绿色旧皮箱，一个装满棉被的大袋子，一个放日用品的手提包。这个皮箱可是传家宝，当年陪着爸爸读了6年的同济医学院，现在又跟着我进入武汉大学。

校园里空气非常新鲜，空气中还有一丝丝凉意；阳光穿过一层层的树叶洒在我们脸上，印下淡淡的投影。道路两旁的树木是如此高大，我抬头时几乎要向后倒下去才能看到树顶。树木在风中沙沙地响着，好像在跟我打招呼：“欢迎你，刘寒冰！”

那年，我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生长在黄石市郊区的一个小镇上，整个世界只有家、学校及一个杂货市场、一个小照相馆、一个理发店，还有一个只出售两种饼干的商店。我对武大校园里的一切都着迷：高大的树木，美轮美奂的建筑，林木间的山道……

老斋舍通往外文系的台阶一层又一层、一层连着一层，令人咋



舌。“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要爬山坡和上台阶了，尽情享受吧！有益于锻炼腿部肌肉。”爸爸笑着对我说。他跟妈妈和弟弟当天下午回黄石，当他们向我挥手道别时，我屏着气努力不哭出声，不想让爸妈看见我的眼泪。“寒冰，将来你只是回家作作客，临时看看我们，再不会在家里长住了。”多年来，我一直记得爸爸的这句话，从这一刻起，我体会到了与亲人离别和思念的意义。

那天，我独自一人留在了这个陌生而又广阔的校园里，忐忑不安。唯一熟悉的是那个绿色的旧皮箱，临走前妈妈把它放在宿舍的床上。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还好四周没人，我不想被新同学看见，认为自己是个爱哭鬼。但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每周都写信回家，边擦眼泪边写，眼泪有时就滴落在墨字上，斑斑点点。我知道妈妈会看到信纸上这些泪痕的，尽管不愿意在爸妈面前掉眼泪，心中又暗暗希望妈妈能在信中看出我对家的思念。

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吗？下定决心努力去做一件事，当翘首盼望的时刻到来时却又失去了所有的勇气，那就是17岁的我。未上大学时一心想离开家，去上大学、去寻找自由，但真正踏入大学校园后，却变得不知所措，六神无主……

好在第二天宿舍里的另外五个女孩都来了，我再也没有时间顾影自怜。第一个月住的是新生临时宿舍，每天早上6个人几乎都在同一时间起床。哪怕睡意正浓，只要听见有人在穿衣服，其他人也迷迷糊糊地马上起来，有人扫地，有人去锅炉房打开水，然后一起去食堂吃饭……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我学会了与他人分享食物、衣服、生活空间，也收获了终身难忘的姐妹情谊。

入学第一个月是课外非学术日程安排，我们每天排着队，高唱进行曲去学校的农场帮忙插秧。第一个月过去以后，分班时间到了。

经过英语水平测试，我被安排在二班。班上有20位学生，有些同学入校时英语水平已经不错了，比如车英和李中子，能做自我介绍、能与老师进行简单对话，甚至还能用英语开开玩笑。而我，除了朗读高中的英语课本外，就是个哑巴和聋子。



一生中，如果有让我感到渺小和自卑的时候，那就是1972年的5月。我好羡慕这些同学，每当他们用英语对话时，我听不懂也说不出，又着急又沮丧；更糟糕的是，我当时很害羞，又怕说错话，上课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这一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本中英字典，这也是我的第一本工具书。字典的硬壳包装封面大约在20年前就脱落了，看上去已经很破旧，但多年来我处理掉了无数的物件，唯独这本“新英汉字典”，1987年随我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我换过车、换过房，但一直没有舍得丢掉这本字典。这是继爸爸的绿色旧手提箱之后，我的第二个传家宝。



作者23岁时照片

二、游泳

五月中旬的时候，我离开了临时新生宿舍，搬进了樱顶老图书馆下面的新宿舍。新宿舍非常小，只够容纳一张高低床、一张桌子、两个凳子，此外剩余的空间就很小了。舍友叫甘京丰，长得很漂亮，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很甜，很友善。我们在那间宿舍住了一学期，互相抢着打扫，尽可能地想让空间舒适一些。除了睡觉，我很少在寝室待着，一是因为房间太小，二是我喜欢运动，不想也不喜欢睡午觉。大家都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跑出来找高年



级的老生一起打乒乓球。

武汉大学校园坐落在珞珈山上，俯瞰着全国闻名的东湖。从我的宿舍楼出发步行不到 15 分钟就可到湖边，得天独厚的便利之一是夏天可以到湖里游泳。我喜欢夏天，从 12 岁到 17 岁，每年夏天都是在游泳池和水库里泡过来的。那时候，每天早上 10 点左右，我就穿着一双拖鞋带着两个馒头，和邻居家的几个女孩子到水库里游泳，一游就是大半天。来武大上学前，爸爸专门提醒我带上游泳衣，说守在东湖边可不能当旱鸭子。

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游泳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一个周末，同学们说湖中的水温应该可以游泳了。吃过午餐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发前往东湖的武大游泳池（凌波门外栈道围起来的东湖水域曾是天然的武大游泳池）……

这么多年来，武汉大学和在那儿度过的十几年光阴一直历历在目，1972 年 6 月第一次去东湖游泳的那一天，就像一个蹦跳的花皮球总会在记忆里抢先出现。

那是湖北典型的夏日，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因为不知道游泳池旁是否有更衣室，我事先把游泳衣穿在了衣服里面，走起路来更加热。等走到凌波门外，树影消失、阳光映照，突然间，东湖的壮丽跳入眼帘。

“东湖！”——我们欢呼雀跃着。

东湖比我想象的大 100 倍，当然也比在家经常去的水库大得多，几乎看不见对岸。我脱掉衣服和鞋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水边用脚试了试水温，很舒适，朋友们也已经跳进了湖里。

“刘寒冰，快点过来！”我听到她们微小的声音在水面上飘荡过来。

我浸入湖水中，立刻感觉到湖水的巨大浮力，顿时如鱼得水。爸爸说过，水越深浮力越大，游泳越轻松容易。为了安全，我决定不跟朋友们到湖的深处去，就在栈道附近游。同去的朋友中有一位是俄语系学生，游得非常出色，我歇脚休息时，爬上栈道看着她自如地游来游去，速度快而优美，手臂长而有力，像美人鱼一样。

那天水面像镜子一样平静光滑，在游泳和观望之间，我发现站



在齐腰深的水中能看见自己的脚趾头。不知不觉中，湖中的倒影变了，我开始看到我的英语教室、英语老师、英语课本……

我打了一个寒战。“刘寒冰，你来武大是为了什么？”我赶紧从湖里上岸，换了衣服，直接回到了宿舍。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次都没有去东湖游泳。再一次去时已经 23 岁了。



武汉大学外文系英专二班合影

三、接待

六月那天在东湖游泳池的我，仿佛被魔术师的魔棒点中了，瞬间从沉睡中醒来，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夜之间，我不再害羞怕事，不再被英语吓倒了。相反，我变成了一台学习机器，在短短三个月里，成为了班上成绩好的学生之一。

1972 年 9 月下旬，我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做校园导游，接待一组来自加拿大的游客。作为一个学习英语才四个月的新生，



那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奖励。

那天，我在校园里迎接了大约 20 名加拿大客人，他们对我、对我的英语印象非常深刻，说没想到只学了三个月英语的我说得这么好。当我对他们说再见时，还为他们背诵了课本中的一句话：

“I’m study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学习英语。”）

作者系外文系 1972 级校友



炸出的第一班：记乐山时期的武大附中高一班

孙法理

武汉大学抗日战争之前没有附中，只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人“炸”出了一个附中，虽然只办了五年，却造就了一批人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年初武大西迁四川乐山。1939年乐山遭到日机狂轰滥炸，炸去了繁华区的一半。乐山原有两所中学，一所疏散到乡下，另一所远在城外，武大教职工子女要上学困难重重，逼得武大的老师们不得不办起了附中。出面承担办学重任的是土木系的涂允成教授。开头取名私立乐嘉中学。“乐嘉”者“珞珈”也，又兼顾了乐山和嘉定两个地名。没有挂武大附中的牌子，自然领不到办学经费，特别艰苦。

刚办学时是1941年秋，之后的一两年还经常有敌机轰炸，一听到警报就得停课。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墙顶上忽然往下掉大块大块的灰沙，老师同学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危险急忙往外涌。事后分析，可能是蛇或老鼠在墙顶经过所致。这一件小事反映了大家当时草木皆兵的心理，也说明了那时校舍的残破简陋。

第二年，武大附中的牌子挂起来了，有了学生宿舍和伙食团，大家可以住读了，但条件仍然简陋。就说教室吧，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们班的教室第一年在铜河匾，第二年便搬到了白塔街，第三年又搬到了九龙巷。在九龙巷时没有运动场，只好从轰炸后的瓦砾堆中清除掉破砖败瓦勉强开辟一个。

武大附中就这样从1941年秋起，一直办到1946年东返武昌才



结束。但留下了部分教师和学生继续以乐嘉中学的名字办了下去，一直办到现在改名乐山四中，地址从铜河匾搬到了岷江对岸。

武大附中办了五年，前后办了高初中各 10 个班（每学期一个班），毕业了高初中各五个班。

那时读书不像现在这样注重升学率，但若按升学率计算，武大附中升学率之高是相当惊人的，高一班的升学率又是最高的。毕业时共 21 人，当年升大学的却有 22 人，超额 1 人，升学率高达 104.8% 强，多出来的 1 人是因军训教官刁难不准毕业的陶坤，但他仍以同等学力考入武大化学系。22 人中有 14 人进了武大，其余 8 人分别进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央政大等一流学校。武大附中办学倚仗了两个优越条件：一是师资水平高，老师大多是武大各系正当盛年的讲师、助教，还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二是学风好，在艰苦环境中的大家都知道求学的不易，都很努力。

附中校长涂允成教授是留美归国的水利专家。1954 年武汉遭特大水灾时曾任防汛指挥部副总工程师，为保卫武汉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在抗战期间创办武大附中花费了不少心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当时，他是如何与武大交涉、与乐山地方人士打交道，如何千方百计筹措经费搞到房子桌凳，如何施工修缮、延聘老师、招生开学等细节，我们无法知道，只从他在各种集会上对我们苦口婆心、耳提面命的教导中，我们就对他感激不已了。正是他事无巨细地处理好了各种或重大或琐屑的事务，武大附中才得以生存下来，并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记得有一次，涂校长突然在大会上宣布禁止男女同学在课外举行 Party，这在现在看来似乎不近人情，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情有可原。涂校长解释：“我也到过别的国度，很明白这种交往的正常性，由于目前的种种情况，我们只好决定禁止，希望你们体谅学校的苦衷。”

为了融洽师生之间的关系，涂校长还规定学生每周要写周记。周记有固定格式，除了一般记事，还有质疑和批评栏目，便于各班主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也加强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互相谅解



和支持。

他还要求我们每天写毛笔字一篇，并设有专人收阅检查。练了两年字，同学们的书法颇有长进，有的人还由此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校还坚持推行高标准的考试制度、严格的升留级制度。高一年级时有四五十人，到毕业时原班只剩 18 人（另外 4 人是三年级时才转学来的）。作业布置频繁，且全收全改，英、中、算三门主科要求尤其高：我们的数学从二年级开始每次考试都是四小时，命题难度高、分量大；英语从二年级起全用英语讲解和答卷；由于条件困难，学生无法做物理化学实验，就由教师带到武大实验室去看教师演示。几十年后再回顾，这样训练出来的我们之后绝大部分都成了学有所成、在不同领域有相当成就的专业人才。

学校不仅教给学生专业知识技能和技巧，更注重培养学生对学问的热爱。教师大多是武大老师兼职，业务水平高，不但能融会贯通、举重若轻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且能讲得引人入胜、易学易记。夏京奇老师教化学，能把相关知识编成各种口诀；吴静仪老师教生物，总想办法让大家看到直观的东西，如她讲拉马克学说时曾让班上的陶坤做动耳朵表演，说明人耳在退化之前也是能动的，那堂满是欢笑的课至今仍历历在目；语文老师更是常以丰富的文坛知识引发大家对古典文学的兴趣。但三年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课和英语课。

1985 年去世的张远达教授是武大数学系系主任，国内有名的数学家，那时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级任。张老师高而瘦，剃光头，一对挑起的眉毛，一双威严的眼睛，嘴唇略厚，嗓门大而略带沙哑，30 岁出头，精干而富于活力。他是数学迷，总想把我们也都培养成数学迷。数学对于他而言是一个璀璨的世界，他也想为我们打开这个世界。他常把讲台化作舞台，把自己变成魔术师，一面娓娓道来，一面沙沙地在黑板上疾书，讲到得意处往往一挥教鞭、指着新写完的算式高喊：“你们看，beau-不 beauti-ful 呀？”于是满堂学子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板上的奇迹。次数多了，也有顽皮学生悄悄接嘴：“beau-呀 beau 极了！”



有一回讲对称函数(Symmetrical Function)，黑板已经写满，最后一两排算式被讲台挡住，张先生躬下身子写完算式，忽然一挽长衫袖子抱起讲桌划了个半圆，将其搬到教室一侧，露出了算式问大家：“这个 symmetrical function，sy-不 symmetrical 呀？”

张老师对数学的沉迷，连同他的余汤英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 年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西风》杂志征文，我们班的丁惟均（武大丁燮和老师的公子，武大经济系毕业，“文革”中不幸含愤而死）写了一篇文章应征并得了奖，文章的名字是《他是一个好老师——行为胜于高调》，写的就是张老师，其中着重写了张老师对数学一往情深的爱。

张老师作业布置得多收得也勤，往往是今天收明天发，全批全改，改得学生们不敢偷任何懒。高三下学期我们文理分了科，准备考理工科的学“微积分”，准备考文科的复习三、几、代。张老师既要教理科微积分，又要兼顾文科的复习，作业却仍是全批全改，有时一天布置的题多达五六十道。张老师就是用这样踏实苦干的精神把我们送毕业的。

张老师的得意门生，一个是史长捷，一个是俞宝珍，还有一个不得意的得意门生段华文。

史长捷是数学尖子，也是我们班的“评分标准”。一年级下学期，学校搞了次数学竞赛考算术，考试结果史长捷荣获第一，从此雄距数学状元宝座三年不衰。张老师出题，往往有一两道天马行空、要求特别高，但史兄总是“长捷”，考 100 分或 120 分。若是连他也没得满分，我们就该庆幸了，张老师就会以为题目太深太难，给他补到 100 分，也给我们补足他的分差数。长捷学长毕业后升入武大电机系，现在是遥控领域专家。

张老师的第二个得意门生是俞宝珍，她是武大土木工程系俞忽教授的女公子。到三年级时数学越发冒尖，几乎可以挑战长捷学长的宝座了。张老师有时在课堂上乱了思路便掉过头去问她，她便欣然跳上台去指点一番，指点得张老师眉开目笑，频频称是。张老师那位不得意的得意门徒段华文，后面再讲。

我们高一时的英语由徐世诏老师教授。徐老师眼镜长袍，是武



大外文系青年助教中的业务尖子，一口漂亮的英语。但他选的教材太深，如林肯那篇脍炙人口的“格提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都在被选之列。他甚至还选了“给波拉议员的信”（A Letter to Senator Borah），那是中国“九一八事变”之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写给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波拉的信，这封信文长、字长、句子也长，还充满了生疏的概念，什么威尔逊十四条、巴黎和会、九国公约等，读得我们云里雾里。二年级时来了许海兰老师，才结束了我们这种硬打硬拼式的英语课，开始了愉快自然的英语学习。

许海兰老师是武大理学院院长桂质廷教授的夫人，40岁出头，是生长在美国的中美混血儿，外形上白种成分多些，她能说点带湖北味的普通话，把“吹出”念作“吹渠”，“紫竹”念作“紫菊”；英语是她的母语，自然漂亮流畅。她终身从事英语教学，20世纪40年代起就是武大外文系教授。她性格活泼开朗，讲课富于表情、生动有趣，板书也很漂亮。她选的教材都简短流利、朗朗上口，易学、易记、易用，且有趣。她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开口说英语，课堂上总流淌着和谐、生动、有趣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逐渐吸收了许老师语音、语调、用词、造句的习惯，学到了比较地道的英语。抗战时期没有英语课本，我们使用过几种“代用品”，高三下学期时索性采用了复印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我们由此读了好些饶有兴味的篇目。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叫《我们的心年轻又快活》（*Our Hearts are Young and Gay*），文笔生动、风波迭起，她讲到有趣的地方时不禁哈哈大笑，且笑且讲且掏手卷擦眼泪，同学们自然也满堂欢笑，我们的英语课变得妙趣横生，大家进步都很快。加上频繁的书面作业和系统的语法训练，许老师在短短的两年内为我们的英语听力和阅读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班英语成绩非常整齐，进入大学后大家就能查着字典不费力气地阅读各种专业书籍，能将英语用作学习新知识的工具了。因我们在高中时就已将《范氏大代教》和《达夫物理》作为参考书，这在当时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我们班的国文课教师阵营最强，但换得也最频繁，一年级是缪琨先生，二年级是周大璞先生，三年级上学期是武大中文系系主任刘博平教授和黄焯教授，三年级下学期是叶瑛副教授。那时高中有全国统一教材，我们却没采用；我们的教材全由任课教师选定，缮写油印。不知是偶然还是武大中文系系风所致，所选教材几乎全为质朴流畅之作。一二年级大部分是唐宋文和一些诗，主要是韩柳欧苏，三年级才选了两汉和先秦诸子如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庄子的《逍遥游》《秋水篇》等，刘博平老师曾大谈其诸子学说，什么“鸡三足”“白马非马”等，让我们大开眼界。文章选得朴实有两大好处：一是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文章，“文以合为主”（以内容为主）；二是文字浅易便于模仿，因为我们要学写文言文的。

几位任课老师各有风格：周大璞老师庄严凝重，上课时巍然端坐，目光时时扫视全室，见有不安分者，便用粉笔轻轻点一点讲台，于是满堂肃然。用他的话说，这是“君子不重则不威”。黄焯教授讲课很简略，一篇长文，他且念且疏解，很快就讲完了，剩下的得自己去啃。他有时会很幽默地来几句“突梯滑稽”（委婉顺从，圆滑而随俗）的酸话，叫人忍俊不禁。博平老师则旁征博引，让人目不暇接。叶瑛老师讲课舒缓而“投入”，讲陶渊明诗时一唱三叹、闭目点头；他也爱讲文坛掌故、小学考证，很能引人入胜。老师们的风格虽不相同，要求却一致：一是要背诵，二是要写文言文；前者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后者是“不会吟诗也要吟”。比如黄焯老师讲完了曾巩的《宜黄县学记》，下一堂课就不来了，而由校长出面督促大家背诵，要从“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背起，写作文也一律要求用文言文，写白话是要受到申斥的。这套办法有很多好处，能让学生熟悉文言文、会写文言文，有利于钻研国学、提高文化素养。那时好些同学的文言文都写得不错，刘博平老师的女公子、后来进了武大中文系的刘敬黄学长便是个中翘楚，她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很见功底，端丽流畅；而那位会动耳朵的陶坤还喜欢诌几句古诗，音韵和谐，很是那么回事。

不过只准写文言文也有流弊，因为它束缚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



思想，不免遭到抵制。高二班（我们下一班）的曹葆铭就曾在课堂上跟老师起过冲突。“我在课堂上交的作文是文言”，他说，“课外我写白话你就不必管了吧！”曹葆铭后来做了新华社记者，20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第一篇长篇报道就是他写的。

曹葆铭说的一点也不过分，实际上无论课堂上怎样要求，学生们平时总是要写白话文的。以高一班论，第一个把自己写的文章变成铅字的是涂光辉学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他的《割阑尾记》时还在高中一年级，用的自然是白话。他是涂允成校长的公子，不但爱读白话文学、爱写作，而且有思想有见解。高中毕业时，他给我纪念册题辞用的是波德莱尔的话：“我有一支芦笛，是不肯和王杖交换的。”不过，之后他却从事了教育工作。而丁惟均那篇得奖之作《他是一个好老师——行为胜于高调》，自然也是白话文。

我们班的国文状元曾是段国华，高一下学期班上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高居榜首的就是他。他的文字流畅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在作文比赛上摘取了桂冠之后又在姚梅镇（后为武大法律系著名教授）老师的公民课考试中得了100分。姚老师是湖南人，一口湖南话，在课堂上高兴地说：“MR. 段法（华）文得了我的100（分），这很不容易呀！”华文学长不但文科优秀，数学也很见长，但他有点恃才傲物。他瞧不起分数，颇有些奇特言行。张远达老师既心疼又生气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不过华文兄既未上天也未钻草，倒是继承了张老师的衣钵，教了一辈子数学。

武大附中先天不足的是难以开展体育活动。体育课由军训教官兼任，上课时放“野马”，同学们愿玩什么就玩什么，场地也只有巴掌大一块。不过，高一班也有体育尖子，王云从学长就是女篮国手，在武大中文系时曾代表华中地区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另外，现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的熊性美和赵宗人的乒乓球也是颇有实力的。宗人兄文理兼擅，拉得一手好京胡，初进交通大学时便在晚会上露了一手，此公还迷过篆刻。

抗战时期生活很艰苦，同学们的体质大多很弱。我们毕业后不到一年便有两位同学先后辞世：一位是从河南转学来的赵大钊，另



一位是乐山的许廷信。赵大钊是经历了 1942 年的河南大旱和蝗灾之后颠沛流离来到乐山的，面色青白、郁郁寡欢，十几岁的人带着中年人的沉重，一声悠长的“我要回家”能唱得人鼻酸泪下。他毕业后考取同济大学，不久即传来噩耗。许廷信是班里的笔杆子之一，作文竞赛得过第三名，思想很活跃。高中毕业后不久也意外地英年早逝了。此外，还有一位去世的李纯愚，是班上的化学尖子，英语数学都很强，是我的好友，1948 年我赴南京考中央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时，他刚从中央大学毕业，正在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听说他考取了北大，去了北京，之后便再无消息。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听说，他早在 60 年代便已过世了。

作者系外文系 1944 级校友



乐山时期的武大社团

袁 瑜

1945 年，距离武汉大学迁校乐山已经 7 年。同时期，在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有几十所命运相同的大学，和武汉大学一样蛰伏于抗日战场的后方。战争的阴云虽暂时没有游弋至此，但战争的影响每日剧增，物价飞涨、缺衣少食、教学器材短缺，等等。即便如此，各学校依然坚持着常规的教学活动。在这样长期压抑的极端沉闷中，后方的师生们均在等待着一个爆发的出口。

8 月 10 日早上，武汉大学一个由大学生自发组织的社团——力讯社，收听到了一条消息：

〔中共社渝十日急电〕据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接受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唯一要求为保留天皇。

8 月 15 日，日本正式投降，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力讯社提前五天通过电波收到了那条国际新闻，他们立即将这个通知乐山《诚报》，早上八点《诚报》刊出此消息作为号外，瞬间引燃了整个乐山城。

那一天，累积的苦闷消失了，喜悦冲去了战争带来的阴霾，乐



山城里张灯结彩，师生们奔向街头庆祝，连茶馆的老板都兴奋得免去了大家的茶钱。庆祝持续到晚上，苏雪林、袁昌英等教授也举起旧床单做成的火把，走进了欢乐的队伍。

那时，武汉大学学生课余根据自己的志趣，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社团，这些社团和力迅社一样，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百花齐放——乐山时期社团概览

1938年，战争即将波及武汉。1月，国立武汉大学派出教授杨端六、邵逸周由武汉出发，沿长江西上考察迁校地址，经重庆、宜宾，最终到达乐山并选定此处为迁校校址。1938年6月，武汉大学完成了庞杂而高效的迁校活动，在位于乐山文庙的主教学场地门口正式挂上了“国立武汉大学”的校牌。从此，武汉大学与乐山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抗战八年。在相对较为安全的大后方，中华民族的有生力量得到了保存，具有最先进思想的栋梁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全国全民族的对敌全面抗战。

当时的王星拱校长提倡学术自由，始终坚持“讲学无禁区”。为了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他规定，每学年新生入校和毕业生离校都必须开展三个晚上的文艺演出活动。在高度自由的学术环境里，武大学生的各种学术活动及其他文艺性质的活动空前活跃。武大毕业生袁征益回忆，当时学校里的各种学术团体多达一百六七十多个，而当时在校的全部学生也不过一千三四百人，平均下来，不到十名学生就拥有一个学生社团，数量之多、密度之大、覆盖面之广，实属罕见。

这些学生社团在早期大多依据兴趣自发组织形成，根据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大致可将其分成进步团体、文艺、学术、体育社团等几大类。



武大乐山时期部分社团

抗日战争研究会	风雨谈	社会主义研究会	大渡河边社	峨眉剧社
岷江读书社	课余谈社	海燕社	地平线	丛丛剧社
政谈社	壁报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小组	凌云社	南开剧社
文谈社	冰岛社	核心领导小组	文艺岗位	课余平剧社
文艺协会	力讯社	珞珈经济学社	新闻学会	嚶鸣
联青合唱团	诗社	科学青年会	膳委会	黑白社
南风歌咏队	Echo-club	珞珈剧团研究社	珞珈团契	Σ 曲棍球队

这些自发组成的学生社团，一部分以武大校内成员为活动主体，具有一定的自娱、自学性质。例如，比较活跃的联青合唱团，组织武大师生合唱练歌，在战争时期组织改编了一系列爱国歌曲《我爱大中华》《旗正飘飘》《游击队之歌》《胜利进行曲》《垦春泥》等，这也是学生在战争期间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1942年年初成立的 Echo-club(回声俱乐部)是学生的英语互助学习社团，通过互相修改英文文章、举行演讲等来提高成员的英语能力，在学生社团中极具代表性，杨静远等为其成员。

另一部分学生社团则是以校园为据点，逐渐走向市民中间，将学校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力量带入城市，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了乐山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1946年1月成立的科学青年会，以科学服务人类和提高文化、健康、生产三大任务为宗旨，举行天气预报、学术讲座、英语竞赛、蝴蝶展览、音乐晚会等活动，同时出版“科青”歌曲选、印售“科青”年历、出版壁报“以科学服务人类”，将科学推向社会。乐山时期的珞珈平剧社、课余平剧社，则以京剧会友，剧社中高手如云，曾有人评价：这些学生剧团水平远超乐山当地的专业剧团，也因此丰富并提升了乐山的文化水准。



还有部分社团将社团的宗旨与民族命运相结合，在社会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山时期的学生社团“南开剧社”曾为河南募捐，于1943年3月31日至4月3日在兴发街浸礼会公演《日出》四天。1938年，电机系学生成立的学生社团“力讯社”，用实验室的收音机收听电台中的抗日消息，并将收听到的消息誊写后贴于工学院三育学堂的走道，供师生了解最新的战事详情；“力讯社”坚持每日更新战况，最后连当时的乐山政府都送来笔墨请社员将收到的消息张贴于市街之中，从而也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1940年，一位校友曾写道：“建筑的华丽，物质的享受，在嘉定不如在珞珈；同学感情的融洽，读书空气的浓厚，课外活动的活跃，在珞珈不如在嘉定。”

由此可见，乐山时期的武大社团是学生们生活、学习及与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

二、爱国救亡——乐山时期的进步社团

随着战事的日趋激烈，学生们由志趣相投逐渐转向寻求爱国救亡之路，一部分社团逐渐发展成具有进步性质的团体，更有部分社团及成员直接投身到革命与共产主义事业中。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下的少数学生社团，先后有抗战问题研究会、岷江读书社、马克思主义小组、武汉大学学生运动核心组织等。

当时，国民党对各种进步思想展开了严密监控，实行了全面的文化专制政策。

武汉大学部分师生自发组织“俄语学习班”，邀请缪朗山教授讲授，利用每天早上未上课前的一小时进行学习。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引起了乐山当地政府的密切注意，乐山师管区主任兼城防指挥韩文源以“赤化”学生为由，于某日凌晨突然抓走了缪朗山教授，后经王星拱校长斡旋才得以释放。

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先进的学生社团依然进行着斗争。“岷



江读书社”及其壁报《燎原》，大量揭露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针砭时弊，在校内外颇有影响，当然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1942 年秋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校内组织成员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文献，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1944 年冬，赵隆侃以此小组为基础建立了“武大核心组织”，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直接领导下，该组织为党培养输送了大量生备力量。

除此以外，进步的社团还包括海燕社、壁报联合会、社会主义联合会、大渡河边、地平线、凌云社、文艺岗位等，这些社团及其成员在黑暗的文化封锁时期，坚持自己爱国救亡的理想信念，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做出了勇敢的抉择。

武大乐山时期部分进步社团

抗日战争研究会	风雨谈	社会主义研究会	大渡河边社	新闻部队
岷江读书社	课余谈社	海燕社	地平线	《资本论》学习小组
政谈社	壁报联合会	马克思主义小组	凌云社	拓荒社
文谈社	冰岛社	核心领导小组	文艺岗位	蜀光/曙光

乐山时期是武大校史中重要的八年。在国破家亡之际，武大师生背井离乡远赴乐山，在“明诚弘毅”校训的引领之下，武大师生以质朴、精诚、勇毅，坚守着青年的担当。乐山时期的学生社团是武大乐山精神的缩影，在大时代之巨变中毅然坚守着民族、国家复兴的理想。

以下为李若皞制作的乐山时期学生社团情况一览表：

武汉大学乐山时期学生社团情况一览表						
序号	社团名称	起始时间	社团性质	领导组织与领导者	社团壁报	活动情况
1	抗日战争研究会	1937—1940年	进步社团	余有麟创办 总干事廖泽祥 副总干事董镇文 端木王	《抗研旬刊》 《抗研宣传队壁报》	1. 组织讨论会 2. 组织壁报战 创办壁报《抗研旬刊》《抗研宣传队壁报》 3. 歌咏活动 4. 远足活动 5. 下乡宣传
2	岷江读书社	1938—1942年 部分社员转入地下活动 1944年秋转入人文谈社	进步社团	周继武 吴香达 汪达庆 (若潜) 陈其名等创建	《维新》	1. 创办壁报《维新》 2. 组织读书、举办学习讨论会 3. 社员以“结对子”的方式交流思想 4. 与社员讨论谈心 5. 发动社员帮助协助社团工作
3	政谈社	1940	进步社团	韦德培 胡明正 王秉霖 李季仙 黄俊杰等人创建	《政谈》	1. 进行相关稿件写作 2. 创办壁报《政谈》
4	文谈社	1941年下旬	进步社团	高耀辉 胡国斌等人创建	《文谈》 《今天与明天》	1. 革命文艺理论的学习与实践 2. 创办壁报《文谈》《今天与明天》 3. 座谈会 4. 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
5	风雨谈	1942年8月	进步社团	张会昌 潘道谦 赵贻佩等人创建	《风雨谈》	1. 自学为主辅以集体讨论 2. 设置文学 历史 政治经济学 哲学等读书小组 每周讨论 3. 社员自愿结成读书小组 4. 分析研究形势与战时形势 5. 订阅《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刊物 6. 创办壁报《风雨谈》
6	课余谈社	1944年秋—1948年	进步社团	马健武(马西林) 韩秉尧 陈公泰 王尔杰 戴志舒 赵前三等人创建	《△×》	1. 周日组织社员开展时事座谈会 2. 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整风文献》等书籍 3. 分组讨论学习“力学”“微积分”“电磁学”等课程 4. 创办壁报《△×》
7	壁报联合会	1943年冬	进步社团	文谈社、海燕社、风雨谈社、政谈社、课余谈社等进步社团共同组成 凌云社万安任总干事	联合出版壁报 《言论、出版自由文摘》	1. 加强社团联系 联合出版壁报 2. 召开多次座谈会，如“争取言论 出版自由座谈会”并出版大型壁报《言论、出版自由文摘》 3. 发动募捐支援西南联大 4. 支持昆明学生运动 5. 组织“庆祝政协举行”等进行活动 6. 组织“重庆校门口惨案”等声援大会
8	冰岛社	1942年秋半年后解散	进步社团	陈承熙 李肇英 陈希夫(克霄) 等人创建	《冰岛》	1. 学习革命理论为宗旨 2. 每月开会研讨时事，交流读书心得体会 3. 创办壁报《冰岛》
9	社会主义研究会	1943年秋	进步社团	中共南方青年局指示建立 乐山此次“基点” 陈希夫(克霄)、李肇英、刘兆丰、余瀚烈、胡宗岳(胡季文) 等人创建		1. 受共产党领导，宣传新民主主义 2. 向南方青年局保持密切联系 3. 学习“马列主义”思想 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著作以及共产党重要文件》 4. 举行时事和学术讨论会 5. 传播党的方针 指示 国内外组织形式分析材料等 6. 参加校内外各重量大斗争 7. 派出成员参加其他社团工作
10	海燕社	1942—1943年春	进步社团	陈希夫(克霄)、李肇英、刘兆丰等人创建	《原野》	1. 积极参加校内斗争 如“改善学生伙食条件”“争取校内言论自由”等 2. 走向社会 走入下层 接触社会实际和广大下层群众 3. 组织动员社员到中原军区工作 4. 1944年12月 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 参与成立武大“学院级核心” 5. 创办壁报《原野》
11	马克思主义小组	1942年秋建立 1944年赵贻佩以此为基础建立“武大核心组织”	进步社团	马健武(马西林) 等人创建		1. 组织组员学习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文件 如《新华日报》 2. 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勤学 勤业 勤交友”的方针 广泛联系群众 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3. 为建立正式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核心组织”作好思想和组织准备
12	核心领导小组	1944年12月中旬赵贻佩回校了解情况 1945年3月29日召开“核心领导小组”会议	进步社团	赵贻佩以马克思主义小组为基础建立		1. 传达“武大核心系列章程” 2. 为党培养和输送干部 作党的预备学校 3. 贯彻执行“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 配合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组织领导开展校内爱国民主运动斗争 4. “反内战 反饥饿 反迫害”运动
13	大渡河边社	1942年—1944年	进步社团	李军发起 万宝仁等人创建	《大渡河边》	1. 出版壁报《大渡河边》 2. 1942年暑假前 万宝仁提出将大渡河边社并入人文谈社
14	地平线	1944年上旬	进步社团	理工学院同学组织创建		1. 重视革命理论学习 2. 与马健武等共产党党员讨论时政 3. 与“近代史研究会 凌云学社”合建一个“核心”
15	凌云社	1941年1月	进步社团		《长风》	1. 创办壁报《长风》 2. 宣传抗战与民族团结 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 3. 参与“反内战 反饥饿 反迫害”运动

作者系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20 世纪 60 年代大学生生活拾遗： 上北京“拜年”

张炳煊

1963 年，也就是在珞珈山求学的第四年，那时我们住四区（桂园）一栋二楼。5 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上晚自习的钟声将要敲响，二楼宿舍走廊传来了“到北京去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的呼声。刚一听大家都愣住了，及至听清楚了这是一次象征性活动，拟在元旦前跑完从武汉到北京的一段距离路程，以表示到达北京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同学们便哗地拍手叫好，都为这个建议称好叫妙。

随后大家嘻嘻哈哈、熙熙攘攘从走廊回到宿舍，开始研究上北京“拜年”的计划。我们寝室四人，即张金堂、闭良干、朱元胜和我，我们围着书桌盘算了旅程，从武汉到北京按 1100 公里计，再按 7 个月时间平均分配，每人每天走 5 公里；计算完毕，张金堂放下钢笔大声笑道：“哈哈，5000 米，5000 米，妙极了，好极了！”

张金堂是湖南人，修长身材，考虑问题时总爱半扬着头眨巴着明亮的黑眼珠，当作出判断时总是先嘻嘻地笑两声才说出结论；但这次的嘻哈大笑是作出简单的演算之后发出的，几乎高兴得手舞足蹈。他的笑声带着朴素的纯真。

“没问题，俺保证完成。”朱元胜把头一扬，手一挥，语气斩钉截铁。朱元胜是印度尼西亚归侨，身材魁梧、鬚髭微露，颇具男子汉气度，他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学习，对祖国怀着拳拳之心。他那时正研究《水浒》，拟写作有关这方面的学年论文，因此，他话语中时有梁山好汉说话时那种“俺”呀“鸟”呀之类口吻的遗响。



“好，妙极了！我从明天就开始行动。”闭良干托了托眼镜，笑咪咪地表示赞同。闭良干是广西灵山人，一头微卷蓬松漂亮的黑发，佩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颇具学者风度。

当然我也表示了完全赞同。

这天晚上，大家都忘了晚自习的钟声，都在议论着、兴奋着、计划着上北京一事。

晚自习后，我仍然心情激荡，怎么也睡不着。我悄悄地下二楼的楼梯。楼外月光如水，我步上小斜坡，穿过四区运动场，慢慢向校门口的车站走去。

我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脑海里不停地翻滚着四年来的大学生生活：我们在宿舍走廊开过无数次的会，最令人激动的要数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重要新闻和每年元旦午夜听李达校长的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一次重要广播，同学们都是早早地把小板凳提到走廊上，找准自己认为最好的位置坐着等候；每年的元旦夜晚，同学们都不会早睡，自愿“守夜”，并又会准时提前一刻钟，把凳子提到走廊，静静地等候李达校长的贺词。今天，我们在走廊上又激动了，而且这激动让人久久难以平静！

我在路上慢慢走着，心情特别激动——不就是因为这活动很有意义吗？是的，这活动很有意义，但我还是觉得这不能把我们心里内蕴的东西表达出来。我曾尝试过用美好的词句来概括，但最后又把它们推翻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激动是一种满足，我把它叫做“满足感”。

如果说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重要新闻的激动是出自一种崇高的政治感，那么，听李达校长的元旦贺词的激动就是一种文化的敬崇感了。而谓这次活动为“满足感”，是因为它满足了久久贮藏在心里的一种愿望。

多少年来同学们就有个心愿：看看党中央办公的地方，见一见毛主席。我们这些人对共产党、对毛主席感激不尽、敬仰不已，但现实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北京见一见毛主席是不可能的：一是我们不能到北京去；二是我们即便到了北京，在一般情况下也难以见到毛主席。有人提出建议到北京去给党中央、毛主席拜年，



一下子就拨动了大家的心弦，共鸣感油然而生。尽管大家都清楚，这仅仅是一个象征，但这象征也算遂了一种心愿。于是乎大家的情感便像一股决了口的潮水一样，自然地向前奔腾倾泻而出了。

我抬头回首珞珈山，座座学生宿舍灯火辉煌，一座挨着一座，在夜色中好像一艘一艘远航的船，正向着光辉的彼岸起航！

我向夜空暗暗地呼唤着同学的名字，闭良干，张金堂，朱元胜……这些同学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是归国华侨，有的家境贫寒。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时代，大家都进入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高等学府，登上了这艘远航的大船，怎不叫人乐哉快哉！

我不知道自己在外边站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回到宿舍的。

这个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的活动，旋风般地在我们的年级开展起来。莘莘学子，个个感到惬意自豪！

平时，大家的生活规律都是早上6点起床，接着做早操、读外语、吃早点，8时上课；下午5时课外活动，5:30分晚餐，晚上7时自习。现在，同学们把每天跑5000米的路程一分为二，有的早上跑一半，下午跑一半；有的早上跑2000米，下午跑3000米，各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寝室的同学多是早上跑2000米，下午跑3000米。

有一天，张金堂跑步回来时闭良干也回来了，只有朱元胜没有回来。我们3个人去打早点，回来还不见老朱。闭良干舀起一汤匙稀饭送到嘴边突然停住，抬起头来问我：“老朱呢，老朱怎么还不回来？”我正要答话，张金堂抢着道：“他今天很早就起来了，谁知他干什么‘勾当’去了。”说着哈哈大笑。闭良干笑咪咪应道：“好，等他回来审问审问。”

我们正说着乐着，老朱回来了。还没待我们开口“审问”，朱元胜便摇晃着脑袋说：“今天真过瘾，跑得真过瘾！”原来，他今天不在四区操场跑步，而是到大操场去跑了。他围绕跑道跑了20圈，足足跑了16公里。我们恍然大悟。

老闭摇摇头说：“不对，老朱，你跑这么多是不行的，不行！”



老朱摆摆手说：“我一般不会像今天这样，今天是星期天，我是试测一下自己的体力。”

这一活动的确开展得很顺利，也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后来年级党支部和班委会鉴于女生和部分体弱同学的实际情况，建议大家把每天行走的路也算入到北京的路程，算在跑步的长度之内，并指出：这一活动不是搞比赛，它一是通过跑步锻炼增强体质，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二是通过跑步，表达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

活动就如此这般地开展起来了。我们并没有打破原来的生活规律，还是按照起床—锻炼—读外语—吃早点，直到下午活动锻炼这一循环的学习生活方式，只是跑步也慢慢地成了生活必需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元旦到了，全年级没有一个掉队，都步伐整齐地准时到达了北京。珞珈莘莘学子，向党向毛主席敬献了一份爱心，也带去了无限深情的祝福。

如此坚持锻炼之后，我们年级同学的身体都很不错。五年后毕业工作分配，闭良干分配到国务院某单位工作，张金堂分配到一所高等学校教书，朱元胜分配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我也留校工作了。大家都愉快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现在回顾这一切，内心仍感到很甜蜜。

作者系中文系 1959 级校友



在珞珈山读书的日子

周 玲

2010年我考上武汉大学，开学前两天先来学校踩点，那时候武大校门很小，前面是一条非常拥挤的道路，堵得不可开交，远远没有现在校大门的恢弘大气、美观整洁。难以相信这会是百年名校的大门，待看到教五时，我感觉更失望，那样的设计和幕墙，怎一个“土”字了得。

如果说第一眼看到武大是失望的，那么李达园就是我改变印象的开始（对于梅园操场旁边的小片小树林，可能每个人的叫法都不一样。但因为里面有李达老校长的雕像，我们一般都亲切地喊它李达园）。走到那边时正是早上8点，清晨的阳光透过繁密的林叶洒下来，整个树林都氤氲着一层清澈的光晕，小树林里很多学生或站着或坐着，认真地读书，有的声情并茂、有的细声慢读，但都那么全神贯注，不比高三时的我们差。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我，高三一年，老师们常常给我们说，考上大学就解放了，就可以睡懒觉可以轻松可以玩了，我一直信以为真。当看到李达园晨读的学长学姐时，还没入学的我就已经明白，大学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任何回报都要先从努力开始。

日后的很多时刻回想当初，都觉得那一幕奠定了我对武大的印象。武汉高校间流传着一句话：“玩在武大，学在华科，爱在华师。”其实武大有很多爱学习的人，从清晨六七点到夜晚十一二点，在小树林里、在奥场的跑道上，只是很多人不知道罢了。入学第一堂课是阮桂君老师的“现代汉语”，阮老师建议我们每天早上6点



半起来集体晨读，读古代经典即可。回去后我们迅速地买了《诗经》《论语》《孟子》等书，开始了每天早上的晨读。



作者(右二)本科毕业时与同班同学合影

我们班女生都住在枫园十二舍，旁边就有一个篮球场。这个小操场在明晓溪的书里是男女主角发生爱情的场所，在我们这里却是每天早上晨读的最佳选择。小小的操场被中文系好几十号女生塞得满满的，每天刚出枫十二的门，就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集群效应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看到别人那么认真读书，生怕自己落后了，于是会更认真更努力。有时候半个小时结束了，却还是没人走，大抵学习也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在这个小操场，我读完了《论语》《孟子》和《老子》，虽然不求甚解，但也被这气氛深深感染。

阮老师的绝招还没完，他说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能看懂且会写繁体字，要有古文基础，谁能在一个学期内用繁体字抄完四书五经，期末考试就可以加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一下课，大家匆忙赶去图书馆借书，手慢没借到的就得自己买了。为了这五分，我们开始



了抄书生涯。这也是我大一时期最宁静温馨的日子，抄书能让人心思沉静，每当我坐在枫园自习室，在一片静谧中安安心心抄写四书时，所有纷乱的杂念便全没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抄的过程也是读的过程，遇到佳句总忍不住反复咀嚼，常常与室友小白一起感慨，经典不愧是经典。偶尔我也想玩，就会让表姐下班后过来帮我抄写一下，她写字跟我如出一辙，我自己都分不清的。她抄完了，我就把她抄写的部分读几遍，然后在心里默默忏悔：阮老师对不起，我今天偷懒了，但是我精神上抄写了三遍。偷懒过一次，看到小白那么勤奋认真心里越发惭愧，下次便不敢再偷懒了。

印象中阮老师还有个绝活，那便是抄写新华小字典，他让我们每人都买一本小字典，把所有不会的字包括拼音释义等，都抄写下来。去买字典的路上，我和小白笑言，这个任务应该很好完成。待开始抄写时，便发现大话说得太早，不认识的字太多了。大一的第一个元旦假期，我们宿舍四人在埋头苦抄中度过，偶尔有交谈也是：

“你抄到哪个字了？”

“抄到 fang 了，你们呢？”

“天啊，你好快！”

就这样，三天假期，我们抄完了小字典里所有不认识的字，怕也只有读书时，才有那样的激情和效率。

大二时，我们上高文强老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高老师课上笑眯眯地告诉我们：我是要抽背的哦，背得又快又好的，期末加分。课前他都会把要背的内容告诉我们，记得第一篇就是《诗大序》。每天 8:40 上课，我和小白 7 点半就到李达园开始背书。清晨的树林温柔静谧、鸟声清脆，晨曦微光轻柔地拂过来，人仿佛要与环境融为一体，哪怕大声念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也不觉吵闹。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多了自然懂得其中意思，那背起来就更容易了。一天之计在于晨，



这篇课文我当时一个早上三十来分钟就背下来了。

后来背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原来这句话是从这里来的，待读到“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谁以为然，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读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时，则被深深折服了，不禁反复吟诵，觉得曹丕真是个妙人，见解独到，让人茅塞顿开，原来“文章”有如此大用，连皇帝都这么重视，我们更要有信心才是。自那以后别人再问我学中文有什么用，我就微笑着告诉他，多读点书你就知道答案了；心里却想着，这个人到了古代拼死也就是个百夫长了，决计是做不了皇帝的。

等学到佛教文学时，文强哥（我们班对高老师的爱称）便让我们背《心经》，《心经》第一段很好背，第二段简直考验人的普通话，但是背下来之后走到哪里都有底气了。每当我夜晚从图书馆回枫园经过黑漆漆的小树林时，便在心里开始默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最明显的要数去武汉欢乐谷鬼屋了，一进去就开始默念《心经》，心里十分有底气，当那些“鬼”给我喷气时我就哈哈大笑，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扯我衣服时我就扯回去，拽着那些“小鬼”玩，敢吓我，我可是会背《心经》的人呀，有菩萨保佑呢。出去后看到别人惨白的脸，油然而生出一股自豪感，觉得自己十分厉害。读好中文系，鬼屋也不怕。

读书的日子就是这么欢乐，有些老师虽然不要求我们背书，但看书抄写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叶李老师的“现代文学史”，我们要跟着看现代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叶老师布置了一个课后作业，让我们搜集现当代以来武汉作家的作品，或者现当代作家中与武汉相关的作品，整理成册，做成编年史一样的东西。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方感觉老师的用意，这个搜集的过程也是对作家们系统了解的过程啊。那次作业我选择了凌叔华，信心满满交上了作业，自觉做



得很棒。上课时，老师拿出一本厚厚的装帧精美的书告诉我们，这是班上一位女同学交上的作业。她搜集了所选作家的所有作品，还做了引言和笔记，自己设计了包装，完全以做一本图书的态度在做作业。我听后十分汗颜，与优秀的同学相比，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上了四个学期，四位老师都会要求背诵、默写之类，曹建国老师教“先秦两汉文学”，我们便要背一些大赋小赋，也是在这个课上，我才知道张衡不仅仅发明了地动仪，语文数学也都很好，《二京赋》《归田赋》便是他的代表作；陈顺智老师教“魏晋南北朝文学”，那诗歌乐府的背诵就逃不掉；王兆鹏老师教“唐宋文学”，就更不要说了，读书笔记一学期要交十本，还要完成100首诗词抄写与赏析。结果到了期末，我们写不完十本笔记，便让学习委员黄爽去求情，王老师很仁慈，心疼我们学业繁重，便答应笔记交五本即可。

陈水云老师的“明清文学”则相对轻松，因为到了我们熟悉的领域，明清很多作品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了，但是《牡丹亭》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桃花扇》里“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放悲声唱到老”。依然让我们肝肠寸断，一遍遍吟读背诵，体会文学之美。

大三上学期上李松老师的“西方文论原典研读”，他住在汉口，每天早上要打车过来给我们上课，李老师笑言课时费不如打车费，每当看那些理论书籍看不下去时，想想老师的打车费又有了啃下去的动力。让我惊讶的是，我读《理想国》白话版就很费劲了，居然在诗社看到郑韵扬同学读着文言版的，深觉自己和学霸之间还隔着十来个“学酥”（网络用语，指外表学霸内心学渣，但又比学渣强的人）。最后实在没办法，天资愚钝的我在图书馆C区3楼的楼梯里，把李老师上课讲的理论全部都硬背下来好歹应付了考试。这大约也是我硕士毕业之后没有读博的最大原因，总觉得学术科研这么崇高的东西，没有天赋实在不敢沾染。

同样需要交笔记的还有涂险峰老师的“西方文学史”课，涂老师要求我们每学期交八本读书笔记，三本理论类的，五本文学类



的。我正儿八经看西方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诗说》，第一次看就陷进去了，之后又看了好几遍；读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时，又深觉以往都小看了他，可惜《存在与虚无》太大部头读不进去。在这个课上，我们被瑰丽灿烂的西方文学深深吸引，那是跟中国文学截然不同却又同样极富魅力的文化。涂老师讲课很有趣，又特别擅长讲冷笑话，往往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先笑了，我们只好跟着笑起来，笑着笑着，大家领悟到笑点了，就笑得更大声，整个教室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西方文学史的课虽然在偏僻的教一，却因为特别火爆，很多同学中午不回去休息直接跑去占座，去晚了就只能坐在角落里了。内卷过于严重，导致我和小白也不敢再回宿舍午休了，吃完饭便直奔教室抢占座位。

涂老师的“西方文学史”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因此当年保研古代文学失败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开启了珞珈山后三年的学习生涯，最终在与莫迪亚诺的思想交融中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2010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二班本科毕业合照



时光如流水，如今毕业一年，回首过往，当年苦尽是今日甜，当年同窗散落天下，虽很少相见，想必见面时依旧一样亲切。这个清明节我和小白重回珞珈，在李达园看到读书的学弟学妹，回想起当年我们读书的日子，只觉千般情感盈满胸腔，遂下笔成文，不求文思优美，但为真实记录，若干年后再回看，定又是另一番光景。（此文写于2018年4月）

作者系文学院2010级本科、2014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珞珈文苑





樱顶

陈 勇

1

天落一场泪雨，珞珈山的樱花
绝不要承负一毫克的委屈
花魂轻飏，流落的口信也要托梦
给依旧坚守在窗前的花期
静卧侧畔的一池绿水，恍惚
还倒影着珞樱的写意还魂？又或者
只愿将今世的春光旖旎
在花蕊上倾尽一生爱慕的容颜

2

美好的时光拥簇于花枝
不问结果，也无需在意过路的清风
随便挽一个发髻，理一下云鬓
你的流光足以香薰十里，暗怀波澜
这一步芳草，你如不信，就算天涯
也可以在咫尺之间破空穿梭
可以到那一瞥勾魂的美瞳里



掘一眼深不可测的星空

3

没有一万朵玫瑰做配饰，那又如何
一枚薄如蝉翼的樱瓣，同样能为你放下一座吊桥
这满园美色，只为你的到来
放下绝世的身段，放出花信，洞开城门
当然还有这一池春水
等你撩拨从未泛起过的涟漪
在樱顶，总有一粒风景外的微尘
臆想着误闯帘笼，成为你阶前的宠臣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樱花忆

方雪梅

从东湖的波影中醒来
春风整装而出 轻唤一声
珞珈山的衣袂
就燃成花海
梦 被一园蓓蕾叫醒
我的花季
远在 2021 年的菱花镜外
趟过遍体鳞伤的去岁
越过冬天低温的午夜 我
归来 在樱花密处
放下 陈年的疼痛与开怀
樱花 以二十岁的样子
把咸湿的记忆
一次次打开
时间的梳妆台上
我红艳的昨日
早丢失在今天的镜外
留不住的
就放它走吧
任那年缠绵的花事
在旧日记本里 如水徘徊



青春远去 樱花荣枯
岁月的滤镜下
谁的人生
不是一场美丽的盛衰？

作者系新闻学院 1991 级校友



鹧鸪天·樱园斋舍

丁海军

傍岭斋居兰芷家，樱园城堡伴菁华。春醒楼外千层雪，夜读迟归吟月花。毕业季，泪儿哗。同窗展翅散天涯。年年友校遥思日，梦里频回聚珞珈。

作者系新闻学院 1997 级校友



江城子·三十五周年聚会

丁延陵

珞珈东湖正含芳，菊花黄，桂枝香。三十庆典，聚会喜气洋。
来自枢纽千百座，论建设，话荣光。

喜见校园笑声扬，新学子，非寻常。人才为本，发展更腾骧。
齐心共圆水电梦，民致富，国图强。

注：此词创作于 2000 年 10 月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65 级校友



樱 花

胡 昕

太过喧嚣了，我找不到一块宁静的草地
停下来，回头再看一眼。实际上，我牢记的
樱花，仿佛远走的少年，并不曾回来，当时
在三月冷寂的雨中，它们在枝头上抱成一团
彼此照看的样子，不问前世今生，甚至

不需要一片叶子作为时光的见证。不纠缠于
恒久，既然醒了，也就不在乎一闪而过

作者系中文系 1987 级校友



爱的馈赠

傅跃龙

樱花逐岁开，牛年春更深。
恭迎抗疫客，略表感恩心。
珞珈沐爱意，东湖洗征尘。
万宾聚武大，一笑倾江城。

作者系中文系 1980 级校友



樱花之恋

李立屏

这一冬，连珞珈山上的琉璃瓦
都在等她
五加二，白加黑
风霜雨雪，从不间断
惦记她的远不止老斋舍灰白的台阶
还有它深红的窗棂
梧桐树的风铃
云雀在消瘦的银杏枝上绕来绕去
大概也是念念不忘

我年年都要回到这里
请别问我为什么
问我，我也不会告诉你
樱花她是我大学四年朝夕相处的情人
是旧爱
也是新欢

作者系日语系 1983 级校友



珞珈重聚记

李祖德

云梦和谐，荆楚盛秋；珞珈犹翠，东湖碧透。有武汉大学物理系五四级暨五八届同学，相约返珞珈重聚，谢母校培育之恩，叙同窗金兰之情。故地融融，老友愜愜。生机盎然，新景不掩旧径；积厚流广，凝重仍袭传统。忆往事，询近况；嘘暖寒，问健康。三日不绝，言语难足。

吾辈学成之年，风华正茂；怀才抱德，藏器待时。不畏艰难，勇赴各方；至诚敬业，从未懈惰。做添砖加瓦之工，操春华秋实之业。得筚路蓝缕之乐，祛高位厚利之欲。凭数十年之殚精竭虑，或培育桃李，或钻研科技，各司其职，均有作为，且略有建树载誉学界者不乏其人。昔有评武大学子者曰：“勤奋笃实有余，发扬蹈厉不足。”姑不论及我校前贤后俊建大功于中华民族者，仅就本届业绩观之，此言前句或如是，而后句有失偏颇。吾侪百人，纵命蹇时乖，坎坷布道，仍矢志不渝，坚守初衷，尽丝燃烛，^①报效祖国。请以此稟告母校，酬答洪泽，窃以为少有愧负，可慰诸方也。

岁月倏忽，逝者如斯，此生去矣。功过荣辱，本是过眼云烟；嫌隙芥蒂，相逢一笑泯之。惟师长恩德同窗情义堪为人世真谛。有《蝶恋花》为证：

重聚焉知经半纪，笑貌音容、犹有当时意。

受业穹庐同砥砺，^②心无瑕玷言无忌。

辰宿列张连广宇，盈昃阴晴、日月循天律。^③

何以此生论毁誉？流年似水如斯去。



领杨兄先庶之命，丁亥年霜降撰于珞珈山庄，以志永怀。（此诗作于 2007 年 10 月 24 日）

[注]

①李商隐诗（节录）：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②“穹庐”指武汉大学理学院，其主楼屋顶形似穹庐。

③《蝶恋花》下阕前两句寓意双关。武汉大学十六间老学生宿舍，依序以《千字文》开篇“天地玄（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起名。在校四年，物理系男生先后居盈字斋和昃字斋，女生居宿字斋。

作者系物理系 1954 级校友



雨中的珞樱

梅 朵

春雨，洒在半山
樱花，飘在雨里
心跳，一束束飞进梦

樱花和少年相绕嬉戏
惊起空中素白的古笺

那上面写满了故事
盛开或枯萎的心结
松开了记忆的伤疤
缓缓地飘下

一片白色的花瓣
乘着雨点的船
在谁的额头上
永远地冰凉着

作者系新闻系 1986 级校友



七律·樱园

十一居士

难忘长阶入岭深，
浅红一带绕初春。
经风骤落乱心雨，
映月薄飘迷志云。
光镜聚焦倚树客，
露台漫坐看花人。
当年书信若还在，
字里犹留圆瓣痕。

作者系中文系 1985 级校友



战斗到明天

——“六一惨案”亲历记

孙淑云

一阵喧闹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
推窗探望
十来个反动军警正向武大女舍走来
我箭步下楼
一个戴黑眼镜的特务正拿着黑名单
领着“狗子”在一个个房间搜查
我凑上前
“王云从”等名字火样刺入眼帘，
我飞奔上楼
“狗子来了，快走！”
他们很快把“王云从”等逮住
几十名同学蜂拥上前
和他们拉锯周旋
抗议、责骂……混成一片
我理直气壮冲上前责问：
“她们在这里学习，为何要把她们逮走？”
“你们抓人有没有逮捕证？”
雪亮的刺刀对准我们的胸膛
流血即将发生……



突然男舍传来尖锐刺耳的枪声
惨绝人寰的事已经发生……
我们心急如焚往枪声处奔跑
国民党派遣一千多名军特宪警
早已将武大分割包围
逮走了数十名爱国师生
国际战争禁用的达姆弹
已穿透同学的胸膛
三位同学正躺在血泊中
鲜红的热血 雪白的脑浆
多么残忍……
谁能不悲伤流泪
谁能不嚎响大哭
谁能不气炸胸膛
武汉大学在怒吼
全校师生在血泪控诉
国民党想封锁一切消息
他们的暴行却震惊了全世界
连美国报刊都已刊登
蒋介石惊恐万状
忙把罪行掩盖
扬言“惩办凶手”
还装出慈悲把花圈送
猫哭老鼠，谁也不受欺哄
全校师生默默站在三位烈士灵前
满面悲愤
朗诵挽歌祭奠英灵：
东湖在呜咽
珞珈山为你哭泣
苦难的人们站在你的灵前伤悲
民主已成泡影



自由已躺在血里
和平成了祭坛的牺牲
统一成了屠杀的外衣
只要战争，不要和平
只要屠杀，不要人民
无言的愤怒，无声的呼号
一人倒下，万人站起
安息吧！兄弟们！
挽歌凄楚直上云霄
血洗亮了眼睛，血唤起了觉醒
血债还要血来偿还
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我们一定要战斗到明天
.....

作者系法律系 1945 级校友

六一惨案：1947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遍及国民党统治区。以武汉大学为中心的学潮成为这次学运的重要组成部分。6 月 1 日凌晨 3 时，武汉当局调集全副美式装备的军、警、宪、特 1000 余人突然闯入武汉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宿舍，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 3 位同学，打伤 20 多人，逮捕一批进步师生，时称“六一”惨案。同年 8 月，武汉大学进步师生在校内体育馆侧修建“六一”惨案纪念亭；亭坐北朝南，边高 6.5 米，六角地尖顶，翠瓦飞檐，有 6 根朱漆圆柱支柱。（编者引自百度）



一树樱花，终于珞珈山

孙 雪

睁开花蕊，千万只眼睛在翘盼，惊慌了天空和飞鸟
远远的清香牵引，近近的屏息凝视，乱了分寸乱了心跳
粉，只是粉，还是粉，美到让人震颤和无语，又如何
谁听懂了一年一季的情话，一串疑问拖住脚步，且行且停
顶着类似的脸，叉着双脚，人影从一头流动到另一头
眼神跟着猫蹿上蹿下，见到对视转瞬逃匿，打探也是侵犯
城堡里住着故事和月光，诗句日夜澎湃，拾级而上
漫上樱顶，渡大家，渡学子，渡古今，渡一席珞珈讲坛
不必扣住春风，锁定春光，搅动春思，随意，卧枝而笑
一支枯笔写尽今生过往，回首处，一顿一挫行云流水
一树樱花，始于浪漫，终于珞珈山，活成了一回自己
不问安身立命，不问绝世惊艳，心归尘，梦归土，可否

作者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0 级硕士研究生校友



武昌东湖赋

陶佳珞

悠悠古城，巍巍武昌。天赐明珠，辉耀东方。烟波浩渺兮蕴人间风雨，湖岸逶迤兮演岁月沧桑。

君不见，楚庄督阵鼓声响，请和桥下敌将亡；屈子忧国仰天啸，泽畔行吟泪沾裳；刘皇叔祭天祈福报，李谪仙放鹰怜雏伤。楚地雄风今尚在，长天楼上看沧浪。

君不见，张香帅筑金青双堤遂江湖两分，周苍柏建海光农圃而名重一方。中兴之臣树宏业，东湖之父载史章。

君不见，皇皇黄宫拔地起，百年学府弘毅自强；巍巍博馆立湖畔，千秋瑰宝惊艳绝响。人文荟萃，群贤雅集，湖山增秀，桃李芬芳。

君不见，梅园明月映伟人身影，谈笑间运筹帷幄；湖心小亭留旧主遗迹，仓皇时画壁难张。

嗟夫！枕流听涛看云舒云卷，淘石吹笛观世衰世昌。一代风流俱往矣，如椽新笔重绘山色湖光。

美哉！春樱含羞，夏荷滴翠，秋菊染金，冬梅傲霜。绿道蜿蜒，千年之作，渔舟轻泛，八面茶香。百岛如星六峰连，四季美景一湖藏。野趣人文兼楚韵，不逊西子浓淡妆。

幸哉！生于斯长于斯，倚珞珈秀峰，观柔水汤汤；祈湖天永清，百鸟竞翔，荆楚儿女，再谱华章！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研究生校友



那一年

——写于武汉校友会 86 级分会成立时

季 成

那一年

带着满眼的懵懂满怀的憧憬

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武汉

红墙碧瓦，满山繁花我们叫武大，

漫步笔直的林荫大道我们叫水院，

伟人的汉白玉雕像告诉我们叫湖医，

随处可见的三脚架我们知道那是武测，

我们围聚东湖散落珞珈

那一年

我们想吃就去水院

我们看樱花就去武大

我们喝多了去湖医

我们学游泳就去武测

篮排足球宣泄着青春的激荡

围棋麻将也刺激着智力纷争

交际舞会是我们周末的狂欢

老乡来访促成了饕餮盛宴

吉他口琴常在宿舍窗口奏响

宿舍楼顶成我们纳凉的地方

一个珞珈诗会让一群年轻人



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那一年

我们汇聚成浪

我们燃烧为火

课余时间周游在各大教室，

有机会聆听大家的讲座

文学、历史、西方音乐

还有未建的三峡……

那一年

告别武汉挥别珞珈

绿皮火车拉着我们星火天涯

到基层下班组去一线

生命的历程烂漫如花

勤勤恳恳从头做

踏踏实实当牛马

成家立业当爹妈

生活磨平了坚毅的棱角

风雨吹皱了姣好的面容

岁月染了白发

鬓角挂上霜花

渐渐心潭静如止水

偶有涟漪

投下的石子一定有一个符号

“东湖 & 珞珈”

那一年

我们走到了一起

合校并系，拆分重组

优势互补，共创辉煌



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武大

那一年
我们共同经历疫情
隔离封闭时互助互励
武汉加油我助力
武汉奋起我高兴
武汉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家
那里有我们青春的记忆
直到现在群里还经常讨论“同桌的她”

那一年
我们又走到一起
516 是我们的暗号
江南里成了我们欢聚的家
捡起过去挽起现在面向未来
服务武大服务武汉服务校友
从此
我们这群老树又开了新花

作者系工学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86级校友



樱花大道

邱华栋

伴随着春天，樱花从美丽的内部走出
高悬在我们头顶
使我们仰望和接受花雨
惊慕于天空背景的深广和繁荣

谁还能够拒绝这个季节
像水流一样触动我们的手指
在樱花大道上我们的眼睛疾驰
笑容和花朵一起在盛开

樱花大道，你的伸展
就是春天接近的足音
我们在这个季节走过你
身体和心灵陡然都变得年轻

作者系中文系 1988 级校友



今年的樱花啊，你是……

吴根友

大约老天爷也有点急
刚刚公历三月二号
武大樱花的先锋队
已经在枝头闪亮登场
仿佛要把去年一春的寂寞
在今年的枝头加倍灿烂

今年的樱花啊
我懂你复杂的心思
援鄂的医疗队员们要来啊
怎么能不提前整装待发
还要唤起居丧人们的生趣
也必须拼命地灿烂，再灿烂

今年的樱花啊
你是武汉人的天使
每一个看到你笑脸的人
都会点燃战胜新冠的希望

今年的樱花啊
你是大江大湖大武汉发射的



宣示人类抗疫胜利的 第一轮礼花

作者系哲学系 1989 级博士研究生校友



珞珈樱花

吴 云

有些赞美是不用去采撷的
好比唇边的蜜，开窗即遇的樱花

你脸颊上的那一抹红云
挂在珞珈山的枝条上，天色就鲜亮起来

你的眼神就是一味迷药
羞涩的嫦娥都会为你弹奏心动的月光

哦，就让这潮水将我淹没吧
让每一次别离，都堆满珞樱的潮汐

多年以后，当我在斑驳的校舍与你重逢
所有的风情万种，怎么都装不出云淡风轻

作者系管理学院 1993 级校友



浣溪沙

王新才

余辛酉秋求学珞珈山，壬戌春见樱开，不觉已四十载

四十年花最赏樱，春春春雪映春晴，当时惘若误年轻。
尘世万缘终偶遇，芳华一瞬便曾经。乍回首际暗心惊。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81 级校友



秋之珞珈

汪晓清

这是我们的山水
必须有不一样的安排

让彼岸花先开吧
彼岸花一开
秋便来到了此岸
来到了珞珈

然后来了风
告诉每一片树叶每一片云
每一扇窗户每一座飞檐
都摆出生动的姿势

然后是秋阳
它照亮事物的细节
和珞珈人的脸庞
秋阳照亮了该照亮的
没照亮的
也留下美好的阴影

然后是雨 是桂



是倒影和芬芳
让珞珈有更丰富的层次

然后是反季节的樱花
和好看的青春
是远方的你和我
安排进这不一样的山水
安排进秋之珞珈

作者系中文系 1984 级校友



毕业六十年有感

余传隆

一

同窗珞珈六十年，共语沧桑意惘然。
莘莘学子垂垂老，耄耋之岁壮不移。

二

依依惜别见真情，几度重逢^[1]意更亲。
步入樱花丛中笑，桃花梅竹点头频。

三

日月如梭风雨多，蹉跎岁月劲风吹。
桃李争妍今辉映，雄鹰展翅竞奋飞。

四

学子勤读生物学，风飘雨洒五旬春。
五年寒窗苦酸辣，领略风霜雨露痕。



五

斋楼绿瓦樱花丛，湖光山色桃李红。
育李培桃挥汗雨，陶冶情怀浩气浓。

六

东湖珞珈翠岫清，巍峨宫楼耸山间。
斋前绿茵诵读声，勤奋苦读竞飞奔。

七

名师垂教育英才，振兴中华乐开怀。
高师善诱生勤奋，才贤辈出遍宇寰。

八

漫赏风花忆不完，风云飘雨在眼帘。
跃进年代办钢铁^[2]，建设铁路去汉丹^[3]。

九

全系师生挖鱼塘^[4]，深耕细作在农场^[5]。
技术革新敢创新^[6]，研究球藻和肉精^[7]。

十

领袖^[8]来到珞珈山，学府红云贯千秋。
名校传统尽发扬，高歌唱响万年长。



十一

珞珈醉雨催春梦，壮丽诗章竞气昂。
华夏唱响新时代，一流学府竞气扬。

十二

人到暮年感悟深，尽将余热献丹心。
面对人生尽黄昏，夕阳红艳照高岑。

作者系生物系 1956 级校友

注释：

[1]生命科学院 1961 届同学约有 10 次聚会(其中大的聚会有 7 次：武大 4 次，北京 1 次，长沙 1 次，南宁 1 次；小的聚会有 3 次：广州 1 次，江西 1 次，内蒙古 1 次)。

[2]1958 年大跃进全国大办钢铁，全校师生都参加了。

[3]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修建汉丹铁路的义务劳动。

[4]当年生物系大楼后面有一臭水塘，为了给水生生物专业师生提供一个研究水生生物鱼类实验的场所，全系师生投入艰苦的劳动，将臭水塘改造成水质净化的清水塘。

[5]学生参加生物系农场的劳动。

[6]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科研、大胆创新。

[7]师生参加研究小球藻和人造肉精项目。

[8]1958 年 9 月 12 日晚，毛主席在武大大操场接见四校(武汉大学、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中南分院)万余名师生。



我的樱花季

余仲廉

我漫步春天的珞珈山
春风一吹，惬意从眉梢流入心底
像接收远方来自于你的灵犀
我会跑到樱花树下
去看那些芽和蕾，仿佛看着你
仿佛看见一场春雨淅沥
打湿我花白的眼神
直至蔓延到我的整个灵魂
直到所有的花都暂停了呼吸

我认识这里所有的樱花树
在珞珈山如锦的路旁
诗一般伸展的枝条上
有数不清的花蕾
从含苞到花儿一瓣瓣
如同你青春绽放的美丽
灿烂得让我都不敢偷窥一眼
我只能任凭激情跳动的心
在热血中荡起层层涟漪
在一场雨飘落之前
轻轻拥揽属于我的樱花季

作者系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校友



那时的樱花

谢春枝

即使燕子没有衔来
故园的请柬
南风也会唤醒
被光阴催眠的语言

记忆里仍是你初次的容颜
一夜的惊艳
珞珈山缥缈胜仙
云海翻卷 花雨漫天
遍地的落英 写不完
青涩的欢喜和巧笑晏晏

这样的花季流年
一样的转角
不一样的芙蓉面
月光洗去离别的尘垢
又看到那夜五彩的心愿

繁华从未爽约
你却归期难见



人潮涌动 那时的你
一直在浪花中闪现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86 级校友



忆武大

严孝兵

桂子飘香夜，长梦回路珈。
湖山相敬看，四时有嘉花。

江山多胜概，珞珈望九州。
同学总不贱，肥马衣轻裘。

枫园枫叶香，桂舍桂花黄。
万点梅飞雪，千重樱舞浪。

春秋其代序，人事各消长。
廿载倏忽过，残宵梦断肠。

作者系信息管理学院 1995 级校友



珈 缘

——武汉校友会 86 级分会在咸宁江南里举行
成立庆典仪式有感

张彩雯

许多许多年前
一定是有一次擦肩
在梅园 在樱园
还是在湖边
亲爱的同学
请原谅当时的我
在回眸的那一刻
没能记住你年轻时的容颜

有一些缘分
总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些人
不管兜兜转转了多少年
上天定会在合适的时候
安排他们重见

当丁香花集结在
初夏的枝头
当江南里的梁间
憩满了呢喃的乳燕



当五月的繁花
闪落在弯曲石板路边
我们终于在
江南里雨巷的尽头
迎面相见

江南里温柔的湖风和雨烟
见证了一段未尽的情缘
顶着额头上那一抹彩虹
我们这次真的记住了
彼此已不再年轻的脸

珞珈早已种在我心田
你却刚刚长于其间
那些三生石前的誓言
怎能抵得过
历经沧桑后的再次相见

青春的年华里
我们曾散落街头 各自繁衍
如今前缘再续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让我们奉一颗真心
和一片赤诚
重筑一个美好的心灵珈园
共度余生最美好的
金色流年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86 级校友



樱 花 雨

郑行仁

半个多世纪前的
一个初冬的早晨
他告别珞珈山走上社会
顺便带走了
与城堡樱花的合影
在那张照片上
一群同窗洋溢着青春
正是一阵春风吹过
樱花雨洒落头顶

今天
在绵绵春雨中
穿过人流车流
他又回到珞珈山
寻找那片熟悉的风景
在樱花大道上
尽管步履蹒跚
心中激起波澜
城堡依旧古朴巍峨
樱花依然亲切烂漫
似曾相识又不敢认



他最钟情的那片樱花林
因为那里
藏着他们的青春
已经走了好几个同窗了
他是代他们来看樱花的
就这样站在樱花树下
任身边人潮涌动
他重温着
也享受着
珞珈山的春天
生命的春天
雨丝和着泪花
模糊了双眼

作者系图书馆学系 1962 级校友



念奴娇·同学缘

邹幼新

有缘同级，喜名师荟萃，志高心热。共读南窗相砥砺，戏水东湖同悦。政练荆门，武昌劳动，欲保工农色。十年风雨，可怜空耗心血。劫中四海抛飘，一身泥土，自奋怀忠节。落地生根花满苑，苦恨艰难谁说？已至稀龄，凭栏愈数，何解相思结。今秋重聚，祈参盛宴无缺。

注：2013年9月，大学同窗回母校聚会庆贺毕业46周年，对于这次聚会我憧憬多时，往事历历、浮想联翩，诉诸念奴娇一首。

作者系物理系1962级校友



大话樱顶

赵运成

樱顶，武汉大学之学脉地。暂居于此，离“珈”之音渐近，不舍之心越牵。求学五载，白日读法经，夕阳抚古筝。因筝遇汪伯，年五十有余。少时，汪母乃樱园食堂之良厨。汪伯常游玩于此。退时，汪伯之子修学园林设计。汪伯亦游玩于此。顽童之境，乐矣。汪伯曰：“待汝毕业，要大话一番樱顶。”时至，馈此佳礼。吾心感念，稍事梳理，遂作此文。

其一·老斋舍

老斋舍，武大学子休憩处。四舍四层，十六字斋。吾居荒字斋，冬暖夏凉，色彩斑斓。唤春，红窗樱花赛雪；望夏，绿荫知了唱曲；守秋，青瓦玉桂扑怀；离冬，素衣松柏披纱。

大道通达，抬首望天阶。陡矣，峭矣。攀援而上，石阶一百有余。登顶回首，清风掀钟鼓。叹地虽不平，然则天平。学子起点参差，跨百级阶梯，尽百分百努力，天道酬矣。忽见一波三折纹，路虽曲折，不屈不挠，终抵狮山之瑶台。复见云纹无字典，净如白纸，纵情书写，孕学子无限之未来。

青水外墙，梅花丁字暗香来。可喜，偶遇“阜成”。红砖里墙，丁字梅花幽香散。可惊，再遇“阜成”。汉协盛之沈祝三，眼虽不见，心却坚定。债虽高筑，殿却建成。傲梅独立雪，寒香自四放，何惧东风卷？



片片绿瓦，青春飞扬。片片串成竹，节节连碧海。变幻之莫测，骄阳目下泛银波，细雨怀中点翠珠。圆瓦当，扇滴水。滴水有寿，瓦当藏蝠，铜钱有眼。福在眼前，寿也延延。武大少年，潜心修学，不慕繁华。

其二·老图书馆

老图书馆，武大学子读书处。八面歇山，四字重楼。远望经纶，七环宝鼎。余烟缭绕，飞蛾蚊虫，舞之蹈之。近看双龙吻脊，头尾相连，无身之累，把子龙也。楼之四角，人跨奔马，马载书卷。貔貅六子，吞知藏识，不漏点滴。夙夙随矣，负重前行，不遗余力。修行不易，疾驰缓行，并矣。

门当三层莲花为座底，学子连跳三级入圣殿。奇哉！藏经处，何故商莲作门当？再忆沈祝三，亏损十万筑珞珈，门当原为念其志。品之，三本经书托如意，书中自有颜如玉。观之，龙凤柱上凤先舞，蛟龙再携祥云飞，巾幗也不让须眉。

罗马白柱，雄浑壮丽。中式红门，喜气洋洋。窗扇镂老子，“守藏室之史”。双手卧转烛，画卷徐徐开。楔山屏风，隔而不离。慧风徐来，书香四溢。左右通人，目游宫殿。脚踏阅览大厅，游之，移之。

扶栏而上，旋之又玄。依稀梦中，人师擦栏处。穷四层，目跃一门。光之道，耀也。少年郎，追光去。风随心动，身任脚牵，魂也四散。面之所立，云纹石壁。君子正衣，鉴心之镜。起行，极目骋怀，壮哉！巍巍珞珈山，立朱雀。汤汤东湖水，伏玄武。雍容行政楼，盘青龙。恢弘校牌坊，卧白虎。绕行，思接万千，美哉！珞珈独秀，东湖水长，磨山绰约，宝塔遥思。

其三·文法相携

老文学院，武大文人墨客荟萃地；老法学院，武大法学英才群集处。青水古墙，唯此二处。国之重器，一文一武。文华武英，相



携相守。

老文学院楼呈“口”形。楼之基，方方正正，无邪君子。出口成章，气贯长虹。人文情怀，气吞江河。屋之檐，线条婀娜。角之起翘，天外飞仙，文采飞扬。苦楝树旁，雪艇先生遥望。手持书卷迎来客，苦恋矣。梧桐树下，友多先生嗔视。目光如炬观世事，心忧也。

老法学院楼呈“凸”形。楼之基，“凸”为利剑，捍卫正义。公平正义，法律人之志也。屋之檐，线条平缓。角之端正，法之衡平，不偏不倚。吾自幼受父熏陶，今入法门十年有余。常喜日出时，登四楼瑶台。凭栏西望，昊天碧海，老图献顶苍翠中。抚栏静听，地锦软语，娇也。静观，体虽纤弱，势却刚劲，旺也。

珞珈樱顶，吾之至爱。魂牵梦绕二十载，读博之始，见卿秀面，听卿柔声。缠绵五载，毕业之时，才解卿之风情，吾心实愧。相亲却相离，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命由天降，紧箍已戴，西游取经去！

（原载武汉大学新闻网 2021 年 9 月 26 日）

作者系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2021 届博士研究生校友



《武大校友通讯》捐订名录

——(202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李承尧	300
凌开智	100
张平	3000
孔令仁	700
汪广生	200
蔡建章	200
唐齐仁	1000
裴树海	200



征订征稿启事

《武大校友通讯》由武汉大学校友总会编辑，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纽带和桥梁，是广大校友共同的精神家园。刊物宗旨：传播母校信息，展示校友风采，联络校友感情，弘扬珞珈精神。

《武大校友通讯》每年出版一辑，栏目分为：卷首语、特别报道、珞珈风采、珞珈记忆及校友文苑；每年会根据校友活动及来稿的特殊性增加相应栏目。《武大校友通讯》以回忆文章和校史资料为主，偏重于校友对学校生活、昔日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对学校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回忆。正因如此，《武大校友通讯》成为史料价值高、值得收藏的校友读物。

《武大校友通讯》是校友自己的出版物，办好它需要充足的经费。我们借鉴兄弟院校的经验，采取校友捐资订阅的办法。《武大校友通讯》每辑工本费人民币 48 元。捐订者可直接向校友总会办公室订阅，《武大校友通讯》将刊登订阅和捐赠校友的名字。捐订款请汇寄至武汉大学校友总会（邮政编码：430072，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收款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洪山支行，账号：17038201040007536，收款人：武汉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为办好《武大校友通讯》，欢迎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来稿形式不拘，以真实、原创、传播正能量为原则，内容要与母校、校友活动、校友生活相联系，由于篇幅所限，来稿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图片不超过 2 张；各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校友事迹的文章，也恳请积极推荐。



稿件请寄武汉大学校友总会《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收。投稿电子邮箱：aaoff@whu.edu.cn。

《武大校友通讯》编辑部

2021 年 12 月



关于进行校友信息系统认证的通知

亲爱的 WHUer:

您好! 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是武大人的掌上校友之“珈”, 欢迎广大校友注册认证。

校友信息系统现已具备校友多途径身份认证、智能自动匹配组织(地方校友会、行业校友会、院系校友会、年级校友会)、校友卡、校友活动、赏樱预约、校友投票、校友问卷、个人信息管理、校友学苑、校友刊物、校友福利、校友捐赠、校友咨询、智能会务系统、留言板等基本功能。

一旦通过校友身份认证, 即可自动加入与你同城、同行业、同年级、同院系的校友组织, 与同窗、校友、母校建立起终身联系, 还能畅享各类校友福利, 参与各类校友活动。

加入步骤:

1. 校友身份认证:

①关注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点击下方菜单栏“四海为珈-校友认证”即可进入认证页面。

②直接扫码认证:





2.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钉钉 APP。

3. 用身份认证时填写的手机号码注册登录钉钉，点击最下方菜单栏第 3 个图标，即可进入武汉大学校友信息系统。

认证温馨提示：

校友可通过三种途径进行认证，即证件认证、学籍认证、上传附件认证。如您证件认证没通过，有可能是您毕业时档案数据库未采集到您的身份证或护照信息，请您进行下一步学籍认证，学籍信息中五项填对四项即可认证成功；万一证件认证、学籍认证均失败，可能是档案库缺失您的数据，您也可以采取上传附件进行认证，管理员进行人工审核。

咨询邮箱：xyxxxt@whu.edu.cn。